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
甘肃中华文化学院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

GAN SU TONG ZHAN
LI LUN YAN JIU

2023年
第**2**期
总第68期

准印证号（甘）LK6200056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编辑手记

六月调神曲,正朝汲美泉。六月,行走在夏日里,望云卷云舒,赏百花清幽,我们的脑海不免浮现出“汗滴禾下土”的壮美画卷,感受着劳动人民精神谱写华夏民族劳动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使命的时代洪流。

当前,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正在全党深入开展,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一件事关全局的大事。为此本刊推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栏,初衷是通过理论研究和创新,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6道美泉、6篇佳作体现了甘肃社院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学习贯彻主题教育活动走深走实、抓好“三抓三促”行动的实践成效。湖北省荆门市委党校刘良军教授撰文《完整准确全面把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提出:总要求“四位一体”,相互支撑、彼此联系、有机统一,是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心走实的重要方法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悟开展主题教育的现实与历史意义,藉此坚定信念、提升能力,把党的二十大擘画的蓝图落到实处。甘肃社院王雄刚副教授、邹平惠讲师著文《发展社会学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兼论西部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其观点为: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为新发展社会学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世界新的发展“中心地”,中国发展中呈现出的新现象拓展着发展社会学的新语境,开拓着“西部社会学”研究的“在地化”路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部社会学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为契机,立足西部“地方性知识”,着眼“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性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考镜鉴。

75年前,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这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展示我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现代化美好新甘肃建设赋能添彩的生动实践,本刊特推出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5周年专辑,推出6篇文章以飨读者。省政协副主席、民进省委主委尚勋武在《重温合作初心 坚定政治信念》强调:重温“五一口号”,要积极履行作为参政党地方组织的职责,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甘肃的总体要求,坚持议政建言和凝心聚力双向发力,在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民革兰州市委会副主委张鸿俊声情并茂挥就《1948 春天这就来了》,将我们的目光拉回到风起云涌的1948年,那年时分,“五一口号”成为一份春天的邀约,从西柏坡起飞,飞向北京、上海、香港等民主人士聚集的城市,谱写了多党合作的时代华章。这份春天的邀约最终破茧化蝶,成为我国各民主党的共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齐心协力为奋进新征程凝心聚力,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责任编辑:王 昊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

GANSUTONGZHANLILUNYANJIU

2023 年第 2 期(总第 68 期)

封面题字：何鲁鹿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

目 录

主管单位:

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

甘肃中华文化学院

编委会成员

主 任: 孙雪涛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玉真 石岱千

刘仲奎 朱万全

李晓霞 张耀宇

杜怀明 尚勋武

苟天宏 赵金云

赵凌云 郭天康

姬安岳 秦 禾

秦忙龙 葛建团

蒲晓贞 霍卫平

统战理论新思维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重逻辑:全过程原则、人民精神与民主逻辑等五则

..... (4)

特辑:纪念“五一口号”发布 75 周年

重温合作初心 坚定政治信念 尚勋武(6)

1948,春天这就来了 张鸿俊(7)

礼敬“五一口号”汲取奋进力量 颜 巍(9)

苔花应如牡丹开 张鹏翔(15)

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 奋力谱写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新篇章

..... 柴 喜(17)

重温“五一口号”感悟白银精神 汲取奋进力量

..... 孙 媛(18)

贯彻二十大精神·党史学习教育

完整准确全面把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 刘良军(20)

社会学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兼论西部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发展 王雄刚 邹平惠(25)

邓小平机遇思想的本质特征研究 彭建涛(33)

2023年第2期(总第68期)

2023年6月20日

- 伟大建党精神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康家纬(39)
浅析新时代干部作风建设 王 啸 陈红瑜(43)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探析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 ... 刘 伟(47)

统战理论与实践

- 统一战线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赵宪军(49)
民主党派推动乡村振兴的优势及路径探析 王 昊 李 霞(55)
对新时代我国统一战线工作新特点的分析与思考 刘翠英(61)

理论探索与研究

- 建立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商会组织沟通协商制度问题研究
..... 梁晓宇(64)
治理重心下移与村干部角色重塑
——基于西部地区 Y 村的经验研究 王兆花(70)
F 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乡规民约建设研究 李迎利(77)

主 编:李晓霞
编辑部副主任:王 昊
蒲富平
执行编辑:王 昊
卢婉春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
安宁西路 818 号
邮政编码:730070
电话:0931-7634058
0931-7783804
传真:0931-7783804
电子邮箱:
GSTZLLYJ@126.com
印 刷:
甘肃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统战理论新思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炳权先生在2022年第10期《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撰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重逻辑:全过程原则、人民精神与民主逻辑》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民主理论发展历史上伟大创新,也是人类民主道路上的新成就。从理论结构上分析,在唯物辩证法指引下,全过程人民民主没有顾此失彼,而是实现了全过程原则、人民精神与民主能力三要素的聚合。他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原则、精神与能力三重逻辑的统一实现了对民主本质的重新挖掘。“全过程”不是凭空捏造的概念,而是在对西方“间歇性”“周期性”民主理论深刻批判后得到的重要结论。全过程原则既要求在抽象的思维世界中构造民主概念时要将全部民主元素融合统一,又要求民主在历史时间序列上的全历程应用与发展,更要求民主精神在人类实践的现实空间中的全领域引领。

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提出既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又是对民主本意的重新挖掘。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原则,贯穿在政治系统的全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精神,全方位推动社会运转:引领追求共同富裕的经济民主,引领追求自由文明的文化民主,引领追求公正和谐的社会民主,引领追求绿水青山的生态民主,引领追求生命至上的健康安全生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能力,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樊荣在《西部学刊》2023年第2期撰文《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路径研究》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传承中华文化、符合中国国情、凝聚中国智慧、服务国家建设,相较旧式政党制度具有显著的民主优势、共识优势、程序优势、整合优势,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如何更好地将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

能,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路径:一是建立多元主体参与平台,引导公众参与有序化治理:为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权益,遵循利益代表广泛性要求,满足基层建设的迫切需要,应基于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技术层面创新社会利益表达方式,把握互联网时代的脉搏,通过新媒体平台畅通建言献策渠道,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政治治理平台。政治治理平台应具备扩大宣传、经验介绍、公开政策、寻求建议功能。二是组建议题调研专业团队,保证问题、建议严谨化评估:中国不断完善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探索形成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等协商渠道。协商针对重要议题而展开,因此规范议题评估流程并组建一个专业能力强、涉猎领域广、具有坚定信仰的议题调研团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三是细化治理效能评价标准,推动专项提案完整化落实:政治决策是否能够得到严格执行与落实,治理是否充分发挥了应有效能,其关键在于治理效能的评价结果是否达到标准,而治理效能的评价需要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治理效能的评价标准。可划分为定性标准与定量标准两个方面:定量标准,包括制度完善、数据多元、经济增长;定性标准,包括政治发展与民众认同。

《民族大家庭》2023年第1期刊发了湖北民族宗委余文生的署名文章《做好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的民族宗教工作》,其看法是: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他聚焦。我们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正确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要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

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要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

他认为: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下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基铸魂;二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三是自觉运用统战思维做好新时代的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四是将思想和行动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聚焦;五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北京观察》2023年第2期刊登了胡雪峰《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程》一文,胡雪峰系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北京雍和宫住持。他的观点是: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建议进一步挖掘整理宗教文化资源,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夯实思想基础。加强宗教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意义深远,如佛教教义中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等理念,蕴含着丰富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契理契机地加以阐释弘扬,能够为佛教弟子和信教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坚实的思想支撑。建议一是进一步支持和引导宗教界积极开展宗教经典的重译和注释等工作,深入挖掘和弘扬宗教教义、宗教道德、宗教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健康文明的内容,充分彰显我国宗教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不断提升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水平。二是进一步加强宗教教职人员培养,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提供人才保障。宗教教职人员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充分发挥宗教界自身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更需要相关部门在战略高度加强顶层设计。希望在党和政府的指导和关心帮助

下,着力办好宗教院校,围绕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宗教学识、工作能力等方面,全方位加强爱国宗教后备人才培养,将宗教院校建设成为正确阐释宗教教义、培训宗教教职人员的重要基地;加强宗教院校经费保障,按照国民教育办学成本,加大对各宗教院校的支持和补贴力度;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教育工程,培养一批高层次“双通”人才,为宗教健康长远发展奠定人才基础。三是进一步统筹协调宗教工作“三支队伍”,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凝聚强大合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江苏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研究员徐坤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正辉在《统战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1期撰文《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作用研究》提出:新时代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工作领域更加宽广、工作内容更加丰富,呈现出空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多样性和显著的社会性,新时代,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积极作用,对于凝聚共识、汇聚人心、化解矛盾、增进感情、激发动力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在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群团组织作为联结党和政府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发挥着夯实统战工作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拓展统战工作的基层覆盖面和实践纵深度、提高统战工作的群众满意度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在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作用,要提高群团组织的统战意识,增强做好统战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创新方式方法,激发统战工作新活力;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实现更加广泛的有效覆盖面;强化制度建设,完善机制运行,健全培训考核机制。尤其要注意引导群团组织深刻理解统战工作必须大家来做的相关要求。在构建大统战格局的过程中,增强群团组织的合作意识和大局观念,主动加强其与统战系统内部各部门的协作,特别是与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之间的联系,树立“大统战”意识和“大统战”战略思维。

责任编辑:王昊

编者按:今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5周年。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热烈响应,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7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成为令人瞩目的新型政党制度。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充分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

在隆重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5周年之际,为进一步弘扬传承“五一口号”精神、赓续优良传统,巩固主题教育成果,深化政治共识,我刊推出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5周年专辑,重温“五一口号”内容,展示多党合作初心,凝聚思想政治共识,汇聚振兴发展力量,表达我省各民主党派矢志不渝跟党走坚定信念和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新篇章的共同心声。

重温合作初心 坚定政治信念

尚勋武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也反映了各民主党派和所有爱国民主人士的政治主张,立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马叙伦、王绍鏊和其他党派团体领导人等得知消息激动万分、欢欣鼓舞,在香港联名公开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同时又在香港《华商报》单独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宣言》:“本会对于中共的“五一口号”,以十分的兴奋心,同意其号召,并望中国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起而响应,一致奋斗!”这一响应,标志着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进入了崭新的时代,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模式初步奠定,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

揭开了新的一页,也标志着民进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一个质的变化。

75年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栉风沐雨,戮力同心,谱写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华章。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经受了世界变局加快演变、新冠疫情冲击、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考验,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机统一,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伟大的创造性、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在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定 (下转第8页)

作者简介:尚勋武,男,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甘肃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民进甘肃省委主委。

1948,春天这就来了

张鸿俊

1948年,中国共产党于4月30日发出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即为“五一口号”。

1948年是一个“天地玄黄”的年份,是所谓“新中国”与“旧中国”大决战的时刻。这一年国共两党的政治竞争胜负几成定局,但国民党没有放弃最后的挣扎,其统治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仍然深重,可谓是“黎明前的黑暗”。

1948年,诗人辛笛在上海写下一首名为《春天这就来》的诗。在开头,诗人便有着疑问:“春天这就来,冬天你走不走去?”这一年是黑暗与黎明最后决战的时刻,旧的时代即将结束,新的时代还在路上,因为个人观念、立场的不同,所以任何抉择都有可能。在这样一个转折年代,诗人们的笔下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是“等待”和“忍耐”。

时间回溯到1948年,这一年,解放战争正酣,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1月,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等联合在美国的冯玉祥,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邀请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它的成员全部是孙中山的战友和“信徒”,民革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很少有人知道,除了香港的这几十位,民革在大陆、在

蒋介石政权内部还拥有大批秘密成员,其中包括龙云、刘文辉等身居高位的地方要员。民革在酝酿和成立的伊始,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广东省委、香港工委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均对民革的成立给予直接或间接指导。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内容共23条,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其中第五条郑重宣布和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成为一份春天的邀约,从西柏坡起飞,穿越国统区的封锁,飞向北京、上海、香港等民主人士聚集的城市。收到邀约的民主人士纷纷响应。“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而是行动口号。

就在“五一口号”发布当日,毛泽东又给李济深和在港主持民盟工作的沈钧儒写了一封亲笔信,就政协会议的召开征求二人意见,“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在新政协召集人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谦恭地把自己置于民革、民盟之后。

很快,1948年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马叙伦、王绍鏊代表民进,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彭泽民代表农工党,李章达代表救国会,蔡廷锴代表民促,谭平山代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代表无党派人士联合致电中共中央,热烈响应“五一口号”。

作者简介:张鸿俊,男,民革兰州市委会副主委。

“五一口号”顺乎民心,反映民意,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逻辑要求。民革积极响应,并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公开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解放战争全面转入战略反攻。就在同一天,香港首批北上的民主人士登上了开往解放区的轮船,这其中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10余人。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倡导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纷纷行动,努力争取光明的前途,“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实现了从同情、倾向中国共产党主张到公开自愿接受中共的领导转变。“五一口号”提倡和践行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精神,不仅加速了新中国曙光的到来,而且对当今中国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启示。

1949年9月,民革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订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民革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一员。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宋庆龄、张澜、李济深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黄炎培、郭沫若出任政务院副总理,15位民主人士出任部长,19位民主人士出任中央政府委员。民主人士和中共一起,完成了建国大业。

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参加新政协运动,确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民革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民革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是民革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精神的显著体现。

2023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5周年。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在理论及合作内容上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回顾总结民革历史和成就,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是民革的立党之本、发展之基。

责任编辑:卢婉春

(上接第6页)

政治信念和立场,始终在正道上行。”这是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在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为广大民进会员指明的方向。75年过去了,老一辈民进先贤誓为实现民族独立、追求民主富强的一腔热情依然鲜活并充满力量,激励着后人踏着他们的足迹奋勇向前。今天,我们重温“五一口号”,就是要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把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今天,我们重温“五一口号”,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四新”“三好”的要求,回应时代召唤,勇担时代使命,认识自身建设面临的更高要求和更重任务,努力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自身建设水平。今天,我们重温“五一口号”,就是要积极履行作为参政党地方组织的职责,紧紧围绕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甘肃的总体要求,坚持议政建言和凝心聚力双向发力,在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上,民进甘肃省委员会将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坚定信心、牢记使命、笃行不怠,以民进“作风建设”主题年为契机,加强自身建设,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人民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构建“一核三带”区域发展格局、推进“四强”战略实施、“双碳”经济、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课题,扎实开展调查研究,多献务实之策,为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履职尽责,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发展凝聚起无坚不摧的力量,推动中国号巨轮驶向梦想的彼岸。

责任编辑:邹平惠

礼敬“五一口号”汲取奋进力量

颜 巍

【摘要】“五一口号”作为中国共产党顺势适时提出的富有号召力的政治口号于1948年发布,迄今已75周年。这一口号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担当精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写照,更是中国共产党奠定领导基础,确立领导地位的重要标志。“五一口号”的发布是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的重大历史事件,是由特定的国际背景、中国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趋势决定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进程中形成的重要历史资源,“五一口号”顺应了人民对和平的期待和反映了各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五一口号”一经发布并迅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热烈响应,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国是,加速推进了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并最终取得革命最后胜利,由此缔结了中国新型政党关系,开启了中国政党协商民主实践,为新型政党制度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立足当代,重温、珍惜、把握、体味“五一口号”发布的历史背景、具体内容、精神意蕴、时代启示,总结中国共产党与老一辈民主党派人士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艰难和辉煌历程,探索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坚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优势,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激发和凝聚最为广泛的爱国力量,攻坚克难,继往开来,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稳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世界政党政治实践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

【关键词】“五一口号”来历 精神意蕴 时代启示

一、“五一口号”的来历

(一)历史背景

1. 二战后国际政治规则的变化

二战结束后,世界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超级大国的争霸、两大阵营的对峙。可以说,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国也概莫能外。回顾历史,雅尔塔体系虽然带有强权政治的烙印,但其提倡的和平、民主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新的世界秩序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民主政治已获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尊崇和赞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建立联合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共识。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紧跟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步伐,充分利用雅尔塔体系规则,提出了建立民主政权的号召,符合民意。当然,美国与苏联对中

国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在1943年召开的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利用与蒋介石面谈的机会,奉劝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以消除彼此间的纷争。1944年,中国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惨败日军之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也曾经多次亲自或派员与国民党政要接触,建议国民党组建“联合政府”。虽然,中国共产党倡导的“联合政府”的主张与罗斯福的“联合政府”构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建立民主政权是当时国际政治大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

2. 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

抗日战争胜利后,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渴望胜利后的和平。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提出和平建国方案。但是清醒的中国人民发现,和平建国之路并不平坦。为了争取主动权,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率中共代表团亲赴重庆与国民党展开谈判,期间毛泽东还与在渝的民主人士展开广泛的交流。国共双方

作者简介:颜巍,男,民盟盟员,兰州市城关区农村农业局干部。

围绕政治问题进行了三次会谈,最终迫使国民党当局在达成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中,承认和平建国方针,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中国共产党力争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做出必要的让步,即便和平无法实现,也可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真面目”。^[1]蒋介石的方针是“政治宽容,军事严格,不稍迁就”,重庆谈判虽开启了和平的大门,但两党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45年10月10日重庆谈判宣告结束。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三方代表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政协会议和国共两党和谈的过程中,民盟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力促和谈成功。在反对国民党非法召开的“国民大会”的斗争中,民盟与中共一致行动,拒绝出席,并先后把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青年党和民社党成员清除出民盟。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认为修改后的宪法草案违背“三民主义”,不符“五权”宪法,并勒令中共中央“征兵扩军及军队之调动,必须即刻停止”。^[2]对此,中国共产党“仍力争和平,但不再提实行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政策”。^[3]4月7日中共中央在《解放日报》上发文指出,蒋介石撕毁政协会议五项协议,用宪法确立独裁统治,企图重新向全国宣布独裁。6月底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爆发。11月由国民党包办的“制宪国民大会”召开,鉴于国民党撕毁政协会议五项协议,中共拒绝出席。国民党指令中共代表团全部撤离谈判驻地,宣告国共和谈破裂,中国和平民主建国的最佳历史契机就此丧失。1947年7月,国民党发出戡乱建国的号召,迫害民主人士。1947年10月1日,国民党政府新闻局局长董显光招待记者,宣布民盟是“中共之附庸”,“民盟分子破坏总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10月7日,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部公然枪杀了民盟中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0月28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声明《政府宣布民盟非法》,“严加取缔”。11月5日,在沪民盟中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决定为了换取盟员免于向当局公开登记,以保护广大盟员的安全,民盟总部宣布自动解散。就在民盟处于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中共强烈抗议蒋

介石解散民盟和大肆迫害民主人士的法西斯暴行,并鼓励民盟放弃幻想继续奋斗。新华社11月6日发表《蒋介石解散民盟》的时评,指出:“民主同盟在若干历史关节中,实行了与中共在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从而推进了中国民主事业,乃是民主同盟的光荣”。1948年1月5日,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全会认为,“自从本盟被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勒令解散以来,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和幻想,实早已被彻底粉碎了”,“我们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合作”,^[4]标志着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政府的彻底决裂。至1948年3月,解放区面积占全国25%,人口约1.5亿,占全国30%,人民解放军兵力达115万人,地方民兵达200万人。^[5]1948年上半年国内形势发生巨变,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节节胜利。此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力量,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社会基础等方面均占据优势。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决裂,选择拥护共产党,国共两党境况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的领导者为众望所归、人心所向。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时机已成熟。

(二)“五一口号”的提出及内容

中国共产党素有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传统,发布“五一口号”是惯例。国际劳动节是第二国际为纪念1886年5月1日芝加哥大罢工而设立的。每年“五一”中国共产党都会通过报刊、新华社等对外发表宣言、口号、指示、社论等来纪念这一节日,如1927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告中国民众书》《告世界无产阶级书》。1942年4月,中共中央指出纪念“五一”必须与国际工人阶级反法西斯斗争、中国人民坚持抗战联系起来。^[6]毛泽东在1947年的“五一”社论中宣告:“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反攻”“我们的最后胜利是肯定的”。^[7]

1948年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的一份“催问”电报,请示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政策决定来向全国发布?考虑到不久前,也就是1948年3月以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大总统”,为了揭露国民党政府伪装民主、愚弄民意的行径,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发布一条“口号”,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政治主张,并且鉴于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

速,已具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号召的条件,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阜平城南庄(“五一口号”发布于城南庄,称其为“华北的延安”)召开的扩大会议对此进行了研讨。故此,城南庄会议第一项议题是讨论“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8]同时,毛泽东认为:“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能不能把我们党最近的工作方针变成通俗易懂的口号,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主张。^[9]为实现这一政治目标,中共中央遂决定权威发布“五一口号”。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由胡乔木起草的“五一口号”初稿,共24条,很快完成。毛泽东亲笔作重大修改——三处改动和审定,将“五一口号”初稿的第五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第五条的修改,表现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预示着一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的诞生,奏响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建国的华美乐章,标志着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即将进入崭新时代。除了第五条,毛泽东还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将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有23条。

毛泽东将修改好的“五一口号”首先征询了在城南庄的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之后,又亲自打电话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征求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从“五一口号”的内容特别是毛泽东的重大修改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军事实力日益增强,全国大势基本确定,但并没有自持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逼迫欺压各民主人士,也没有以一党独大的优势继续推行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而是保持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开辟了政党共建民主联合政府的新路,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一口号”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并且奠定了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合法性基

础。一是“五一口号”是人民解放战争最后的总动员令,推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在人民解放军的步步进攻下做最后的抵抗,但数量和形势上还是占据优势,人民解放军要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仍需作出艰苦的努力。基于此,“五一口号”第1、2、3、6、7、8、9、10、15、16条提出“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万岁”等内容,一方面庆祝解放区的胜利,向解放区的人民致敬,另一方面向蒋管区的人民致敬,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支援解放战争,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活捉伪总统蒋介石”,“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10]这些号召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积极响应,解放区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生产运动和土地改革,踊跃参军,生产、支援前线粮食弹药,国统区的人民积极护产护厂,壮大第二条战线。二是“五一口号”发展壮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积极力量。“五一口号”第4、11、12、13、14、17、18、19、20条的内容是关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和策略,其中包括有工人阶级加强工人与技术人员的团结,联合被压迫的民族工商业者,与资本家建立劳资两利的合理关系;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中国工人阶级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开展民族解放运动、民主运动和职工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第4条强调“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它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号召共同“建立新中国”。三是“五一口号”奠定了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开辟了协商建国的新路。第5条关于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内容是“五一口号”的核心,周恩来强调这是行动口号。与旧政协相区别的是,新政协的成分是以工农为主体,团结一切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排斥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任务是中国共产党与长期以来风雨同舟、并肩作战的各民主阶级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民主联合、协商建国的新路。“五一口号”第21、22、23条提出以共产党为领导的解放战争必胜、人民团结万岁的重要宣言。

(三)“五一口号”的发布及响应

1948年4月30日,“五一口号”修改稿在中共

中央快讯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随即,新华社对外发布,同一时间,新华广播电台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文章上方还端端正正地印着毛泽东侧身头像。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五一口号”发布当天,关起门来召开的南京伪国大闭幕,长衫马褂总统(蒋介石)和军装副总统(李宗仁)在众叛亲离的衰败气氛中,形象滑稽地“宣誓”就职。为有效落实“五一口号”,口号发布次日,毛泽东主席随即致信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主持盟务的常委沈钧儒,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他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

“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海外华人群情激昂、备受鼓舞,“五五通电”迅速响彻神州大地,台盟、民进、民联、民促、致公党、民盟、农工党、民革等纷纷发表通电、决议和宣言,一呼百应,蔚为壮观。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12名民主人士在香港联名发表通电响应“五一口号”:“同等日深焦虑,力图对策,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中国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电达中共表示同意外,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5月7日,台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6月间,致公党、民盟、农工党、民革等纷纷发表宣言和声明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致公党在《告海外侨胞书》中说:“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1]随后,各民主党派人士接受邀请克服重重困难奔赴解放区,与

中国共产党协商建国。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从最初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发展到自觉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多党合作、协商建国的华美篇章。从团结合作到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作出的自觉选择,是建立独立、统一、民主、自由新中国的夙愿使然,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二、“五一口号”的精神意蕴

(一)立党为公、大公无私的爱国精神是“五一口号”凝聚各方力量的光辉旗帜

“五一口号”的发布,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同时也集中反映了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党的主张和共同愿望的交汇点就是早日建立一个新中国,其精神根基就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爱国精神。爱国是不分党派的也是不分先后的,只要是爱国者,就有资格有权利,也有责任有义务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中。中国共产党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身就是最伟大的爱国者,同时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形成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早日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也都是坚定的爱国者,爱国主义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也是他们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发展,各民主党派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全国人民走向解放、走向富强,于是他们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逐步建立起亲密共事的关系,迅即对“五一口号”做出响应,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积极致力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得到了充分表达和充分实践的机会。

(二)人民至上、民主协商的民主精神是“五一口号”的根本遵循

人民盼望新中国的诞生,盼望生活安定。无论哪个政党、哪个团体都不该也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否则就会遭到人民的抛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一真理,顺势适时发布了“五一口号”,号召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以争取和迎接全国的最后胜利合乎民心、顺应民意,如同催化剂一样大大加快了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进程。“五一口号”的实质是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私利,其政治主张的着

眼点和落脚点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所做的选择一定是最有利于人民的正确选择。

“凡是重大的方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的精神”。^[12]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有的一种形式,在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独特优势,也是实现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面前,中国共产党作为“五一口号”的发布者、新政协的发起者,真心实意邀请和组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北上参与协商建国,凝聚各方力量,携手实现真诚合作,在事实上建立了协商民主的形式。“它找到了协商建国的民主形式,为我们创造了协商民主这种新型的人民民主”。^[13]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14]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和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形成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力量。“五一口号”发布后,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扬协商民主的精神,就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平等相待、充分探讨、多次协商、密切合作。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则畅所欲言、建言献策,就许多重大原则问题达成了共识,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前所未有的大团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五一口号”作为一项庄严的政治承诺予以落实,民主党派的许多领导人担任了政府的重要职务,不少民主党派成员担任了人民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工作,共同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

(三)“五一口号”的政治共识,奠定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厚实基础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在政治生活中显示了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而为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奠基的正是“五一口号”。可以说,“五一口号”是新中国政党制度建设的理论原点和实践基点。“五一口号”的第5条内容已经孕育了一种全新的政党关系,播下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种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判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5]

三、“五一口号”的时代启示

(一)维护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坚持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

纪念“五一口号”发布,各民主党派要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各民主党派要深刻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共产党自封的,更不是共产党抢夺的,而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历史的真实写照。历史选择共产党没有选择其他党派,是因为共产党总是站在历史的前头,解放人民、帮助人民。带领人民不仅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还指出了一条独立、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建国后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由于指导思想的不同,这一切,是民主党派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的。今天的中国,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共产党又提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引领航向、凝聚人心。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都应该自觉地维护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坚持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共同为实现中国梦而积极地献计献策,同心同向,共谋发展。

(二)坚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

一个国家选择怎样的政治发展道路,绝不是信手拈来、随心所欲的,而是依据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地理环境、历史经验等主客观因素决定。历史底蕴及其基本经验,是设计国家制度蓝图的重要参照,又是构建其自信的根本。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之所以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确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时期彰显其独特优势,为人类政党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中国智慧和路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75年

前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五一口号”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红色基因,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首先突破了诸如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传统政党类型,创立了一种合作型的政党制度形式,政党关系不是以竞争为特点,而是以合作为主要特征;其二突破了以执政为目的、以竞争为手段的政党政治模式,创立了一种复合形式、立体结构的政党合作协商的关系格局;三是突破了以议会党团为中心的政治参与方式,创立了一种执政和参政有机结合、领导与合作内在统一的政党执政参政方式;四是突破了以选举为唯一形式的民主政治,创立了一种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内在的发展逻辑,绝不是外界强压给我们的,它是“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6]对于这种符合历史实际与现实国情的道路,我们有坚定的自信。因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不能退缩,需鼓足勇气认真分析问题,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基础,不断去解决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只有坚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才能排除滋生焦虑的土壤,消除人们对中国发展前景的担忧。

(三)为实现民族复兴凝聚最广泛的力量

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长期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进入工业社会之后,西方国家迅速崛起,中国则固守在农业社会蹒跚不前,最终酿成百年屈辱。但历代仁人志士并未沉迷沦落,而是纷纷奋起抗争。无论是林则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晚清四大名臣掀起的“师夷长技以自强”、梁启超等人推动的“戊戌变法”、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还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其最终指向都是一致的,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古训曾言:集天下众人之眼共同观察,就没有什么是看不到的;用天下众人之耳共同聆听,就没有什么是听不到的;合天下众人之心共同思考,就没有什么是想不到的。同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博采众谋、集思广益、汇聚力量,形成奋发有为的强大动能。“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7]中国的民族复兴之路,就是众人之事,集众人之智,合众人之力。“五一

口号”精神是一股凝结众人之智、众人之力的“绳子”。牢牢抓住这条“绳子”,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就拥有克服困难与艰辛的勇气。在“五一口号”精神的指引下,人民会有积极向上的心态。“五一口号”精神,对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不应当偏离“五一口号”的轨道,任何时期都要以“五一口号”精神为标准,检验发展道路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坚信“五一口号”精神会带来最高理想的恒心与毅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需要“五一口号”精神的支撑,它将砥砺中华民族奋力前行。

参考文献

- [1]陈锦荣.“五一口号”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M].中共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首都统一战线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优秀征文集.2018:75-81.
- [2]吴跃农.“五一口号”的故事[J].协商论坛,2018(04):55-58.
- [3]柳克方,宋严.“五一口号”的六大精神意蕴[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9,42(4):154-160.
- [4]张广鑫,周焕博.“五一口号”奠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2(04):139-147.DOI:10.16216/j.cnki.lsxwbk.201904139.
- [5]张献生.“五一口号”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奠基[J].党史文苑,2018(06):63-64.
- [6]张彩云.“五一口号”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2):26-30.
- [7]王东杰.百年党史视阈下“五一口号”的再审视[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21(05):101-104.DOI:10.15875/j.cnki.zgzzswdxxb.2021.05.020.
- [8]朱继东.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五一口号”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J].中国政协,2018(11):20-21.
- [9]王树臣,赵妍.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五一口号”的内容、过程及意义[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04):16-20.
- [10]车庆芳.大道之行不忘初心画出最大同心圆——“五一口号”发布的背景、意义和启示[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02):22-28. (下转第16页)

苔花应如牡丹开

张鹏森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其中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27人)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今年,是“五一口号”发表75周年。

75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海纳百川、天下为公的责任和使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内外中华儿女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伟大复兴之路。

7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以山不让尘、海不辞赢的胸怀和智慧,吸引着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开创了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新型民主政治制度。

75年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以百川入海的豪迈激情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现了中华民族华夏统一、天下归心的伟大梦想。

回望历史,“五一口号”的声音响彻寰宇,振奋人心。

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在当时立即获得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及爱国华侨的热烈拥护。他们纷纷发表宣言、声明、文章,表示拥护和响应“五一口号”,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赞同召开新政协,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形成了一场“新政协运动”。

1948年5月23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上海秘密举行会议,一致通过赞同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筹划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决议。

75年过去,“五一口号”的精神依然在历史的天空熠熠生辉,光照史册。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明确指出“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要团结,使他们进步,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整套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和政策,党中央积极帮助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发展组织、开展工作,并建议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实行“巩固与发展相结合、坚持三个为主的方针”,使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多党合作事业迈上了崭新的历程。

十四届三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则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继续推进我国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制定颁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成为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多党合作事业和民主党派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使我国的多党合作事业发展进入了崭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展现出强大生命力。

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工商联共迎新春时提出“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

作者简介:张鹏森,女,民建兰州市直基层委副主委,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安宁管理部一级主任科员。

重大论断,为多党合作理论作出更大理论创新。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型政党制度”概念。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强调“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回顾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奋斗历程,发扬光荣传统,坚守合作初心,加强自身建设”,为民主党派在新时代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

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到“窑洞对”,他指出: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2023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民建、工商联政协委员组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中共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提出要“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体现出总书记对多党合作事业的重视、对民建和工商联的关心。

75年来,民建作为参政党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始终坚决拥护中国共产

党,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努力发挥民建优良传统和经济界别特色,在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工业西迁到延安的“窑洞对”,从蓄须明志的“再髯公”到“五老火锅宴”,从“手脑并用”的中华职教到回报社会的思源工程,从云贵高原的精准扶贫到长江黄河流域经济长廊,从新冠疫情的捐款捐物到抗疫战斗的防控一线,一代代民建人以高贵的人格和崇高的民族气节,胸怀拳拳爱国之心,志存实业救国道路,用智慧和忠诚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追求进步,为中华民族不懈探索,树立起了一座座高山仰止、砥砺奋进的精神丰碑。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今天,我作为一名普通的民建基层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时刻牢记历史,不忘合作初心,树立家国情怀,自觉将个人事业融入伟大时代、伟大事业,以党为师,加强自身建设;兢兢业业,立足本职工作;尊崇先贤,发挥界别优势,重温五一口号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断,提高五种能力,积极建言资政,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伙伴、好同事,在普通岗位上为民建增光添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全部力量。

责任编辑:马霞

(上接第14页)

[11]彭剑鸣,商莹.底限正义:政治协商会议的原初逻辑分析——以“五一口号”为切入点[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02):15-20.

[12]冯杰.故事里的政协——从“五一口号”到首届会议[J].同舟共进,2021(07):4-7.DOI:10.19417/j.cnki.tzgj.2021.07.001.

[13]贾亭.弘扬“五一口号”精神 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02):27-31.

[14]沈艳.汲取“五一口号”的精神价值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J].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04):9-12.

[15]邹义煜.历史视野下“五一口号”精神内涵的再发

现[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3,29(05):61-63+66.

[16]马驰.民盟响应“五一口号”的历史与展望[J].群言,2018(05):19-21.DOI:10.16632/j.cnki.cn11-1005/d.2018.05.010.

[17]张攀.“五一口号”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J].现代交际,2018(18):194-195.

[18]李娜.新时代“五一口号”的时代内涵[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01):39-42.

[19]李岁科.新时代视野下“五一口号”意义的再认识[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03):16-19.

责任编辑:闫丽红

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 奋力谱写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新篇章

柴喜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

在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5周年之际,我们认真回顾和总结农工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携手共进的光辉历史和宝贵经验,自觉传承农工党老一辈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赓续爱国、革命、奉献的优良传统,更加坚定不移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始终保持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政治本色。结合当前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深入推进“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时代”政治交接主题教育和省委“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农工党党员深刻理解和认识“五一口号”发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切实担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市级组织的政治责任,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明确历史方位、找准自身定位,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履职能力,为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谱写我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献策出力。

一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共二十大精神,切实深化政治交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

省农工党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把思想和行动迅速统一到中共二十大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化巩固“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时代”政治交接主题教育成果,开展新一轮主题教育,真正做到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不变,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亲密合作的政治态度不变,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信念不变,鼓足昂扬之气,汇聚奋进之力,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提供坚强的思想保障。

二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在酒泉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上展现更大的担当和作为。充分发挥以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等领域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界别优势,将履职重点与专长特点相结合,胸怀“国之大者”,心系“民之关切”,聚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确保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到点子上、监督监在关键处。要把对中共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甘肃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落实贯彻于参政履职的各方面全过程,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深入调查研究和反映社情民意,立足优势领域建言献策, (下转第19页)

作者简介:柴喜,男,农工民主党酒泉市委员会主委。

重温“五一口号” 感悟白银精神 汲取奋进力量

孙 媛

5月6日,我奔赴白银,参加了市委会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5周年活动。在这次重温“五一口号”活动中,我回顾了多党合作光辉历程和九三学社先贤自觉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坚定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的伟大实践收获良多。

参观白银厂凤凰山开采区,通过讲解员讲解和实地参观,我被老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深深震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前夕,“白银厂有色金属公司”在兰州正式宣告成立,新中国第一个大型铜基地的建设很快被列入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确定由前苏联政府援建。根据两国政府签定的协议和我国重工业部、国家计委批准的设计任务书,白银厂凤凰山矿床的开采方法为露天开采,并采用大爆破的方法进行剥离。经过上万名建设者和解放军指战员艰苦卓绝的努力,半年内先后进行了三次大爆破,总装药量达到15640吨,其中第三次大爆破,不仅其规模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在全世界也是最大的,而且它采用的抛掷爆破和松动爆破技术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然而,这样伟大的创业,却是在极为严酷的环境下进行的,零下二三十度,漫天的风沙,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第一代白银人,靠得是不畏牺牲,不念回报的理想主义精神。我在博物馆,看到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和创业者们使用的工具及生活用品,难以想象的简陋。

从第一爆,到1988年4月闭坑。33年间,白银矿采矿石6634万吨,生产铜等金属500万吨,铜产量、产值、利税连续18年,位于全国同行业第一。白

银的创业者们以“打个铜棺材,埋在火焰山!”的英雄主义,创造了世界奇迹,也同时缔造了闻名海内外的“铜城”,因矿建城,也便有了今天的“白银市”。

如今的白银矿,已经转向地下深处开采。矿坑,成了让人瞻仰的遗迹。也成了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矿坑遗址旁,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刻着小平同志的题词“你们这里是艰苦奋斗!”艰苦奋斗出新天,这就是白银的过往,也必将成就白银的未来!

在参观白银国家矿山公园和博物馆活动中,博物馆内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幅幅影像,真实展示了白银第一代创业者克服重重困难,心贴心、肩并肩、手挽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地创业精神,还原了白银矿业自力更生的开发历史,再现了几代白银人坚韧不拔、艰苦卓绝的创业历史,无声讲述着这座城市的家国情怀和不屈意志。

我跟随着讲解员耐心细致的讲解,参观了博物馆整个展区,观看和聆听了白银开拓者的优秀事迹。此时此刻的场景还原了白银矿业自力更生的开发历史,再现了几代白银人坚韧不拔、艰苦卓绝的创业历史,无声讲述着这座城市的家国情怀和不屈意志,这些让我震撼不已:我感觉再一次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洗礼和理想、信念的精神洗礼,重温了共和国有色金属的光辉历程,感受到铜城开拓者的激情岁月,体会到“艰苦奋斗、创业奉献”的白银精神。

重温历史,不忘初心。“五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向全国人民提出的彻底摧毁国民党政权、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新政权的行动纲领。“五一口号”极大

作者简介:孙媛,女,硕士,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国家审计师。

地鼓舞了艰苦斗争中的各民主党派,他们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声明,热烈响应,公开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走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协商建国的序幕由此拉开。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格局由此奠定,掀开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的历史篇章。

九三学社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九三学社历史和命运的重大转折,标志着九三学社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九三学社正式接受新民主主义道路,从而接受此后的社会主义道路,标志着九三学社的革命历史被社会所公认,也标志着九三学社从一个中间党派和学术性政团正式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党,预示地决定了后来九三学社作为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历史地位。正是因为响应“五一口号”,九三学社作为民主党派之一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新时代的九三学社社员,我们将以纪念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75周年为契机,不忘合作初心,弘扬九三学社老一辈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中,积极发挥更大作用,在社会服务中展示更大作为,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为建设“兰白核心经济区建设”、“兰州—兰州新区—白银—三角型经济发展模式”和推动甘肃省“强省会”战略发展贡献九三力量。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今回眸,我们完全能够明晰“五一口号”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及其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建设的重大影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九三学社的自觉选择,也是九三学社不断发展前进并有所作为的根本保障;更加深入认识到自己作为一名民主党派成员的职责使命,对做好参政议政工作也有了更清晰思路。我将始终坚定政治立场,锤炼参政议政能力水平,建言资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责任编辑:常海哲

(上接第17页)

精准把脉、对症施策,精准开展参政履职工作。

三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政治站位、明确历史方位、找准自身定位,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中共二十大为参政党的自身建设进一步明确了着力方向。我们要始终把自身建设作为一项长期性、根本性、基础性的战略任务,以执政党为师,不断深化对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参政党,怎样建设参政党”的认识把握,确保自身建设守正创新、与时俱进。要继续着眼于多党合作事业的长远发展,严把质量关,抓好骨干党员和青年党员的培养,加强后备干部队伍梯队建设。要继续加强“五种能力”建设,强化战略思想、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不断增强领导本领和领导能力。要继续抓好关键少数,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建立健全廉洁风险预警提示活动长效机制,提升党内监督工作实效。要继续加强基层组织

建设,持续推进基层组织创优工作,不断增强组织活力和凝聚力。要开展“履职能力建设年”活动,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和谐型”机关建设,继续健全工作制度体系,确保制度动起来、用起来、严起来,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笃志前行,虽远必达。农工党甘肃省委会将团结带领全市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毫不动摇的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优势,着力激发农工党人才荟萃和专业特长活力,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时代,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奋力谱写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新篇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责任编辑:李霞

完整准确全面把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

刘良军

【摘要】在全党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要求是“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四位一体”,相互支撑、彼此联系、有机统一,是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心走实的重要方法论。党员干部深悟开展主题教育的现实与历史意义,严格遵循主题教育总要求,必能藉由主题教育达至信念坚定、信心百倍,精神抖擞、能力提升,坚决把党的二十大擘画的蓝图一一落到实处,于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党和人民赢得更大的胜利和荣光。

【关键词】把握 主题教育 总要求

在全党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要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战略目标,迫切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党中央确定在全党开展这次主题教育的主要考量。”^①开展主题教育,必须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与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使主题教育真正取得实效,转化为党员干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前进动力、奋斗精神、必胜信念与务实行动,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断开新局、有新气象。尤其党中央强调,开展本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是“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②总要求指向明确、针对性极强,为主题教育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要求主题教育必须按照总要求扎实推进、求真务实,而不能标新立异、随意散漫,乃至浅尝辄止走过场、似是而非流于形式。

一、总要求是有机统一体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是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心走实的重要方法论。而进一步言,总要求“四位一体”,相互支撑、彼此联系、有机统一,要求主题教育必须循序渐进、持续推进,做到一步一个脚印,力戒心浮气躁、操之过急,贪大求洋、

急于求成,甚至虚与委蛇、做表面文章。

(一)“学思想”是前提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学思想是主题教育卓有成效开展的基点基础、前提前置,也是主题教育的有机组成、重要内容。党员干部沉下心来、聚精会神,研机析理、心无旁骛,确保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内涵内蕴、道理哲理原理一一弄清楚、搞明白,才能成竹在胸、行动笃定,通过主题教育实现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的各项具体目标,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二)“强党性”是根本

党员干部学思想的过程,应该、也必须是强党性的过程,只有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才能越发站稳党性立场、提高党性觉悟、坚守党性原则、增强党性自信。无论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还是“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无论是“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还是“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百年辉煌正由党性坚强的一代代共产党人挥毫书写,也由此为今天党员干部强党性树立标杆、给出榜样、作出示范。把强党性作为主题教育取得明显成效的标志,又在党性激励、引领下拼命硬干、埋头苦干、崇尚实干,党员干部才能不负初心、不辱使命,在新征程上为党和人民再创佳绩、再铸辉煌。

作者简介:刘良军,男,湖北省荆门市委党校副教授。

(三)“重实践”是关键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一方面,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品格、时代特征。因此党员干部学思想必须坚持知行合一、以知促行。另一方面,科学的理论只有用于指导实践,才能彰显理论的魅力、实践的伟力。于主题教育中注重实践,既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又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对科学理论的全面认知、深刻领会,党员干部才能既政治过硬,又本领高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力奔跑,续写荣光,屡立新功。

(四)“建新功”是目的

学习有没有实效,不能停留于开了多少次专题会议、组织了多少次专题理论学习、写了多少页专题读书笔记,而必须看最终转化、运用的成效如何,看是否真正履职尽责有新作为、干事创业有新状态、造福群众有新变化。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因此党员干部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以主题教育为契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争分夺秒、只争朝夕,矢志在新征程上再建新功,才能涓滴成海、星火燎原,“直挂云帆济沧海”,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驶向光辉灿烂的彼岸。

二、如饥似渴学思想

我们党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需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在全党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学思想”位列总要求之首,充分说明不学不足以铸魂、不学不足以增智、不学不足以正风、不学不足以促干,只有如饥似渴学思想,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学习好、领会好、掌握透,才能推动主题教育向纵深发展,达至预期目的,实现既定效果。

(一)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行动指南,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制胜法宝。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面临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正是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导下,我们越是艰险越向前,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新进程,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由此来看,党员干部学思想首先要明悟思想的真理魅力、实践伟力,始终坚持以这一重要思想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在新征程上书写新篇章、谱写新奇迹。

(二)透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用以净化灵魂、增加智慧、增长本领、增加信心,努力成为做好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丰富、寓意深刻、体系完整、逻辑严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纲领。无论是内在紧密联系的“十个明确”、深谋远虑提出的“十四个坚持”、充满高度自豪自信的“十三个方面成就”,还是前进道路上必须坚持的“六个必须坚持”,无不彰显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事关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重大问题的深邃思考、深入研究、深远谋划。^[2]党员干部如饥似渴学思想,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应对有方、措施有力,见招拆招、游刃有余,牢牢把握事物发生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

(三)切实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凸显的鲜明人民性与强烈的担当作为精神,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持续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为人民谋幸福、守住人民的心,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根红线,因而学思想不能仅仅满足于记住了多少原著原文原句,而必须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深刻认识到不断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这一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是全面小康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还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无论是厉行法治,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中华大地,还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祖国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这一重要思想心念的就是替民谋利、为民造福,诠释的就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因此党员干部如饥似渴学思想,要勇于对标对表,站稳群众立场、增进群众感情、密切联系群众、全心为群众服务、广泛凝聚群众力量,与亿万群众一道同心共筑中国梦。

三、持之以恒强党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员干部党性强,党有力量,国有希望,民有指望。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强党性”赫然成为总要求之一,要求党员干部必须以学铸魂、以学固本,不断在强党性方面有新气象、新作为。

(一)对党忠诚。“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党员姓党、干部为党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党员干部强党性,必须首先聚焦于对党忠诚,全心全意忠于党、一心一意跟随党、一生一世不叛党。应该看到,对党忠诚绝非虚幻的概念、抽象的说辞,而是实实在在体现在党员干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上。尤其“两个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要求党员干部强党性,必须坚定不移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与时俱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员干部才能彰显鲜明的党性立场、坚定的党性原则、深厚的党性修养。

(二)为民造福。治国有常,利民为本。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矢志不渝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目标,决定了党员干部强党性,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切实把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让群众有可持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新生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唯有涵养时时放心不下的高度政治责任感,紧紧聚焦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倾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满足群众变化了、变化着的新需求,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长足进展,党员干部才能赢得群众、守住群众的心,为党长期执政奠定深厚、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敢于斗争。“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不

怕牺牲、英勇斗争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坚持敢于斗争是党百年奋斗取得重大历史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5]由此党员干部强党性,必须在实践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新时代新征程,矛盾风险挑战只会越来越严峻尖锐,有时甚至会遇到惊涛骇浪,要求党员干部责无旁贷、事不避难、义不容辞,越是艰险越向前,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有了这种昂扬精神、必胜信念、刚强斗志,才能越战越勇、愈挫愈奋,把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可观可感的生动现实。

(四)清正廉洁。“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有没有坚强的党性,能否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品质是重要评判标准,只有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才能凸显党性纯粹、质地纯正,不含杂质、不掺水分。毋庸置疑,前行途中,影响、制约党员干部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毒仍然存在、雾霾依旧浓厚,对党员干部的考验只会加大、不会削弱,因此要求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永远在路上,丝毫不能存有麻痹思想、松劲心态、厌战情绪、侥幸心理。“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始终保持敬畏心理,言语有分寸、行为有底线,拒腐蚀、永不沾,党员干部才能俯仰自如、问心无愧,始终坦荡坦然、光明磊落。

四、身体力行重实践

哲人有言,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党中央明确提出,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要贯彻落实“重实践”要求,边学思想边重实践。无疑,这既指明了主题教育的行为遵循、行动路径,也说明只有边学习边实践,才能深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创造力、发展自信心,发自肺腑地认可这一重要思想是真正行得通、真管用的科学思想。

(一)重实践,强调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样需要与实际相结合,善于把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道理哲理运用于实际工作中,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对其

精华精粹精髓的理解和把握。尤其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只会越来越多、形势环境越来越严峻复杂,只有切实解决好过河的“船与桥”问题,才能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毋庸置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攻坚克难、披荆斩棘的重要法宝、锐利武器,要求党员干部必须以知促行、知行合一,果断地将其运用于实践、指导实践。

(二)重实践,要求修好调查研究必修课,从实践中求真知、获灼见、谋良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6]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深入城乡院落,无疑是党员干部重视调查研究、践行调查研究的典范。同时也正是在广泛调查、深邃洞察、深入思考、深刻研究的基础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石破天惊、喷薄而出,既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前瞻智慧的结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决策权。党员干部把调查研究作为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三)重实践,要求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开拓事业发展新天地。联系群众鱼得水,脱离群众树断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要是笑,就说明政策好。要是有人哭,我们就要注意,需要改正的就要改正,需要完善的就要完善。”^[7]明显启示党员干部只有把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是非成败的根本标准,才能让群众有可持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坐在办公室里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唯有主题教育过程中既把思想学习好、领会好,更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甘于拜群众为师、善于向群众请教、虚心向群众学习,才能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开展工作得心应手、有条不紊。

(四)重实践,要求越是条件艰苦、环境复杂、任务艰巨、矛盾突出的地方,越需要舍我其谁、义不容辞、事不避难。应该看到,前进路上,“好吃的苹果”

“容易摘的桃子”基本上已经消失殆尽,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难涉的险滩、难爬的陡坡,设若口中高喊“重实践”,实际上却是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困难即回头,必然干不了事,也干不成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彰显习近平总书记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顽强的斗争精神,正是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看齐的标杆,要求既然是重实践,就得敢于接“烫手的山芋”,勇于踩“钢丝绳”,无畏在“悬崖边跳舞”,于经风雨、见世面中壮筋骨、增智慧、长才干,努力成为干事创业的能工巧匠、行家里手。

五、与时俱进建新功

新时代是大有可为,也必然大有作为的时代。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将“建新功”作为总要求的“压舱石”提出,充分说明主题教育坚持明确的目标导向,必须以党员干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根本价值归依。党员姓党、干部干事,党员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只有把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立新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也才能以主题教育为契机,不待扬鞭自奋蹄,夙兴夜寐不懈怠,撸起袖子加油干,在新征程上跑出属于自己的那一棒,跑出好成绩。

(一)在促进高质量发展上建新功。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唯有经济发展不断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党员干部建新功,要求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方面殚精竭虑、孜孜以求,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这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原创性理念,助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统筹推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实现供需在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8]

(二)在增进群众福祉上建新功。坚持人民至上,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是党性使然,

也是实践要求。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让人民生活幸福、不断过上好日子是“国之大者”，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事实也是如此，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意味着既在物质文化生活上有了更高目标，也同步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提出要求，“倒逼”党员干部为民造福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没有大功告成的终点。无论是让老市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还是推动新市民更好融入城镇，在城镇安居乐业、体面生活，抑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幸福生活家园，都决定了党员干部必须把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最广大群众，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三)在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中建新功。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前提，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根基。诚然，前行途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增多，既有“黑天鹅”扑朔迷离，也有“灰犀牛”咄咄逼人，越发要求把安全置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中之重，厚植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基础，让人民群众“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因此党员干部建新功，必须提高防范化解各种风险隐患的本领和能力，做到精准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要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统筹考虑有可能来自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界和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的风险挑战，把相关准备工作做在前，既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努力打好先手棋，又处变不惊、临危不乱，尽力打好主动仗。尤其要警戒自己：祸患常积于忽微，从而始终坚持落细落小，抓基层、打基础、固基本，努力消除群众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隐患，促进平安中国建设提质增效。

(四)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建新功。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以主题教育推动党员干部建新功，关键还是要着眼身边、眼前、当下，把本职工作做好，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干事创业、锐意兴业。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不难想象，党员干部平时在岗位不在状态，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又或者遇事推拖绕躲，情愿当“鸵鸟”、作壁上观，还能对党尽责、为国奉献、为民造福？既然来当兵，就知责任大。无论党员干部身处哪个行业、某一岗位，都必

须谋其位、履其职、尽其责，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有所建树。唯有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责任意识、担当精神，激发履职尽责的内生动力，既眼里有活，又马上就办、办就办好，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引领群众推动共同的事业稳中求进、行稳致远，为一域增光，也为全局添彩。

结语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一方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的一条重要经验；另一方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这一重要思想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新时代新征程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根本要求。党员干部深悟开展主题教育的现实与历史意义，严格遵循主题教育总要求，认真对标主题教育根本任务，努力实现主题教育具体目标，必能藉由主题教育达至信念坚定、信心百倍，精神抖擞、能力提升，坚决把党的二十大擘画的蓝图一一落到实处，于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党和人民赢得更大的胜利和荣光。

参考文献

- [1]新华社.把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引向深入【N】.人民日报,2023-04-01(1).
- [2]新华社.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N】.人民日报,2023-03-31(1).
- [3]姜淑萍.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N】.人民日报,2021-07-14(9).
- [4]黄坤明.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N】.人民日报,2022-11-16(6).
- [5]李刚.坚持敢于斗争【N】.人民日报,2021-12-17(9).
- [6]肖贵清.善用谋事之基、成事之道【N】.光明日报,2023-03-28(2).
- [7]新华视点微博.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是哭是笑【N】.京华时报,2015-06-17(1).
- [8]本报评论员.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3-03-16(1).

责任编辑：马霞

发展社会学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兼论西部社会学的核心议题

王雄刚 邹平惠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为新发展社会学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事实上，新千年以来，发展社会学遭遇“终结论”质疑。在全球化和后现代多元话语分析当中，发展或者说社会的发展似乎“走到了尽头”。面对“增长极限论”的系统性“解构”，西方发展经验无以为继。就在发达国家深陷“发展困境”，并难以自拔之时，近年来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为发展研究开辟了新的视域，特别是中国“市场趋向”的成功转型，促使转型发展走上了快车道。毋庸置疑，作为世界新的发展“中心地”，中国发展中呈现出的新现象拓展着发展社会学的新语境。鉴于此，“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成为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更开拓着“西部社会学”研究的“在地化”路径。

【关键词】发展社会学 中国式现代化 西部社会学 核心议题

社会学关于“发展”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社会动力学”“社会变迁”等经典命题专注发展问题。二战后，兴起中的发展社会学主要关注走上独立道路的民族国家如何实现发展？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研究范式，促使发展社会学一度成为“显学”。然而进入2000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普遍的“发展乏力”状况，并呈现在全球化和后现代多元话语分析当中，这种“发展乏力”为发展社会学“终结论”提供了“话语”依据。值此学科危机难解之际，中国、印度和南美等新兴发展国家的发展经验无疑拓展着发展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拯救”着发展社会学。聚焦中国现实，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逻辑，中国在发展理念、发展动力、比较优势、约束条件、瓶颈问题、发展目的等一系列重大发展议题上，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为构建新发展社会学奠定了基础。^[1]

一、发展困境及发展社会学的学科危机

(一)发展的困境及现代性反思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基本问题，学术界对发展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关注的是特定

社会的整体性、结构性变革；另一方面强调发展的话语表达，即发展的话语权。当前有关发展的研究明显倾向于发展话语权的讨论，从“现代化”“依附论”“新发展观”到“人道的”“可持续发展”，呈现出“社会—经济”与“利益—主权”思潮之间的微妙切换。这使得发展社会学、发展人类学取得了发展经济学曾经主导的话语领地，后现代思潮更是宣布“后发展”时代已经到来。

在经典社会学看来，将发展归结为社会变革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社会变革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基本常量。二战以来兴起的发展研究，实质上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基础之上，审视历史的一种“预言”方式，是一种“特殊的普世主义”。^[2]在人们重新审视这种基于发展而来的“现代性”时，无疑暗载有深重的“现代性后果”，“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有成就的生活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3]事实上，发展的话语表达与“现代性话语”(modernity discourse)密不可分，正是借助着“发展话语权”，现代性取得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议题研究”(14ASH003)。

作者简介：王雄刚，男，博士，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邹平惠，女，甘肃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宗教教研部教师。

“流动的”合法性,流动的“液化”力量从西方国家转移到非西方国家,从“制度”转移到了“社会”。^[4]伴随着流动的现代化,资本、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再次漂移,最终使得世界的发展中心转向中国、印度和南美等国,西方国家的发展优势趋向衰退。

新千年以来,西方国家“发展乏力”的状况致使有关“发展”的研究集体“失语”了,人类社会面临全球性问题及发展困境的严峻挑战,于是不得不全面反思传统的发展观。传统发展观实质上是所谓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通过理论的“模式化”来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目标是实现非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现代化理论强调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传统—现代”的转变,事实上却最终导致了南美、非洲等国家的“畸形”发展,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新的世界体系中成为持久的“边陲”地。

二战以来的现代社会发展总体上经历了从“增长发展”到“综合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经济与缓解贫困成为民族独立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些国家一方面渴望凝聚力并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渴望富有活力并与时代同步,这造成了社会内部产生极不平衡。”^[5]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联合国及世界银行实施了一系列针对落后国家(地区)的援助计划来支持“发展”,这一时期,人们普遍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仍深陷于贫困当中,贫富两极分化、产业畸形、资源浪费和生态失衡等问题凸显,社会矛盾加剧。20世纪70年代前后,前期发展较好的拉美国家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境地,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促使人们反思“增长发展”的弊端,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为多数人带来福利,因此“综合发展”应运而生。在综合发展观看来,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构,应协调综合发展,东亚模式的成功更是坚定了人们对于社会文化因素促进发展的重要作用。然而2000年以来,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致使东亚发展也陷入举步维艰的尴尬境地。

在“综合发展”陷入困境之时,“极限增长论”重提“零增长”,“零增长”的本质最终并未跳出“西方中心论”和“西方话语霸权”,存在试图通过各种限定,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质疑。因此可以说,“无极限增长论(增长发展)”和“极限增长论”都存在极端主义倾向。通过上述分析,实际上对人类社会来说,发展是必需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发展?采用何种方式发展?

(二)发展社会学的发展观

发展社会学专注于社会发展研究,致力于社会发展何以可能的主题,形成了体系化的理论学说。发展社会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70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研究命题和分析框架。主要的理论范式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社会转型理论和增长极限理论等。

20世纪50年代末,基于西方的发展经验,形成了“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研究中心在美国。主要学者有斯梅尔塞、列维、英格尔斯、艾森斯塔尔德和贝尔等。现代化理论自产生起就占据着发展社会学的主流地位,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在经典现代化理论那里,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等因素推动着现代化进程,现代化理论以“传统—现代”为基本分析框架,一方面旨在阐明西方发展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鼓吹非西方国家应“以西方国家为样板,走西化道路。”^[6]依照这样的理论逻辑,实质可归结为“西方中心论”。

20世纪60、70年代,基于拉美、非洲的发展经验,在反思“西方中心”发展观的基础上形成了“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遭遇经济衰退,盲目乐观的工业发展、唯经济增长论走到了尽头。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转移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又对非西方发达国家开展了一系列“掠夺式”的经济贸易和“援助计划”。这使得拉非国家的发展更趋“畸形化”。在劳尔·布雷维什(Raul Prebisch)看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扩张对落后地区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影响,继而提出“核心—边陲”的分析框架。^[7]在依附理论看来,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边陲地位,中心发达国家控制着外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依附于发达国家。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以空间建构的“核心—边陲”为分析框架,试图打破现代化理论单线型“传统—现代”的唯一时间维度发展观。然而由于过于强调“核心—边陲”的对立性,使得依附理论被贴上了“静态”研究的标签。基于这样的不完备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提出“世界体系理论”(The modern World—System)。在沃勒斯坦看来,现代世界体系采取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式,正是近代以来“中心—外围间的劳动分工”(Axial division of labor),导致世界经济形成不同

的区域: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8]世界体系理论以“中心—半边陲—边陲”为基本分析框架,从时间、空间多维度动态角度分析社会发展,一方面揭示了“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另一方面“消除了第三世界永远处于依附地位而得不到发展的悲观看法。”^[9]

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拉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急需改革发展,还有东欧国家的转轨缘由,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一时异常活跃,提出所谓“华盛顿共识”,主张减少政府干预、金融自由化和促进贸易等举措,实现这些国家的转型发展。然而许多年过去了,多数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却在持续加剧,增长发展无从谈起。东欧国家急于求成的“休克疗法”,最终走上了“转型休克”,呈现为有转型、无发展。基于这样的现实,进入2000年以来,国际学术界开始反思、质疑“华盛顿共识”,于是“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中国的渐进转型观”等成为发展社会学讨论的热点话题,并为转型社会学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视域。近年来中国市场转型取得的巨大成就,无疑在更深层次上拓展着“转型理论”,“转型发展”已成为“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代名词,可以说“社会转型理论”(The theory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业已形成。

转型理论基于“传统/社会主义—现代”的变迁类型,^[10]强调市场转型的“导引”作用。随着近年来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有别于西方国家的转型实践将进一步拓展转型社会学的理论体系。

在发展社会学的视阈里,传统的发展观有着明显的两种类型的不同倾向:一种是侧重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另一种是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零增长观。唯经济增长论坚持“西方中心主义”,势必掉入不平等的恶性竞争中;而零增长论又过于“杞人忧天”,摒弃一切增长的发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不现实。事实上,人类社会必然是要发展的,关键是怎样发展,实质上要求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近年来,中国倡导“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无疑为“新发展观”注入新的活力元素。

(三)发展社会学面临的学科危机

20世纪后期,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遭遇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深刻变革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发展远比所料想的要复杂的多,发展既不能整齐划一为直线型路径,也不能将发展仅“锁定”于一个短的时期内,这样往往会掉入所谓的“发展陷阱”。以往对于现代性的基本看法主要

基于西方文化的希望与期待,而不是基于现实,一个赤裸裸的事实总是被忽略,即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准是建立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巨大消耗基础之上的。^[11]这促使发展社会学面临严重的学科危机。

首先是来自研究对象的挑战。很长时间内,发展社会学主要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特别关注的是二战以来新兴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研究这些“欠发达”国家的具体发展实践。在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总结概括所谓发展的理论及发展模式。然而当下许多发达国家更是面临种种发展困境,经济衰退、社会结构僵化、资源匮乏、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等等。这些发展困境已严重威胁到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因此重新反思发达国家的发展研究势在必行。

其次是世界发展中心地的流动。世界发展的“中心地带”起先在西欧,之后转向北美,现在正在向中国、印度、南美等国流转。^[12]在经典社会学的社会发展理论那里,围绕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动力学”“社会进化论”取得了主流话语权;在北美的当代社会学发展理论那里,“现代化”“人道的发展”取得主流话语权。当前随着世界发展中心地的流动,可能促使之前的发达国家失去“核心”地位,而新发展中心地涌现的新问题势必拓展着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第三是来自“增长极限理论”的挑战。在“罗马俱乐部”学者看来,传统的发展观势必造成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进而产生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社会弊病。解决这些弊端的办法只能是实行“零增长(自觉抑制增长)”发展战略。^[13]罗马俱乐部的理论跳出了以往国家间谈发展的局限,强调付诸于人类的整体发展,大大拓展了发展研究的视野。

第四是来自社会学文化转向的挑战。近年来文化社会学在国际学术界兴起,在文化社会学的视阈里,发展必须首先回应“意义”和“价值”问题。以往的发展观只关注发展客体的增量,却忽视了发展主体的主观感受,发展到底为了谁?发展能增进大多数人的福祉吗?等等诘难,使得当下的人们感觉以往的发展体系及其话语表达暗含有服务“精英社会”的倾向。换句话说,所谓的发展已成为过时的观念。

由于以上诸种原因,进入21世纪,学界充斥着有一股“发展社会学终结”的论调。在笔者看来,发展社会学之所以式微,恰恰是原有理论和研究方法跟不

上新发展实际的缘故。即,现有的发展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发展中的新现象,现有的研究方法不能较好地切入发展中呈现出的新问题。因此发展社会学急需拓展研究视域。

党的十九大宣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国内社会矛盾的主要焦点已然成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所谓发展的失衡,主要是指发展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等存在结构性的不平衡,从而制约了整体性的全面提升。基于这样的现实考量,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为发展社会学开拓了新的视域。换句话说,发展社会学理应积极回应中国发展不平衡的实际。

二、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时代语境

(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十九大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科学论断,其鲜明特征在于以“发展”替代“社会生产”,这鲜明的反映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在过去很长时间内,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国家总体上呈现为“物资匮乏”。因此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然而时至今日,“物资短缺”的问题业已解决,缺吃少穿等绝对性贫困问题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生产过剩”、“道德滑坡”、生态环境破坏等等,新的社会发展问题凸显。鉴于此,实施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

纵观近代以来,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无一不与国家对社会矛盾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否准确密切相关。在革命年代,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自由的国家,当时“统一战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国整体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4]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大力发展生产力。然而这样的正确判断却由于“反右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以至“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最终未

能坚持下来,使得国家和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

1978年的改革开放,致力于解决被“开除球籍”的困境,国家适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5]这条科学论断立足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实际,在反思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曲折经验及“文革”重大挫折的基础上,重新观照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的社会状况,实质上是对“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进一步凝炼。基于这样的科学判断,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各项发展指数居全球排名前列,特别是2010年以来经济发展稳居世界第二,社会建设取得骄人成就。

经过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没有变,实质性的变化是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我国社会呈现两大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是人民需求的新变化和高要求;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水平和新问题。^[1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方面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环境、生态之间,阶层、族群、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各种不利因素越来越制约着国家复兴发展的进程。有鉴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明确提出“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全方位推进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7]这一科学论断使得“发展不平衡”超越了学者的“呼吁”,也已进入正在解决的时代命题。

(二)发展不平衡的新语境:社会学理论的“空间转向”

新千年以来,“空间化”观念冲击着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社会学在面临全球化、城市化和区域化这些重大而现实的空间化问题之后,理论层面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转向”。^[18]这种转向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吉登斯、布迪厄等当代理论大师在现代性框架下重新审视空间与社会交互关系的基础上,强调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重要性;二是后现代理论家采用元地理学概念和隐喻来探讨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世界。^[19]

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界日益关注“空间”概念,在列斐伏尔那里,空间是主体性存在的策略和场所;福柯将空间诠释为一种实践性权利与规训,即作为社会权利关系的空间;米德坚持空间是一种符号体系;柯林斯认为空间也是一种情感体验,等等。近年来,在反思前期理论的基础上,社会学界进一步关注到“空间的失语”已严重限制到理论的解释力,因此建构空间的一般理论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

早在社会学初创时期,马克思就敏锐的察觉到资本主义兴起必然导致时间对空间的消解。早期一些理论家满怀信心,认为经济全球化终将快速形成“地球村”,但当前“区域化”明显的事实告诫世人,“世界一体化”的理想仍然为时尚早,特别是美国新政府上台以来打出的“美国优先”以及各种“退群”举措更说明了世界空间的“区隔”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大。

回到元地理学的讨论话语中,所谓大陆的神话、民族—国家的神话、东方与西方的神话以及地理一致性的神话等,这些现在想当然的世界“区域”最早其实都是由军事思想家确定的。^[20]进一步来讲,冷战时期所谓“三个世界”的划分本质上可归结为“政治—经济”范畴。当前中国东、中、西三部分的划定,无疑烙有“政治—经济”思维的印记,当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可能只是权宜之计。然而当国内的发展走到今天,我们必须直面这种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并且适时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发展是人类的永恒主题,社会发展是社会学及整个社会科学的核心范畴,每个国家都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发展”权利。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急速发展期。进入21世纪,国内发展“异化”现象凸显,学界再次掀起了有关“发展”的讨论:发展究竟是什么,发展到底为了谁,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当然新千年初期的“科学发展观”其主旨无疑是在应对各种“发展的异化”问题。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新的发展理念具体是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21]

在新时代的场域,如何破解当前的发展困境?换句话说,新时代之前有关发展不平衡的讨论只是学界和“弱者”的呼吁,然而新时代的到来,已然使得“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得到公众和政府的普遍认可,并在国家层面的施政策略上给予极大的关照。因

此当前如何摆脱所谓的“发展陷阱”,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不能依旧处于呼吁层面,而是要从可行性的角度给予深入探讨,继而提出相关决策咨询。

三、西部社会学的核心议题

(一)西部社会学研究开启的动因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呈现出的普遍“发展乏力”状况,致使西方国家对发展研究失去了以前的“热衷”,论及者较少。然而中国的巨大发展和潜藏的深厚发展力,为发展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实践总是先于发展理论的解释,因此当前国内发展社会学研究实质上并未突破借用西方理论范式,作“事后”解读中国发展的“译介”事实。鉴于此,要走出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困境,需要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作本土化、地方性的实地调查研究,进而在学科理论建设上从三方面展开努力:拓展研究对象、丰富研究视角、构建更具解释力的研究框架。^[22]

西部社会学研究的动因恰恰出于对“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持续关注 and 反思,这无疑拓展了发展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地区发展不平衡已然成为发展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在早期经典社会学那里,西欧各国地域狭小,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并不明显,因此并未将之列入核心议题加以讨论。后来研究中心转至美国,美国国内存在西部与东部、北部与南部的发展差距,但由于美国建国仅有200余年,相对地广人稀,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通常借助新移民开发、技术革新、工业化、城市化等手段加以“消解”。相比之下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传统社会一直呈现为“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在很长时期成为推动西部及边疆地区开发的主要动因。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西部自身矿产资源的禀赋优势,加之国家的战略考虑,将许多工业项目投于西部,促使20世纪60、70年代西部的各项发展较为领先。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在“东部优先”发展的话语主导下,加之东部交通运输的发达,并且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动下,绝大数产业项目、商贸中心在东部兴建,随之东西部的发展差距持续拉大,2000年以来实施的西部大发展战略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上已然并未奏效。进入新时代,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影响和制约到国家整体性的复兴发展。新时代,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向西开放”战略的实施正是出于解决整体性结构发展问题。党的十九大关于社

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更是将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这也正是西部社会学多年“呼吁”的意义所在。

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不仅证实了西部社会学关注地区发展差距的基本“问题域”为真命题,更为解决西部“欠发展”问题提供了现实依据。直面西部地区社会结构调整和发展缓慢的事实,西部社会学研究必须从探究其迟缓的原因入手。除去国家战略的考量,所谓“西部问题”本质上属于发展观的问题,即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传统的发展思维,自以为有“富足”的资源,然而却忽视了经济结构的及时调整;片面追求经济量的增长,忽视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过多地依赖外部动力推动式的发展,忽视内生动力的培育,等等。最终致使区内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资源深陷于结构性不平衡。基于这样的发展困境,陈文江教授认为西部“迟发展”的实质是一个“结构失调”的问题,^[23]刘敏教授提出“两源动力聚合转换理论”,以期通过“区外动力嵌入性发展”“内外源动力聚合型发展”“内源动力扩展型发展”的层递式推进、螺旋式上升,^[24]解决西部发展的动力问题。正是由于这样一批西部学者的长期坚守和持续的关注西部自身发展的学术积累,才成就了当前西部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合法性”。

(二)西部问题与西部社会学研究

近年来,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区域均衡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西部与东部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西部社会学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考量,旨在通过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西部社会发展的困境,探索建立“本土化”研究的范畴体系、理论框架和有效方法,为地方性发展作出社会学的理论解释和方法层面的探究。

西部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性前提在于“西部问题”的真实性。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各种困扰问题层出不穷,然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因为种种缘故总是被“遮蔽”了。2000年以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使得西部“欠发展”成为“政治”共识,民间疾呼的所谓“富饶的贫困”“甜蜜的悲哀”终于得到普遍认可。尤其是,“西部大开发”呈现为事实上的“西部大开挖”,本来用于促进西部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倾斜性投资最终沦为对“资源的挖掘”,更为甚者破坏了当地脆弱的生态,使得西部进一步呈现为“满目疮痍”。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东西部之间存在事实上

的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源自于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更在于一种国家规划的发展战略及其在“东部主义”话语主导下的发展思维和践行的现代化模式。从深层次上讲,“东部主义”的发展思维和“西部话语”的呈现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可以说“东部主义”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具体来讲,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加快解决“短缺经济”时代生产力低下的困境,国家在发展战略上鼓励“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采取“用空间置换时间”的发展路径,^[25]即所谓“梯度发展”理论。这种设想的前提是“先富带动后富”,然而事实上,自此产生的发展差距却是愈来愈大。并且近年来,在“市场体制”“商品经济”观念的冲击下,“东部主义”的发展思维进一步获得了主导权,其运行的“合理性”也受到了政府和大众的普遍认可。这不仅严重限制了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使西部人正在逐渐丧失发展的“内生动力”,将“等、靠、要”视为一种“正当”的利益诉求。

西部社会学正是基于西部人本土价值关怀的维度反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站在西部的立场,重新审视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通过对“西部问题”和东西部发展路径的探讨,重新思考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研究和探讨西方社会学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解释力问题。最终意在通过本土化的研究建立起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方法和知识体系,为发展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实现理论自觉,尽“添砖加瓦”之力。

当前国内发展的不平衡突出的表现为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持续拉大。在这样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发展社会学理应、也势必解释回应这种凸显的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西部社会学也正是基于中国当前的发展不平衡,落脚于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通过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梳理,解释西部地区的“迟发展”缘由,进而从“结构—制度—行动”的角度探讨突破发展困境的合理路径,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破解世界普遍发展乏力困境提供智力支持。

(三)西部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东西部差距持续拉大。西部社会学旨在通过深入反思西部的发展方式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探讨西部的发展困境及如何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西部学者通过“西部话语”来审视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所关注的不是单一问题,而是要建立一套规范的研究体系,因此研究领域及核

心议题的明确成为开展研究的先导。

西部社会学研究之所以可成为有效的学术探讨,恰恰在于其强烈的问题意识。西部社会学站在西部人的立场,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西部“欠发展”实际,通过社会学的方法梳理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特殊问题,对限制和影响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根源做出合理的解读,继而为解决西部社会发展问题提供有效的路径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社会学可看做“关于西部发展的社会学”。鉴于此,西部社会学起初设想的核心议题是“西部迟发展的现状、缘由及应对”。具体包括:“西部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和东西部的差距问题;西部城乡社区发展和社会建设问题;西部人口、贫困、妇女和可持续发展问题。”^[26]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核心议题也随之在调整。

西部社会学萌发于事实上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起初主要是回应民众的“抱怨”和学者的“呼吁”,目的在于获得东部地区的“正视”和政府的“政策倾斜”。然而当前国内发展的整体时态发生了变化,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已经将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作为国家整体战略并付诸实施。这要求西部社会学必须适时给与理论解释,而不能只停留在“政策解读”;要给出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服务,而不能只停留在“事后总结经验”。

“西部社会学”命题的提出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在2014年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议题”时,陈文江教授就提出了“三大领域十大议题”的设想。三大领域,即:发展领域、生态领域和族群领域。十大议题,即:1.东西部差距和西部社会发展;2.西部城乡发展和城乡社区建设的特殊性问题;3.贫困和可持续发展问题;4.资源、生态与环境保护的问题;5.环境和社会发展相互协调问题;6.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公众权利和公众参与问题;7.西部多民族地区族群关系及其发展;8.西部地区社区的建设与发展;9.西部地区民族文化的基本结构、发展趋势、冲突和融合;10.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西部地区的传播及其与汉民族文化的冲突和融合。^[27]

在西部社会学研究的具体开展过程中,逐渐梳理出了社会学对西部发展问题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1.西部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研究;2.城市问题研究;

3.农村社区研究;4.贫困问题研究;5.人口流动与农民工问题研究;6.环境问题研究;7.西部发展研究的特点等。^[28]

通过对西部社会学研究领域和研究设想的知识梳理,可归纳出西部社会学研究实质上属于发展社会学,但与一般发展社会学不同的是,西部社会学关注的主要是“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具体而言,与现代化理论强调历时性的“传统—现代”范式不同的是,西部社会学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上均指向“传统—现代”;与“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关注“核心—边陲”“内部殖民主义”不同的是,西部社会学更强调“整体性”发展;与经典“社会转型”理论不同的是,西部社会学更具服务“国家战略”性,紧盯“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家“向西开放”战略。

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肯定了西部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西部社会学的核心议题由起初“解读”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到现在“解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并随之要为解决发展不平衡给出较好的决策咨询。这要求后续的西部社会学研究力争要戒除“叶公好龙”的心理障碍,从“后台”的“呼吁”迅速进入到“前台”的“角色”表演中。

四、结论与讨论

发展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起初主要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之后在全球化背景下关注世界各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继而探讨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虽然各时期研究对象的侧重点不同,但其目标均指向“现代化”。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表明,起步较晚的国家在其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几乎都经历了“外生增长模式”,即遭受了“现代性”渗透的后果。“这种‘现代性’既表现为现代的物质和技术成就,也表现为现代思想和制度。”^[29]这对发展国家来说,既是一种发展机遇,也面临“发展陷阱”,主要问题是如何较好的处理“西方自我中心”的困扰。当前学界倡议的“多元现代性”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基础,多元现代性的核心在于,“假定存在着由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状况所塑造的不同文化形式的现代性。这些不同形式的现代性在价值体系、各种制度及其他方面将来依然会存在着差异。”^[30]鉴于此,关于发展的研究应当随着发展“中心地”转变的实际推进经验研究,进而进行理论总结和提炼。当然,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恰恰为发展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最新的元素题材。

事实上,针对自身“独特”的发展实际,中国一直在推进理论提升。比如,新千年以来,“科学发展”的理念也已深入人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施“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将可持续发展提到绿色发展的高度,这使得中国的发展观有着明显的“超越性”。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置于现实的战略高度。二十大报告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从深层次思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全球性宏大议题。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西部社会学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为契机,立足西部“地方性知识”,着眼“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从而致力于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性问题。可以说随着西部社会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必将有助于推动国家整体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当然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的元素和活力,继而为解决世界发展问题提供可选择的合理路径。

参考文献

- [1]李培林.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J].中国社会科学,2021(12):4-21.
- [2][瑞士]吉尔贝·李斯特.发展史:从西方的起源到全球的信仰[M].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62.
- [3][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6.
- [4][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化[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33.
- [5]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244.
- [6]李亚雄.发展社会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3.
- [7]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46.
- [8][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M].吴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
- [9]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58.
- [10]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J].社会学研究,2005(01):1-24.
- [11]William A. Havil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Tenth edition)[M]. Singapore: A division of Thomson Asia Pte Ltd, 2002: 448.
- [12]何祎金.社会学地理中心的移位:一种学科史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02):4-18.
- [13][美]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M].李宝恒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0.
- [14]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 [1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39.
- [16]汪信砚,周可.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及其重要意义探析[J].江汉论坛,2018(12):5-10.
- [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 [18]景天魁等.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57.
- [19]文军.西方社会学理论当代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67.
- [20][美]马丁·W.刘易士,卡伦·E.魏根.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M].杨瑾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6.
- [2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97-198.
- [22]杨建华.走出发展社会学研究困境的几点思考[J].治理研究,2018(03):82-89.
- [23]陈文江,寇星亮.“学科本土论”与西部社会学的本土化实践[J].甘肃社会科学,2016(05):11-12.
- [24]刘敏.社会发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07.
- [25]陈文江,周亚平.西部问题与“东部主义”——一种基于“依附理论”的分析视[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1-12.
- [26]李勇进,陈文江.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学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8:178.
- [27]黄超.我国学者西部社会研究的取向和主要议题[C].哈尔滨:中国社会学年会“西部社会学”论坛论文集,2010:306-307.
- [28]周亚平等.东部主义与西部映射:西部社会学初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5-10.
- [29]杨建华.发展社会学通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431.
- [30][德]多民尼克·萨赫森迈尔等.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述[M].郭少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0.

责任编辑:李霞

邓小平机遇思想的本质特征研究

彭建涛

【摘要】邓小平机遇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旨在探索邓小平机遇思想的历史形成过程,从而获得邓小平机遇思想本质内涵特点的规律性认识。

【关键词】邓小平 机遇思想 特征研究

一、邓小平机遇思想形成的时空背景

古老的黄河流域早就闪亮了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尧舜禹、夏商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威震宇内,八方臣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泱泱大中国直到18世纪,还是康乾盛世,富国强兵。在东方巨人眼里,大洋彼岸的世界,无非穷乡僻壤、蛮荒小国,只配朝圣进觐,以我为师,天国绝不会降格屈尊,向西方学习。

与我们相反,那些“蛮夷之邦”却从未错过向中国学习的机会。盛唐时期,东瀛使者不畏艰险,越洋而来,他们不仅穿上宽袍大袖的唐服,练习笔走龙蛇的汉字,还带走了朱雀大街的图样、大唐帝国的典籍律令。与日本人相比,欧洲的好学精神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的四大发明,让他们如获至宝,一批批船队装上罗盘,扬帆东行,商人扔掉鹅毛笔和羊皮,印刷讨伐暴君的檄文,倒皇派摘下长剑和头盔,用火药枪击溃朝廷军队,建立起共和体制。

对西方的风云巨变,中华帝国却一无所知,当麦哲伦环游全球时,明朝嘉靖皇帝却下诏“禁海闭关”。文治武功震古烁今的乾隆大帝,也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回绝了扩大通商的要求。西方使节送来的火炮、船模和望远镜,被视为奇淫巧术,束之高阁。英伦三岛的机器轰鸣,美国哈得逊河上汽笛的尖叫,被紫禁城厚厚的宫墙隔开,中西差距在不知不觉中越拉越大。1776年,英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忽视海外贸易,闭关自守,使中国文明停滞不前。

19世纪上半叶,“日不落帝国”还是“世界工厂”,伦敦银行吞吐着天下财富。19世纪末,美国通过高速工业化,把昔日的宗主国远远甩在身后。拿破仑叱咤欧洲大陆时,德意志还是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但它以经济统一促政治统一,通过普法战争成了欧洲新霸。日本国在“二战”后脱胎换骨,以产业政策推动经济赶超。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亚洲“四小龙”从海上跃起,构筑了西太平洋一道亮丽的经济风景线。苏联改革的列车却脱出轨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工业革命以来的近300年,是世界各国百舸争流,群雄逐鹿的大变革、大竞争、大交流时期。而我们闭塞视听,盲目自大,把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拒之门外,撮捏苏联老大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单门独户。殊不知3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危机后,美国罗斯福实行了新政,借鉴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实行了国家干预,并创造了数十年的繁荣。我们也曾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一大两公”,后者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却没有看到,欧洲各国大搞“国有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并不比我们逊色。即使在食不果腹的年代,我们还曾以为,西方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却不知人家早就建立了社保体系,福利政策让我们望尘莫及。当我们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沾沾自喜的时候,国际贸易、资本全球流动已蔚然成风,当我们还刚刚拉开工业化序幕的时候,人家却早已抢占了信息化的制高点……,闭着眼睛捉麻雀,瞎子摸象,使我们一次又一次

作者简介:彭建涛,男,中共临泉县委党校教师,讲师。

一次与“历史机遇”擦肩而过。

古人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让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从而懂得外面的世界真精彩,懂得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我们不再视西方文明为洪水猛兽,而是大胆借鉴,为我所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邓小平冷静观察,深邃思索,敏锐论断: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机遇思想。当人类迎来新世纪的曙光时,中国已洗去百年耻辱,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放眼世界,经济全球化风起云涌;展望未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将更加紧密。一组新的发展机遇期,正从天边海际,潮涌而来。因此,认真研究邓小平理论中的机遇思想,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对于指导我们今后的社会历史发展实践,对于指导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邓小平机遇思想形成的过程框架

邓小平机遇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逐步形成的,它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萌芽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期,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都在调整过程中,因而来不及也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今后发展的轮廓作出清晰的深思熟虑的勾勒和描绘。因此,这一时期邓小平对于机遇问题的阐述往往是具体的、局部的、零碎的和朴素的。一方面邓小平亲身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痛苦经历中过来,深感安定团结的局面,非常重要,来之不易,值得珍惜。安定就是时机,稳定就是机遇。可以说,这一时期,邓小平都在抓各方面的整顿,军队的整顿、工业的整顿、钢铁工业的整顿、铁路的整顿、科研教育的整顿、农村的整顿、文艺的整顿,核心的是党的建设的整顿,这些整顿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从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都提出了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但这一计划被耽搁了十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后,觉得发展计划的实施,在时间上绝不能再拖延,时机问题非常重要。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说:“毛主席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

备。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目前生产形势怎么样?……现有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1]在同一次会议上,他又说:“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2]邓小平对于白白浪费、耽搁和贻误的时间,是忧急如焚的。“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二十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3]他说,“要认识落后,才能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能赶超先进。我们现在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这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耽误了我们很多时间。”^[4]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这就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世界各国后来不是也利用了嘛!现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先进成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呢?……当然也不那么容易。世界先进技术发展很快,发展速度不是用年来计算,而是用月、用日来计算的,叫做‘日新月异’。”^[5]从这里,邓小平机遇思想的发展目光已从内部环境的整顿转到外部条件的利用上了。“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6]“现在抢时间很重要,……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那么真正是爬行主义。”^[7]

第二阶段:成长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时期,社会秩序逐步稳定,安定团结的局面逐步形成,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中心,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转折期就是大机遇,不把握这个机遇,历史就会倒退和重演。发展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发展要有稳定的环境,发展更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邓小平充分认识到抓住机遇的重要性。他的目光

已从稳定环境的创造转到改革开放的条件利用上。在他看来抓住机遇,就是利用条件、把握环境、赶超时间。“外资有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8]“发展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大。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9]“这个条件过去没有,后来有了,但一段时期没有利用,现在应该利用起来。”^[10] 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11]“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12]“我们要抓住时机,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13]“我们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大胆探索,同时注意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力争在不太长时间内把改革搞好。”^[14]邓小平在关注条件利用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内外环境的把握。八十年代“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当然,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的话,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15]“十年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了很大的灾难。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好这件事,一切围绕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16]从党的十二大后,邓小平对机遇的认识更为深入,从具体条件和具体环境的利用,逐步转到抽象的时空条件的把握上。如对香港问题的把握上,“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时间了。”^[17]面对台湾问题的解决,“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这是一种战略考虑。”^[18]当然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对机遇的认识更多的是放在时间问题的把握上。在提出战略步骤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上,他说“准备有抢时间的问题,不能不认真对待。”^[19]“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20]“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

四化建设”^[21]“但是中间经过一些波折,耽误了一些时间。最大的波折是‘文化大革命’。”^[22]“二十年,时间看起来长,一晃就过去了。所以我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23]“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这些都是大事,我们不能急躁,也不能耽误时间。”^[24]“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25]“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26]“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27]

第三阶段:成熟期(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对机遇的把握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邓小平不仅从中国的视角观察世界,还从世界的全局来把握中国,更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来把握中国的发展,因而对机遇的理解,更多从哲学的角度来认识,从矛盾的分析来把握。“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28]“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29]“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30]“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31]“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32]“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拿掉了,什么也干不成。”^[33]“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34]“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

楚。……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35]

党的十五大,江泽民对邓小平机遇思想作了新的丰富和完善。他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36]“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37]历史跨入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注意到今后五到十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是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期,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在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对于当今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发展趋势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决不能因循守旧,丧失发展机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38]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又进一步指出,“纵观时局,二十一世纪头一、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党和全国上下要抓住机遇,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39]至此,邓小平机遇思想日益成熟,并得到不断丰富发展。

三、邓小平机遇思想合规律性与合价值目的性统一的内涵特点

邓小平机遇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掩卷《邓小平文选》三卷,给人的一个突出感受是字里行间处处都闪耀着“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40]思想光芒。邓小平机遇思想也不例外,也具有这样的特色,它是“学精”和“管用”的有机统一。一方面,邓小平机遇思想承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精髓,承继了马克思关于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理论阐述,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递了历史偶然性的思想,丰富、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这点看,邓小平机遇思想是合规律性的。另一方面,邓小平机遇思想又植根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不能不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邓小平从东方

人的思维出发,从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世界科技革命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精细研究出发,着重体现了“认识历史机遇,不是为了解释历史,而是为了识别和利用历史机遇,创造历史”的思想。从这点看,邓小平机遇思想合乎东方人的功利观,又是合价值目的性的。所以,邓小平机遇思想既合乎规律性,又合乎价值目的性,是两者的辩证统一。

1、邓小平机遇思想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哲学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必然性是客观事物联系和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确定不移的趋势,是在一定条件下的不可避免性和确定性。与必然性相反,偶然性是指事物发展的必然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某种摇摆、偏离,是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的不确定的趋势。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两种不同趋势,在事物的联系和发展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必然性产生于事物内部的主要原因。因而它在发展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代表着一定要贯彻下去的趋势,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偶然性则不同,它产生于事物次要的和外部的原因,因而在事物发展中只属于从属地位,对发展的过程起着促进或延缓作用,使发展的确定趋势带有这样或那样的特点和偏差。必然性和偶然性既是对立的,它们基于事物发展的不同根据和条件,各自在发展中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又是统一的,它们相互依赖,一方面没有脱离偶然性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没有脱离必然性的偶然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41]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联系的,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邓小平从马克思的偶然性原理出发,基于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世界经济和世界科技的发展的深刻洞察,形成了自己的机遇思想。他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正是这一矛盾规定着社会主义必定战胜资本主义,这是必然的,但由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分化和组合,国际条件的变化以及国内各种非主要矛盾的影响,又使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进程、方式等方面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比如苏联社会主义剧变,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一切说明偶然性中包含必

然性,而必然性又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这是客观规律,是毫无疑义的,必须坚信的。因此,四项原则必须坚定坚持,但偶然性对发展的必然过程起着促进和延缓的作用,使发展的确定趋势带有这样那样的特点,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根据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世界社会主义在战胜资本主义的确定趋势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样性。邓小平机遇思想既与一切偶然细节都说成纯粹必然的“天数”、“神志”、“命运”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宿命论相决裂,又与否定偶然性,把偶然性宣布为“科学的敌人”的形而上学机械决定论相区别,确立了自己辩证唯物主义的机遇思想。既要重视必然性,尊重和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力求按照社会的客观规律,计划自己的实践,使自己的每一个实践阶段都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高度的自觉性,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思想。同时又要重视偶然性,充分估计各种偶然因素及其影响,学会利用一切有利的偶然因素来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尽可能避免和削弱有害的偶然因素的干扰和破坏。因此,邓小平提出要抓住当前国际和平、国内稳定的有利时机,抓住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科技高速发展的有利时机,开放改革,为我所用,发展自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历史偶然性思想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理论一脉相承,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2、邓小平机遇思想从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现实资料中汲取了灵感精华。8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越来越真切地感到,一场在世界科技革命史的顺序表上位居第四的新技术革命浪潮正在汹涌而来。以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开发技术、海洋开发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等为骨干的新技术群,几乎涉及人类生产的各个方面,带来科技发展的重大变革。一是科学发现到技术创新的间隔时间缩短。19世纪以前,一般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甚至更长,而目前一些西方国家技术专利平均只比新的科学思想晚7年,美国是6年。二是技术创新到生产应用的间隔时间缩短。18世纪平均需要100年,19世纪是50年,现在缩短到3-5年。三是技术

过时的速度加快。20世纪40年代以前,工业品的平均寿命约在40年以上,但现在不足10年。高新技术产业的新知识更新之快,甚至被人形容为“现在会上所说的,会后就会过时”。

新技术革命所蕴含的神奇力量和高新技术所能开辟的难以估量的产业发展和市场前景,使世界各国在振奋之余,深切感受到了压力与挑战。国际政治格局的大变动,使得政治——军事竞争的重要性明显减弱,经济——科技竞争的重要性呈现,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发展竞争,许多政治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经济和科技。美国成立了前所未有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形成明确的科技政策,日本80年代就提出“科技兴国”方针,欧盟继“尤里卡计划”后,又推出“科技发展与研究框架计划”,韩国发展“技术立国”模式,印度加强航天技术和计算机软件开发,1994年第三世界科学大会,主题就是“科技进步与非洲发展。”科技革命的发展和世界科技的竞争,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的面貌。美国经济在90年代前一直呈相对衰落态势,但进入90年代一改前态,保持了108个月持续增长的战后最长记录,平均增长率达3.1%。美国经济的这种表现,使人们把新经济作为热门话题。新经济、知识经济,其实质是高新技术,首先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的体现。科技使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几何级数增长,它使人类社会跨入一个崭新的“数字化时代”。科技竞争也使南北差距拉大。1976年,瑞士比莫桑比克富52倍,1997年达508倍。1969年,占世界总人口1/5的最富有者拥有的财富为占世界总人口的1/5最贫穷者的30倍,1999年,前者财富为后者的74倍。不发展是落后,发展慢了也是落后。面对现实,只有积极抢抓机遇,而不是被动等待机遇;只有实现跨越式突变性发展,而不是采取蜗牛式循规蹈矩般前进,我们才能取得主动,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邓小平机遇思想正是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科技革命的现实资料中汲取了灵感精华。

3、邓小平机遇思想与中国的思想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与西方文化求真探理、思辩抽象、逻辑判断推理特点相区别,中国文化呈现了求善功利、意境形象、模糊体味感悟的特点。如果从认识和实践的角度看,西方文化偏重认知,而中国文化更偏重践行。在西方,学派、体系、学说、著作林林总总,而且自成一体,自圆其说;而在中国,人们的思想、学说、智

慧往往散见于字里行间。西方重抽象力,东方重形象力;西方求真重科学,东方求善重效用。西方注重“为什么”,而东方关心“怎么样”。文化上的分野,使得邓小平机遇思想必然打上中国东方文化的烙印。

邓小平政治家的品行和实践家的品格,使得他必然不可能如学者般关注理论的体系严密性,而更关注理论的指导效用性。他绕开了姓“资”姓“社”问题讨论的理论纠缠,而注重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探索与实践。他历史地承继了毛泽东革命时期的机遇思想,体察了长征战略大转移北上抗日的机遇,使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发生新的转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机遇,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创造了条件;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机遇,避免了长江分江而治,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亲身感悟了我国十年“文化大革命”机遇期的丧失,给社会主义建设所造成的重大损失的现实,并深刻地洞察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剧变,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国际风云,立足于生产力落后,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国情,创造性地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他认为,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争论只会丧失时机,浪费时间,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他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构筑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框架,提出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管用思想。因此,邓小平机遇思想是与邓小平的发展思想紧密相联,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是反映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范畴。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越大,价值就越大,反之价值就越小,甚至无价值。因此,识别和预测机遇,寻找和把握机遇,抓住和利用机遇,就能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事物发展的进程。机遇是有价值的,只有当这个机遇满足人类历史发展需要的程度越大,其价值也就越大。邓小平机遇思想正是这种在合规律性前提下的合价值目的性的集中体现。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李锦坤.九十年代邓小平理论研究【M】.天津:天津社科院出版社,1999.
- [3]方根雄.邓小平理论研究【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 [4]《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4.
- [5]《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6]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 [7]姜义华,吴根梁,马学新.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8]刘秀萍.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展”理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 [9][10][11][12][13][14][15][16][17][18][19][23][24][31][32][3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7,40,91,112,128,129,198,231,234,240,241,249,246,276.
- [20][21][22][25][26][27][28][29][30][34][35][36][37][38][39][40][41][42][4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132,142,13,86,16,25,57,95,270,274,354,358,365,368,369,375,375,377.
- [44]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2.
- [45]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4.
- [4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11.
- [47]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摘要)【J】.学习时报,2002-6-3.
- [4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82.
-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3.

责任编辑:常海哲

伟大建党精神对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康家玮

【摘要】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源头,表现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的精神品格,对党的民族工作开展起到指导作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与伟大建党精神在思想引领、初心使命、实践精神、政治品格等方面保持着内在联系,也能够从伟大建党精神汲取重要的历史和现实启示。从历史启示看,党的民族工作思想肇端于伟大建党精神,反映在党的民族理论形成、指导民族工作实践、爱国主义情怀培育等方面。从现实启示看,伟大建党精神寓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引导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实现,把握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及淬炼新时代民族工作干部素质。

【关键词】伟大建党精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启示

伟大建党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其核心要义在于“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1]。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源头,伟大建党精神表现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的精神品格,成为激励党指导各项工作的精神根脉。新时代推进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这种精神的指导,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系统梳理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基础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党的民族工作主线,要求所有工作应向此聚焦,^[2]标志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之“纲”,势必要求在开展新时代民族工作过程中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正是题中之义。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新时代民族工作实践,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注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整个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联系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引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和旗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便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作为追求真理的实践逻辑,在长期探索中不断坚定信仰力量和照亮奋斗道路。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吸收和借鉴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模式,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支撑和指导原则,也影响着后来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理论与政策。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首次有涉及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论述,吸收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民族平等”,确立“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革命目标,表明此时中国共产党将国内各民族纳入中华民族为一个整体观念逐渐形成。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心使命。伟大建党精神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旨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

基金项目:本文系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建党精神融入甘肃红色资源开发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项目编号:22ZC20)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康家玮,男,甘肃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安宁智库联盟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研究中心研究员。

设,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上所依托、传承、发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理念和中华民族情感等,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的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系统,为中国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建构精神依托文化归属空间。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精神。不怕牺牲、勇于斗争蕴含在党的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时期,并得到持续地弘扬与传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数先烈为了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使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在发展工业、农业、国防尖端技术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涌现出各行业的先进人物,其中不乏是中国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持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时代要求等相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基础上作出“两个一百年”的伟大论断。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举旗定向、谋篇布局,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和变革,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断迈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长期实践中得出的重要论断。如从长征时期在甘孜地区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博巴中央政府,到延安时期成立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再到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这些实践反映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最初理论建构到实践完善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再认识过程。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品格。伟大建党精神的政治品格表现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把人民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善于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历史经验,用科学客观态度着手分析和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必由之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出发将“中华民族”的概念及其符号内聚现代观念,通过国家层面整合培育民族优越感、民族自信心、民族自尊心等中华民族情感,创造性地转换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动自觉。

二、历史启示:党的民族工作思想肇端于伟大建党精神

(一)伟大建党精神贯穿党的民族理论形成过程
伟大建党精神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就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既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又出于中国现实国情的考量,不断探索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受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著作影响,结合当时中国历史环境和民族问题实际,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思想也发端于此。中共二大确立“中华民族完全独立”革命目标,提出“民族平等”等党的民族理论基本概念。中共四大作出《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强调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重要性,反对“压迫弱小的民族”^[9]。中共六大出台《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认为解决好“国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对于革命有重大意义”^[10]。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分析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时,强调“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11]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国内学界在加强民族理论建构的同时,也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开展一系列民族工作实践活动,如有序组织民族识别工作,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编写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实质不是阶级问题,而是民族的发展和繁荣问题,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学习别的民族的长处,结合本民族特点走适合的发展道路。”^[12]同时,民族政策要立足于民族平等,需要贯彻落实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20世纪80至90年代,党中央在总结经验和肯定历史成就基础上,指出当时的国内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发展,也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13]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阐述,由侧重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两个离不开”团结关系升华为“三个离不开”的中国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14]。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将科学发展观列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根本方针,并深刻把握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关系,如在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本质特

征“平等、团结、互助”之后增加“和谐”一词,反映出各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诸多联系逐渐紧密,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呈现出融洽、和谐方向的发展趋势。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党的领导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和制度保障,而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时值建党百年之际,系统地总结了党的民族工作历史经验,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一切工作应向此聚焦。

(二)伟大建党精神是指导党的民族工作实践的航标

伟大建党精神对党的民族工作实践起到了方向性的指引作用。长征时期,红军经过的地区大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历史民族隔阂和军阀的反动宣传,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较为紧张。将党的民族理论转化为具体实践,前期调查摸清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气候土质等情况,为民族政策执行做好一定的铺垫。如1935年红军路过四川省冕宁地区时,以朱德总司令名义《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广泛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等政策,从而缔结出民族团结硕果——彝海结盟。在穿越甘孜地区时,红军尊重当地藏传佛教信仰,对藏族群众秋毫无犯,获得藏族僧俗的拥护和支持,如积极为红军捐助粮草、自愿为红军做领路向导等。延安时期,党在抗战根据地较为全面的执行民族政策,取得较好效果,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开展文化教育事业。加强少数民族的文化普及,实施抗战教育,兴办民族学校,组织少数民族群众扫盲。建立“回民文化促进会”“蒙古文化促进会”等文化组织,通过举办民族文化活动,联系少数民族同胞,促进了民族团结。二是积极培养民族干部。1941年9月,党中央创办了延安民族学院,在抗战期间陆续培养了数百名德才兼备的民族干部,他们为抗战胜利乃至新中国建设都做出积极的贡献。三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如积极落实民族政策,保护清真寺及其教产。又如,1939年5月,因抗战西迁的成吉思汗灵柩经过延安时,边区党政机关举行规模盛大的迎灵、祭灵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成立了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充分贯彻执行。自此,各族群众拥护和热爱中国共产党融于血脉、植根于心,涌现出许多各族群众爱党爱国故事被代代口耳相传,如“库尔班大叔骑毛驴进京见毛主席”故事。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的一些地方民族关系不正常现象,引起党中央的极大重视,认真组织调查研究,及时处理影响民族关系的事件。如面对1953年民族政策执行不到位情况,党中央督促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必须重视对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工作,^[8]要求“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主义检查。”^[9]³⁴有效维护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改革开放后,民族工作重点转向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如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开展兴边富民行动等,取得一定实效。新时代以来,党中央致力于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任务,加大帮扶力度,实现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目标,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翻天覆地变化,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如甘肃省东乡县布楞沟村在过去存在“六难”(行路难、吃水难、住房难、就医难、上学难、增收难)问题,在脱贫帮扶下,通过引水、修路等、成立专业合作社种菌、养羊及开展红色旅游,逐步改变旧貌,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幸福小康村。

(三)爱国主义情怀是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底色

伟大建党精神孕育了爱国主义情怀,激发了中华各族儿女历史主动精神,重塑了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历史文化积淀,也是中国各民族的共情语境。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交流互动得以加强,影响伴随着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当“中华民族”一词开始使用,表明不仅是一种民族称谓的变化,还用一种历史的、连续的、发展的观点看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面对强敌外辱,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如中国近代史上西藏军民抗英战争、各族人民抗议沙俄侵犯中国领土活动等一系列事件影响下,各族人民在联合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更加密切,极大地增强中华各族人民对现代国家概念

的认知,以及所担负的共同责任、共同命运、共同家园的认同。以爱国主义为纽带,中国各民族自觉主动携手保卫边疆、开展反对分裂国家斗争,再次唤醒了“各民族共创中华”集体记忆。

三、现实启示:伟大建党精神寓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伟大建党精神引导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指引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其根基、血脉、力量来自于人民群众,并始终与人民保持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关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前提和基础。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赋予的重任,将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放置在首位,是新时代党开展民族工作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坚持全局观、整体观和长远观看待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高度出发,争取民心 and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着力解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同时,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

(二)伟大建党精神有助于把握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

伟大建党精神富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为指导党的民族工作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准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关系。“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0]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整个价值体系处于核心地位,主导着中国各民族的价值取向。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繁衍生息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表现出的文化特质,各民族文化表现为多元、各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中华文化的共同性与各民族的特色文化是并存的,并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共同性,促进了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普遍的文化认同,具

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恒久的历史传承性。借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对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关系可作以下分析:各民族文化都是建立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理解、认知、继承的基础之上,不能割裂文化的根脉;各民族在传统文化继承上应去除糟粕、取其精华,结合社会发展规律明确其文化的发展方向并不断创新。各民族文化相互兼容并蓄、相互借鉴吸收,成为中华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华文化具有共通性,汲取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准确掌握文化的功能作用、发展规律及发展方向有最大优势,能够使各民族群众增强对中华文化不断创新发展的认知自信与责任担当。那么,在推进文化自强自信进程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继续保持和发扬各民族“各美其美”特性,还需注重提升各民族彼此之间的中华文化共性内涵。

(三)伟大建党精神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注入活力

伟大建党精神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注入活力。首先,伟大建党精神所体现的“依规治党”理念,为民族事务治理提供了法治活力。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工作方式的重要转变,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民族工作领域具体表现。建立健全涉及民族事务的法制体系,加强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建设,使民族事务治理有法可依,实现治理过程民主化、治理方法科学化和治理效能高效化。其次,伟大建党精神所传承的“中华文化”底蕴,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文化活力。中华文化本身具有包容性,能够在文化相互交流中吸收、借鉴各民族文化的积极成分,并与其他民族文化保持和睦关系。加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正确处理差异性、共同性的关系,使各民族在文化方面需要相互之间尊重、欣赏、学习、借鉴,实现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中华文化认同。

(四)伟大建党精神淬炼新时代民族工作干部素质

伟大建党精神为新时代民族工作干部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保持政治底色。坚定对党忠诚信念,加强民族工作干部的党性教育,引导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党的民族工作事业之中,心系各族群众、造福各族群众。第二,提高理论素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下转第46页)

浅析新时代干部作风建设

王 啸 程红瑜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抓好干部作风建设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抓好新时代党员干部作风要从加强理论学习、熔铸精神之魂,完善培训培养机制,加强制度规范建设,强化干部监督管理,加强干部的担当意识和执行能力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等多方面着手培养新时代的好干部。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精神 干部作风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 教育培养

作风建设是我党在百年发展史中一直关注的问题。干部作风是党风、政风、行风的综合反映,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是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凝聚力的具体表现,是党坚守初心和使命的重要保证。持续抓好新时代党员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时代的召唤、使命的要求。

一、抓好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抓好干部作风建设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1]。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当前干部作风得到了极大的转变,带动党风、民风、社会风气的转变,取得了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现在正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二)抓好干部作风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风问题、是民心问题。干部作风好,党在人民群众中就有凝聚力和号召力,党的执政基础就稳固。作为执政党,干部的作风关乎党的形象,关乎党的事业成败,关乎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同时也对政风、民风、社会风气有着辐射、引领、示范作用。如果干部作风是积极的、认真的、公而忘私的,就会把工作做好,把事业干成。因此,抓好新

时代干部作风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变局的考验,我们党始终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干部作风有了极大的转变,提振了干部的精气神,干事创业精神不断增强。

(三)抓好干部作风建设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必然要求。《党章》指出,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2]。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员干部是建设的中坚力量,只有持续转变党员干部作风,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才能保持党风的纯正性、队伍的纯洁性,才能够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实现伟大的战略目标。

(四)抓好干部作风建设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干部作风决定我们事业的成败,关系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系到我们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作者简介:王 啸,男,伊犁州社会主义学院党组副书记、院长。
程红瑜,女,伊犁州社会主义学院理论研究室主任。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必须经常抓、长期抓”^[4]。当前,持续抓好新时代干部作风建设,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只有把干部作风建设抓严抓实,强化人民至上的情怀,凝聚群众力量,才能真正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实现我党的奋斗目标。

二、当前党员干部作风中存在的问题

为进一步了解当前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现状、问题及需求,促进干部作风建设持续转变,我们在伊犁州直机关、县市机关、乡镇工作人员、村(社区)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人员、普通群众中发放100份《干部作风建设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如图1-4。根据调查统计,我们了解了当前干部作风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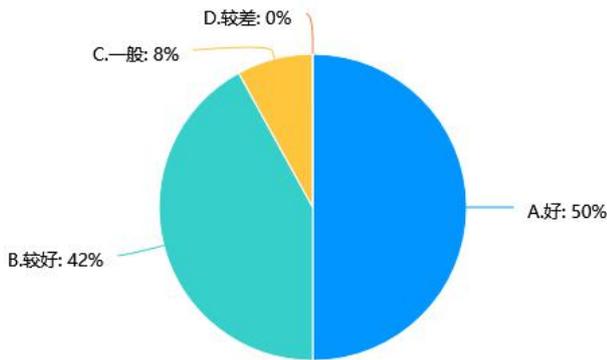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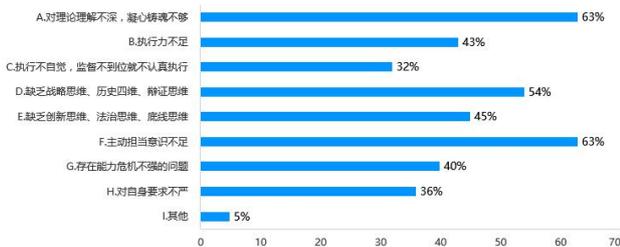


图2.当前党员干部作风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一)理论学习不扎实,造成干部存在能力危机和本领恐慌,缺乏主动担当、勇于斗争的精神。有的干部缺乏扎实的理论学习,没能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存在能力危机、本领恐慌,运用先进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有的干部满足于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对于其他工作有选择性地干。如,领导交办的事、易出成绩的事、不易出错的事就干;对于那些难度较大、不易短时间内见成绩的工作则

能推就推、能躲则躲,缺乏主动关联、主动作为、敢于较真碰硬的斗争精神。

(二)综合素质不高、执行力不足,很难形成全局性的战略思维。有的干部综合素质不高,头脑中存在惰性思想和惯性思维,习惯用老方法、老经验去落实工作,工作质效不高,缺乏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的能力。有的干部缺乏真抓实干、主动作为、勇于实践的精神,工作中瞻前顾后、推诿扯皮、执行力不足。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影响着上级政策落实的效果,与新时代好干部的标准严重不符(调查数据参考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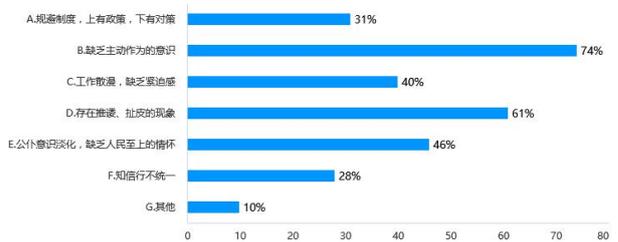


图3

(三)群众观念及公仆意识淡薄,缺乏人民至上的情怀。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理念,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有的干部公仆意识弱化,对群众的需求、期望缺乏关注,对待群众的诉求简单粗暴的回复,这种不细致、不耐烦的态度是转变干部作风的最大阻碍,也直接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背道而驰(调查数据参考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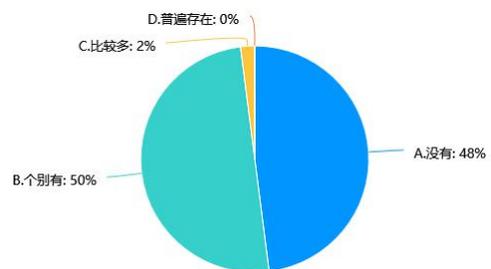


图4

(四)对自身要求不严,缺乏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的自觉性。有的干部放松了对自我的严格要求,享乐思想、拜金思想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没有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诚实践者,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够,没有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

三、对抓好新时代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几点对策

根据调查数据统计(参考图5),我们对抓好新时代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提出以下六点对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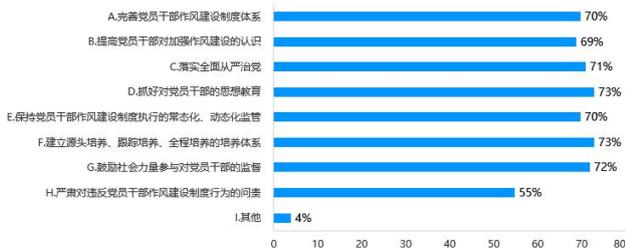


图5

(一)加强理论学习、熔铸精神之魂,厚植作风建设的理论根基。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完成其阶级使命、政治使命、政治任务,实现其政治理论的精神基础和实践指南,是我党干部作风建设的精神之魂。理论上清醒,信仰上才能笃信,理论自信才能焕发出夺目的光彩。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关键在“信”上,就是要让党员干部“信”马克思主义、“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种“信”是建立在扎实学习的基础上的,厚植理论根基、坚定理想信念、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补足精神之“钙”,是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基础性要求。

(二)完善培训培养机制,筑牢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的基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有扎实的教育培养才会有良好的作风,这是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5]。作风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长期坚持、与时俱进。要增强干部教育培养的系统性、持续性、针对性,把理想信念教育、政治规矩教育、党性修养、工作作风转变贯穿干部教育培养的全过程,筑牢信仰之基,加强政德修养、打牢从政之基。

(三)加强制度规范建设,强化干部监督管理,让

党的优良作风刻于心、践于行、习于常。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严管就是厚爱。利用健全的制度规范强化党的作风建设,是党在作风建设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必须以问题为导向,增强针对性、操作性和规范性,强化干部监督管理,必须建立管思想、管工作、管纪律、管作风的全方位的科学管理体系。要对干部加强全方位管理,在日常监督上下功夫,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让党的优良作风刻于心、践于行、习于常。

(四)加强实践锻炼,全方位、多角度加强干部的担当意识和执行能力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干部执行力建设是新时代新任务的基础性要求,要培养干部主动关联、主动作为、勇于担当、舍我其谁的主人翁意识,培养干部“想为”“愿为”“能为”“善为”的能力和水平,切实提高干部的政治担当、历史担当、责任担当。要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

(五)用好考核指挥棒,建设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核干部要经常化、制度化、全覆盖,既把功夫下在平时,全方位、多渠道了解干部,又注重了解干部应对重大考验中的表现,既要在小事察德辩才,更要在大事上看德识才”^[6]。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作风在民间,用好考核指挥棒,全方位、多层次强化干部作风建设,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想干事、善谋事、干成事的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

(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正风肃纪、强基固本,培养新时代好干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担当有为的好干部不是与生俱来的,他们的能力素质和工作作风,既靠自身养成,更靠组织培养锻炼。要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要加

强对干部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提升素质能力,以优良作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员干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都要坚持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坚持对党绝对忠诚,与党中央同心同德,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牢记“国之大者”,善谋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结束语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懈将作风建设引向深入,以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一定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形成共同致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出版社,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59-3.
- [2]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人民出版社,2023.81.
- [3]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2023:80,81.
- [4]习近平.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EB/OL】.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www.ccdi.gov.cn. 2013-6-18.
-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7.
- [6]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怎样做新时代好干部.【M】.红旗出版社,2022:236.

责任编辑:闫丽红

(上接第42页)

加强民族工作干部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精神学习,不断提升其理论基础和专业能力。第三,弘扬实干精神。以实干精神担当新时代民族工作使命,指导民族工作干部将掌握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等转化为具体的工作实践。树立责任担当意识,深入一线化解民族工作领域难题、为各族群众协调民生实事,成为民族工作领域的行家里手、各族群众的贴心人。第四,提升文化修养。引导民族工作干部保持高尚精神追求和健康生活情趣,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干部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以文化自信融入民族工作干部的精神生活,进而规范和激励他们在民族工作中的创新实践。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7-2(2).
- [2]尤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科学指引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J】.中国民族,2021(11):48-53.

- [3]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7.
- [4]姜华宣,王德夫.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稿【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35.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人民出版社,1999.
- [6]罗树杰.邓小平民族理论与实践【M】.民族出版社,2003:24.
- [7]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民族工作文献选编:1990—2002【G】.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37.
- [8]康家玮.浅论“三个离不开”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J】.社科纵横,2010(6):145.
- [9]康家玮.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政策在甘肃的实践与探索【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1):97.
- [10]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人民出版社,2017:40.

责任编辑:邹平惠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 探析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

刘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筑牢国家人民安全防线。”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加速推进，我国业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主要投资强国，海外利益已遍及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然而，当今世界总体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不断增长的海外安全需求与现有的安全保障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有效维护我国海外利益安全，既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也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强大思想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分析和研究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必将为具体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从而更好地维护我国海外利益安全。

一、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来看，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应着眼于海外利益发展趋势，在能力构成趋于全面多元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是提示事物运动、变化的动因、规律和发展趋势的范畴。发展具有普遍性，整个世界是变化发展的，发展的实质是事物的前进和上升，这就要求我们用发展的观点看待事物和问题。

海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利益安全也被纳入了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但目前学术界对于海外利益的认识却存有分歧，究其原因，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形势的不断发展，海外利益也处于一个动态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观点认为

海外利益主要包括海外经济利益、海外公民、法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利益、海外能源、资源等几个方面。海外利益安全则主要包括海外能源资源安全、海上战略通道以及海外公民、法人的安全。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中国因素已渗透到世界各个层面，我国的海外利益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都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海外利益的性质上，中国海外利益从传统的突出经济利益转变为经济利益和政治等其他利益并重，有形利益和无形利益同时凸显；在海外利益范围上，已涵盖政治、经济、军事、能源、文化、公民安全等多个领域，并逐渐由地理空间向国际制度层次发展。海外利益的拓展及其分布越来越广，不同方向的利益安全对安全保障能力的需求不尽相同。因而，为了满足多元化的安保需求，新型的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应包括海外安全预警能力、领事保护能力、军事保护能力、市场化的海外安保能力、国际安全合作能力、海外文化软实力等相关领域，从而实现海外安全保障能力与实际安全利益维护需求相匹配。

二、从马克思主义系统观来看，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应着眼于海外安保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构建要素完备、运行有效的能力生成体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系统是由不同要素基于一定关系或结构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观念以系统思维为出发点，立足事物整体把握事物发展规律，通过系统思维认识事物内在机理，运用系统方法处理事物发展矛盾，进而总体上实现事物结构和功能优化。

作者简介：刘伟，男，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讲师。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突发性的海外安全事件层出不穷,这对海外安全保障能力的迅捷性、联动性、高效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从中国现有海外安保体系现状来看,虽然已经建立了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安保能力保障体系,但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不断发展,现有的这种以政府部门为主要行为体的海外安保体系已无法满足急剧增长的海外多元化安全保障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在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的过程中,要按照系统优化的要求,由中央在宏观战略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海外安全保障法律法规制度。在纵向层面上,建立“5+3”安保联动机制,即包括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企业、公民,并吸取医疗、救援、安保等领域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多位一体的海外安保联动工作网络。在横向层次上,建立海外领事保护联动工作机制,推进驻外使领馆、国家驻外机构、华人华侨团体、海外企业及公民的联系合作,共同做好预防应对海外安全危机工作。在安保力量构成上,加强军事保护能力的同时,也要重视与国际安保公司、社会组织、海外企业的合作,合理采用多样的多段加强安全防护。建立一套涵盖多领域、多层次、多种力量,能够发挥各安保行为主体各自作用的合作机制,形成从“风险预警-震慑-应急处置-善后处理”的海外安保工作闭环回路,为维护我国海外利益提供一体化的综合安全保障能力体系供给。

三、从马克思主义矛盾观来看,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应着眼于维护海外利益安全的主要矛盾,大力发展市场化的海外安保产业

马克思主义矛盾观认为,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在一个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在处理问题时,既要抓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也要重点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当前我国海外利益安全需求与实际安全保障能力存在较大差距是有效维护我国海外利益安全的主要矛盾。近年来,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推进,我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融合更加广泛深入,海外投资规模和海外公民群体不断扩大,国家利益在海外延伸拓展的趋势日益明显。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我国大规模走出去的同时,海外安全防护存在着明显的短板,海外企业和公民面临着恐怖袭击、绑架、抢劫偷盗、人身伤害等多样化的安全威胁,并且呈愈演愈烈趋势。面对庞大的海外利益安保任务,传统驻外领事保护与外交协调,或者通过直接派遣军队进行安全保护等手段已不足以应付和解决海外复杂多变的安全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我国海外安保行业,以增强海外应急灵活的安全保障能力则势在必行。目前,我国已有三十多家能够提供海外安保业务的公司,主要开展安保培训、海外安全风险评估及安保方案制定,提供驻地安防等业务。由于我国海外安保业起步较晚,法律法规制定还不完善,在国际性、属地化、专业性等方面与西方安保公司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为促进海外安保产业的迅速发展,尽快完善海外安保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资金和技术人员投入,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海外安保业务水平质的跃升,提高安保企业海外市场竞争力,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保驾护航。

责任编辑:马霞

统一战线在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赵宪军

【摘要】研究统一战线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百年伟大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伟大奇迹的背后基因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统一战线 中国特色

“坚持统一战线”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

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华民族可谓走得艰难、艰辛,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制度、道路、理论、文化的独特性,是中华民族崛起的象征,也是人类文明开创的巨大成就和奇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奋斗历程中,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

宝,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①

一、统一战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刻总结。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正确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翻开180多年的中国近代史,我们看到,中华民族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起于19世纪40年代。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为了国家独立、民族

作者简介:赵宪军,男,甘肃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

解放、人民幸福,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的前途,无数仁人志士作了艰辛的探索。这里有农民领袖洪秀全领导的反抗没落封建王朝黑暗统治的太平天国运动,有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有谭嗣同发起的“公车上书”……这些带有浓厚的封建思想的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都以失败而告终。1911年由伟大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专制,这一事件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辛亥革命虽然响亮地提出“振兴中华”,但是“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由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辛亥革命之后,在这场革命中接受洗礼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寻救国救民道路。”^[2]

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最终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初期,毛泽东同志就讲“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3]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结合在一起开天辟地的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共产党人也深深地认识到,要实现“振兴中华”这样一个宏伟目标,仅仅依靠中国共产党现有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联合、扩大其他阶级阶层力量,来共同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

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4]

“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正确方向,也是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就在这一纲领指引下,国共两党实现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第一次合作。通过国共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壮大革命力量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发展了自己。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抗战胜利的法宝。“日本对华持续侵略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日本反动统治者一次次侵略中国,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1895年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1900年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侵入北京,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侵犯中国东北领土和主权,1914年侵占青岛,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1931年策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1937年7月7日以炮轰宛平县城和进攻卢沟桥为标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巨大的灾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顽强反抗。”^[5]就在国民党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妄图剿灭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基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

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

“五一口号”表达了各民主党派民主建国的共同心愿。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华民族看到了和平的曙光,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打着和平谈判的幌子积极备战。为此,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针对蒋介石“内战、独裁、分裂”的阴谋,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但是,国民党蒋介石最终撕下和平建国的假面具发动内战。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1948年4月30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向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五一口号”,“五一口号”提出“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6]

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反映了各民主党派共同夙愿和共同心声。

1948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件。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

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7]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根本的社会发展条件。

二、新中国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统一战线依然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凝聚力量、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法宝,这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制度保障基础。

中华民族改天换地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面临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国家一贫如洗,工农业生产和财政经济都极其困难。工农业生产低下,物资极端匮乏,人民得不到起码的生活保障;工农业比例中工业比重小,基础薄弱,生产水平奇低,更谈不上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布局极不合理,70%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少数城市,内地特别是边远地区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现代工业;交通和通讯设备极为落后,几乎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财政经济状况混乱,财政赤字大、恶性通货膨胀、市场投机势力猖獗,由此看出建国之初起步之艰难。1954年毛泽东很形象地描述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现状:我们的工业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飞机、汽车、拖拉机、坦克这些东西造不了,我们只能造桌椅板凳、能造茶碗茶壶,还能够把麦子磨成面,就这个水平。严酷的现实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建立一个新中国,需要中华民族共同戮力奋斗,建设一个新中国,同样需要中华民族共同戮力奋斗。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有的人对统一战线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认为“民主党派是包袱”、“可有可无”,民主党派只不过是“一根头发的功劳”,等等。轻视忽视统一战线,瞧不起民主党派和党外民主人士,看不到他们的作用。为提高全党对统一战线的认识,进一步明确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各方面统战工作的基本政策,中共中央于1950年3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着重谈了民主党派性质、作用和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基本方针政策。并且,毛泽

东同志指出：“要充分看到民主党派的作用，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不拔去都没有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从他们的背后联系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就不可藐视。”并对民主党派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从理论和思想认识上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经过三年的国力恢复期，国民经济有了好转，但是依然很弱。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还是把中国现代化建设提到了议事日程。

“一五”计划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加上苏联等国支援，“一五”计划于1956年底提前完成，到1957年底超额完成各项指标，各领域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具体表现为工业生产成就巨大；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具规模；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产量成倍增加；新兴工业部门迅速成长，新产品、新品种不断涌现，特别是电子、石化、原子能、导弹等新兴工业部门，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工业地理布局改观，不但原有沿海工业基地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且广大内地和边疆各省、自治区及少数民族地区也都新建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农业建成大中型水利施工项目150多项，其中大部分都在抗洪抗旱、发展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科技方面，1964年，我国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同年10月，我国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1965年5月，第二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从而打破了美、苏核垄断，提高了我国国防能力。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宣布，今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毛泽东反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参考而不能照搬外国经验，要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周恩来明确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

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是四个现代化思想的最早提法。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至此，“四个现代化”的完整提法有了。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公布：“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的现代化步伐更加稳健。回顾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历程，实事求是地审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现状、机制体制存在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上的不足等等，果断提出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通过体制、机制、理论创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提出建立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979年12月，邓小平结合中国古代社会对美好生活的千年期盼和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借鉴国际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小康之家”。使用“小康”这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为了建设小康社会，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上的开幕词，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的根本变化和统一战线内部结构的变化，指出我们的

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8]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将邓小平关于中国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构想,确定为此后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从20世纪70年代末明确提出小康目标以来,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的实践呈现持续推进的阶段性特征,小康社会建设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到20世纪末,中国的经济建设、综合国力等都迈上一个新台阶,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里程碑。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中国在短短40多年改革开放奋斗历程中,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三、四百年工业化发展才能获得的成就,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达到全球第二。中国人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社会

主义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焕然一新,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这一切成就的背后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功不可没,这就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宗旨“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把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汇聚成磅礴的伟力。

三、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宝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讲“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9]进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需要准确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新冠疫情对全球产生的急剧影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新长征“赶考”指明了方向。这就是贯彻好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度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凝聚智慧、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特别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10]

总书记的这段讲话,高度浓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

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条根本的经验。同时,也指明了我们的事业发展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统一战线,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强调用统一战线凝聚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最大限度地去团结和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因此,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一是要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优势和最鲜明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新中国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史、中华民族180多年的近代发展史,都反复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就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二是坚持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处理好新型政党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制度创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积极参政;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的新型政党制度格局,秉持“肝胆相照、互相监督、荣辱与共、长期共存”的原则,加强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议政能力、团结共事能力、组织领导能力、把握大局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能力,更好地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总书记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四是坚持用宗教法治化、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发挥宗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应有的积极作用。五是坚持用“两个毫不动摇”,鼓励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六是坚持处理好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是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总书记多次强调“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关键是要坚持求同存异。一方面,要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包括巩固已有共识、推动形成新的共识,这是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对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危害

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危害国家制度和法治、损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反对,不能让其以多样性的名义大行其道。这是政治底线,不能动摇。”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人口巨大的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因此,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优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在一起,发挥出应有的智慧和力量,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EB/OL】. 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1/05/content_5577289.htm.
- [2]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 中国青年网 http://news.youth.cn/sz/202110/t20211009_13253872.htm
- [3][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4,645.
- [5]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9/03/c_1126449917.htm.
- [6] 吴跃农.“五一口号”的故事【EB/OL】.人民政协网 http://www.rmzxb.com.cn/c/2016-04-21/776655_4.shtml.
- [7] 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942-944.
- [8] 郑万通.人民政协六十年的光辉历程和重要启示【N】.人民政协报,2009-09-17.
- [9] 学而时习.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EB/OL】.求是网 http://www.qstheory.cn/2022-10/19/c_1129070417.htm.
- [1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EB/OL】.中华网 https://news.china.com/zw/news/13000776/20210715/39756765_1.html.

责任编辑:李霞

民主党派推动乡村振兴的优势及路径探析

王昊 李霞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解决好三农工作的关键工作之一,民主党派要切实创“新”、求“好”,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民主党派的优势,推动乡村振兴。当前,乡村振兴面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民主党派只有发挥人才智囊优势有助于产业振兴等三大优势,开拓出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在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发挥好民主党派智力密集优势,创新帮扶思路,积极建言献策;整合资源发挥所长,汇聚各具特色的优势力量等五条路径,就一定能高效推动乡村振兴事业阔步向前,形成乡村振兴有力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格局、新气象、新风景。

【关键词】民主党派 乡村振兴 优势 路径

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客观需要。为此,我国将“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纳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并提出了“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要求。

新时期,针对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四新、三好”要求。^[1]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各民主党派要切实创“新”、求“好”,把履职尽责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结合起来,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民主党派的优势,推动乡村振兴工作。

一、当前乡村振兴面临的困难

我国的乡村振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痼疾,制约着脱贫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工作的全面推进。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和矛盾包括:

(一) 乡村发展存在不均衡

一是产业发展的不均衡。产业发展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方面。我们目前产业发展存在产业层次低、规模小、分布散、链条短、规模效益低、市场风险大,同质化与短期化倾向明显,外部主体依赖性强、农户参与热情低等问题。在脱贫攻坚战中,扶贫项目多集中在相对初级的种植业、养殖业,拓展经济,带动较强的乡村旅游、电商经济等产业发展却很不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和急功近利倾向,发展项目品种雷同造成同质化严重,在村民合作意识、合作精神和经营能力欠缺;合作社各自为战,尤其是同县、同乡镇的专业合作社缺乏统筹规划和合作发展,导致规模小,市场竞争力偏弱;产业发展过度依赖政府和帮扶对象的人脉、社会资源,距离乡村振兴的发展规模和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如:贫困村发展产业多集中在蜂蜜、花椒、木耳、香菇、中草药、养牛等种养殖项目上,生产发展不均衡,同质化严重,造成产能过剩,价格下滑,收益减少,当政府、相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帮扶销售数量减少,加上疫情等因素导致经济下滑,消费者购买力下降,造成产品滞销,村民生产积极性受挫,经济效益减缓,使得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压力增大。

作者简介:王昊,男,甘肃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任,兰州市、安宁区政协委员。

李霞,女,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讲师。

二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由于脱贫攻坚成果显著,我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但相对贫困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善。同时贫困村面貌改变很大,但边缘村由于没有纳入脱贫攻坚序列,不少基础设施条件破旧艰苦,影响到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不重视会拉后腿。如贵州从江县和赫章县的一些山区乡镇就存在公共服务能力、财政投入不足,导致民生保障指数低,群众生产生活需求和求发展都存在很大差距^②。

三是农村阵地建设、组织建设存在不足。多年的脱贫攻坚战最终实现脱贫摘帽,振奋了人心,也导致一些干部出现松劲、懈怠心理,这种倾向会给后续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部分干部思想认识缺位,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忽视阵地建设。干部群众思想的懈怠,乡村文化阵地的荒废,加上相关制度规定的执行力不够,导致乡村整体组织建设显得相对有些松散,弱化了引领乡村振兴的功能。

(二) 环境整治尚有欠缺

一是乡村规划存在缺失。具有整体性和长远性的规划和编制,是人居环境改善最基础的一步。但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由于缺乏差异化建设规划,村庄建设和发展趋同化现象严重,如贵州省内千村一面的现象时有发生。另外,农村宅基地管理亦有漏洞,乱搭乱建现象依然存在,占用耕地建房、弃耕等情况也普遍存在。

二是生态建设存在不足。很多乡村地区“厕所革命”“全域无垃圾”整治颇有成效,但缺乏细致的规划方案,整体村容村貌维护村民参与度低,污水处理、垃圾清运处理等后续工程都没有配套,不少整治项目沦为鸡肋,导致村民怨言较大,乡村生态治理任重道远。如:甘肃省陇南市两当县、文县等县域的山区村落存在冬季卫生厕所冻冰无法使用问题,可见搞好乡村振兴呼唤出台差异化厕所革命方案,因地制宜,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三是美丽乡村规划亟待加强。在脱贫攻坚战中,我国贫困地区实施进行了危房改造、安全饮水等一大批基础工程。这些应急性工程建设和人居环境改善出发点是脱贫,一些地方取水方式还较为原始,水管铺设简单粗陋,个别危房仍需后续改造,这些和乡村全面振兴所要求的美丽乡村规划衔接有所缺位,如何做好系统规划,落实到位,并查缺补漏,是后期

乡村振兴工作不容小觑的问题。

四是乡村能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要提升农村能源革命的战略定位,把农村能源发展纳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能源革命和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走能源转型发展、构建现代能源体系之路。广大乡村地区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是落实“双碳”目标、大力发展新能源的重要增长极。加快发展农村能源,加大农村地区清洁能源建设力度,有助于促进农村产业提档升级,带动产业链延伸,支持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要提升农村能源革命的战略定位,把农村能源发展纳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能源革命和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

(三) 人才振兴难度大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地位,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培养、创新乡村人才培养引进机制等。^③人才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乡村振兴既需要外来人才,更需要培养出来的本地人才。当前,我国乡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人才匮乏一是乡村尚存轻视知识情况,而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父母缺位加剧了培养成才难度大;二是乡村缺乏吸引力,留不住本地人才,留村人员年龄普遍偏大,文化程度和能力相对较低;三是部分政策扶持下的部分农民存在懒惰心理,不思进取,缺乏培养内生动力。教育振兴,文化振兴、文明振兴要在人才培养、人才振兴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民主党派参与乡村振兴的优势: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中央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民主党派发挥自身具备的优势必将对该工作产生重要的助推作用。

(一) 人才智囊优势,有助于产业振兴

智力密集、人才荟萃是民主党派的一大优势,各民主党派要胸怀‘国之大者’,强化问题意识,扎实调查、深入研究,着力推出对党和国家决策切实管用的研究成果,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

民主党派可以根据自己党派的特色和基层组织中成员的构成特点等助力产业振兴。例如,民建多以经济界人士居多,民建中央号召和组织民营企业企业家将企业发展与定点帮扶乡村的特色结合,找到契合点,为巩固脱贫成果、持续振兴乡村发力;农工党中成员多为医药卫生界高级知识分子,组织他们与定点乡村结对发展医药产业,提振当地产业振兴。各民

民主党派发挥界别优势,调动成员展开调研,因地制宜地引进资金和技术等帮扶调研地区发展产业,实现经济创收,如推进线下科技帮扶、线上交流渠道双向发力,实现服务“上云”、技术“赋能”,“人才+科技”。如黑龙江省拜泉县发挥东北农业大学专家学者和省市县科技特派员“智囊”作用,开通“掌上云服务”,打造“乡村振兴农业专家服务平台”,推广新技术100余个、新品种60个,有效提升群众的知识技术水平,实现了乡村振兴服务的线上线下“双线融合”^[4],相关民主党派及其专家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二) 人才汇聚优势,有助于培养人才

产业振兴要达到长远发展的目的,必须通过教育振兴实现人才振兴。人才是巩固脱贫成果和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的核心因素。民主党派大多数成员都是高中级知识分子,不少是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都有过硬的本领和学识,也是丰富的人脉资源。在实现乡村教育振兴和人才振兴过程中,要善于发挥他们的优势,加大智力扶持力度,加大培养乡村治理、发展所需的本地人才。

(三) 民主监督优势,有助于振兴增效

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工作是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重要方面。当前,振兴工作效率的提高需要民主党派的监督,干部领导思想的松懈更是需要民主党派的监督。在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相结合的过程中,各民主党派能够发挥自身优势,深入乡村地区积极开展民主监督工作,就振兴的现状、振兴中存在的问题等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在给有关部门提对策的同时,也可以结合自身条件想办法,提出振兴对策。只有在巩固与振兴同时开展的过程中进行民主监督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三、民主党派推动乡村振兴路径探析

我国各民主党派深入贯彻《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发挥优势,全力推动实现乡村产业脱贫到产业振兴、教育扶贫到人才振兴、村庄整洁到生态振兴、乡风文明到文化振兴、治理有效到组织振兴全方位转变,推动乡村振兴。其主要路径有:

(一) 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在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各方参与是合力,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发挥各方面积极性。^[5] 眼下的乡村振兴需要继续发挥各方面的工作积极

性,而作为各方力量中不可忽视的民主党派,当仁不让要充分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

一是加强民主党派中央的统筹力度。各民主党派中央对口帮扶毕节试验区的经验昭示我们:民主党派集中力量办脱贫攻坚大事大有可为。在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各民主党派中央同样要统筹考虑,均衡调度发达地区、帮扶任务相对较轻地区的民主党派力量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尤其是西部不发达省区。必要的情况下,在统战部门的指导下,对于条件薄弱、有返贫危险、乡村振兴难啃的骨头地区,可以考虑两到三个民主党派合力攻坚,达到保障乡村振兴任务完成的目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市级、县区级民主党派也可以考虑采用这种大联合、共攻坚的模式。

二是加强与各级政府部门的沟通联系,有效参与乡村振兴工作。民主党派要与当地中共党委政府加强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当地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生态建设、乡村文明、社会治理、医疗保障等方方面面的动态信息,了解政府乡村振兴工作的规划安排,了解当地党委政府对民主党派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建议,赢得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从而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发挥好参谋和助手的作用。应发挥党派智力密集优势,突出帮扶的智力性、技术性、引领性,梳理好专家资源,精准匹配地方需求与专家资源。

三是民主监督环节纳入职能部门力量。民主党派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起到了较大作用,为最终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了贡献。脱贫攻坚的实践证明,各民主党派有能力、有资源、有信心做好乡村振兴民主监督工作。但是,也存在监督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缺乏参与,相关问题反馈和解决周期较长、效率较低的问题。民主党派要和党委加强沟通,争取政策支持,在参与民主监督调研时,发改部门、组织部门、乡村振兴局、能源部门、水利部门、交通部门等职能部门也深度参与,提供权威的第一手资料信息,最终合力形成有分量的调研报告。由于相关职能部门参与,有助于第一时间反馈监督信息,及时制定有力措施,最快时间、最大限度有效解决问题。此外,在政策落实情况、项目推动效果、产业政策制订、整体布局谋划等方面的民主监督找到发挥作用的着力点。要处理好政府、市场与农民的关系,通过政府、市场、农民三方合力,汇聚全社会资源,共同推进和参与乡村振

兴,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局面;

(二)发挥好民主党派智力密集优势,创新帮扶思路,积极建言献策。

一是凝心聚力,在乡村振兴理论体系构建中有所研究和建树。我们国家乡村振兴体系包含构建益贫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多维度精准帮扶“三支柱”公共政策体系,民主党派要利用自己专家学者云集的智力优势,组建智囊团队,深入研究三支柱体系运行过程中的经验、不足,集思广益,创新新的理论成果,为乡村振兴、为可持续减贫做出贡献,也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可供借鉴的有益方案。其它方面,譬如如何打造乡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有机结合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针对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等不同类型的村庄,如何确定各具特色的多元化振兴模式和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如何解决空心村问题、如何更好解决农村文化自信与推进农村文化繁荣兴盛结合问题、乡村有效治理(乡村善治)、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研究、粮食安全与防止规模性返贫两个“底线”研究、促进两个“融合”研究等等,民主党派发挥智库作用,旗下学者们予以高度关注,显示身手,秀出肌肉,力争为我国多维度乡村振兴提出切实可行的金点子。本人认为,民主党派成立专项课题组是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

二是创新渠道,整合资源,引才聚才育才,赋能乡村,高效指导推进乡村振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致富带头人人才匮乏,是影响乡村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成效的重要因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布《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1》,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20.04%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3.82%,超过多一半,几乎达到老龄社会标准。^[6]乡村运营、乡村治理中如何留住人才、如何培养人才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民主党派要利用自身高科技知识分子和新社会阶层人才济济的优势,整合资源,探索解决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年龄结构偏大和知识结构不优的方法。将帮扶项目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化“输血”为“造血”,探讨研究和协助党委政府形成人才交流长效机制,人才培养机制,东西部技术人才交流机制。在帮扶工作中充分考虑受援地技术力量如何精准掌

握项目细节、技术手段,达到完成项目和培养人才“一箭双雕”的效果。

1. 实施农民素质优先提升工程,加快建立职业农民制度,推进农民培训提升行动,引导支持农民在发挥主体作用的过程中增强发挥主体作用的能力。

2. 统筹推进事业引人、感情引人、文化引人、环境引人,广纳社会人才和社会资本到农业农村创新创业,或吸引在智、技、德、官、富等方面各具优势的新乡贤或志愿者为乡村振兴出谋出力,支持企业、行业和社会组织组织城乡对口帮扶。

3. 内外兼修,推进乡村振兴的组织创新,鼓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带头人脱颖而出并建功立业。如引导工商资本和有志于推动乡村振兴的城乡企业家,甚至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也可望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带头人。

例如:中国农业大学与腾讯公司联合发起了乡村CEO培养计划,培养具有农业产业规划、对接市场能力、精通企业运行和产品营销的乡村经理人、带头人。^[7]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民主党派要发挥成员人脉广,资源足的特点,和相关大中专院校对接,为乡村振兴培养实用人才。发挥党派联系面广的优势与阿里巴巴、京东、华为等社会责任强的企业主动对接,争取举办更多不同培养目标的乡村振兴人才班,为乡村发展赋能。选派民主党派成员中的专家学者到贫困地区成立“专家学者工作站”,延长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也是当下赋能乡村,高效指导推动乡村振兴的好做法。

三是在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发挥民主党派科技、智慧、人才力量的优势,创新帮扶思路与模式,科学指导施策,持续精准发力,实现帮扶效率、质量、水平的全方位提升。如民主党派定点帮扶过程中在“精准”上持续发力,把自身的优势专长与定点帮扶地区的优势特色相对接,从政策扶持、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智力支持、人才培养等方面精准施策,探寻脱贫致富之路。如四川绵阳游仙区找到民主党派参与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创新开展“一个党派一朵花”结对合作模式,市、区民主党派与“七朵仙花”属地乡镇、业主三方开展合作,七大基地及属地旅游景点人流量同期增加20%。^[8]

四是在产业做大做强上提供智力支撑。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按照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服务兴农、品牌兴农要求推进农业农村产业体

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建设。要在产业发展上积极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做强、做大优势产业,发挥规模效应,提高市场抗风险能力;要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从产业扶贫以种养为主的初级生产阶段;要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产业发展的支持对象从贫困户扩大到非贫困户,从贫困村扩大到非贫困村,从普通农户扩大到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创新利益联接机制,保障农民利益。戮力研究和推动改革创新,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发展机制,农村体制改革、机制模式创新、科技创新、品牌创造和营销变革等;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多元化产业振兴模式,针对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等不同类型的村庄,采取不同的产业振兴模式和政策措施。^[9]脱贫攻坚时期各地创新的道德银行、红黑榜、帮扶责任人等激发内生动力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完善并用于产业振兴中。

五是打造实践基地,锻炼培养人才。蓄势赋能共同参与乡村振兴,是民主党派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民主党派履行社会职能的应担之责。民主党派充分发挥高校组织、成员企业等方面的优势,深入推进实践基地等载体建设,打造乡村振兴的人力智力“摇篮”。通过实践基地,民主党派各级组织在涉农、涉医、教育等帮扶重点领域统筹好人才资源,在帮扶过程中加大科技人才投入力度。同时,推动5G、智慧农业系统、自动化、数字经济、远程视频会议系统等技术手段的建设和应用;帮扶项目在项目组织模式、技术手段等方面创新,在管理上做深、做精,提高项目示范、引领的效果。如如民盟贵州省委、民盟遵义市委与中共遵义医科大学党委签订《2020年党盟共建框架协议》,深入湄潭县、凤冈县基层医院,商讨研究和推动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全科医生培养、特色专科援建、专家团队下沉等课题,促进基层整体医疗服务水平显著提升^[10]。又如2022年8月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茶场村,省、市、区三级共建了“九三学社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基地”,同时还举办了“乡村振兴 数字共富”专题研讨会。^[11]

(三)整合资源发挥所长,汇聚各具特色的优势力量。乡村振兴,涉及“三农”工作方方面面,包括农业质量效益、乡村建设、农村改革、科技人才、文化教育、城乡融合发展、生态建设、经济业态等等。在这些领域中,民主党派各有长处,同时,民主党派整体存在人员数量有限、经费有限的问题,若全面涉及,不

仅财力不够支撑,而且精力有限,力量分散,不能很好发挥优势作用,而集中发力能够避免因党派力量零散工作难以取得显著成效问题。具体做法可以有:

1.考虑积极关注受援地发展方向、政策导向和发展需求,做到帮扶有的放矢。

2.大力整合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打造出一批组织放心、人民满意、社会认可的乡村振兴发展项目。项目规划、建设要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区情、不同类型村镇的资源优势、产业基础、人力资源、发展潜力,合理稳妥的绘编产业发展规划。我国各民主党派各有其界别特色优势,如民盟主要由教育、文化界人士组成,九三学社主要由科技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在开展助推乡村振兴中,要发挥各自所长,整合资源,立足实际,着眼需求,各显千秋。立足党派优势资源,发力做好本党派之外优势资源的联系联络,借助外力,实现优势互补,增强力量。

3.集中各民主党派合力,采用跨党派联合帮扶的方式,达到汇聚力量、解决问题的效果。如市级民主党派中,民盟、民进等可以采用组团式联合发力某一村镇的模式,合力推进乡村振兴,把钢用在刀刃上,避免无序的、撒胡椒面式的产业下乡和乡村振兴。^[12]

4.和各级人大、政协紧密配合,利用协商向基层沿伸等方式,合力解决乡村振兴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引导村民转变观念,改变生活方式,提升乡村文明

一是改变传统生活方式,为低碳经济发展聚力。农村清洁能源是实现能源低碳转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实施的主要抓手,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动力和支撑,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农业农村部估算,全国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每年可获得相当于73亿吨标准煤的能量,相当于目前全国农村能源总量的12倍,大有潜力可挖。^[13]民主党派配合党委政府做好广大农民能源消费观念转变引导、清洁能源项目论证、引入和实施,意义重大。我国农村地区分布着大量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水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尤其重要。通过现代工业手段实现对风、光、水、生物质、地热等资源的利用,因地制宜开发分布式能源,高效解决农村能源散烧煤、生物质利用粗放、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不足这三大短板。比如,扎实开展农村能源“双碳”行动,结合当地自然资源打造县域特色低碳能源产业,构建多能互

补、低碳分布式能源网络;再如,提升农村电气化水平,共同建设美丽新乡村。

二是民主党派要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着力,推进乡风文明、实现乡村文化的振兴。如民主党派发挥人才优势,组织专家学者深入乡村地区开展讲学活动,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和乡风文明。民主党派还要加强对村民的文化引领、浸润,推行书香乡村,提升村民素质,推进乡风文明。同时,发扬和振兴优秀的乡村文化、先贤文化,在在乡风文明的基础上提振文化振兴,增强乡村发展的软实力。

五、夯实阵地建设,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高效

民主党派要做好宣传和引导,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凝心聚力,提振精气神,摒弃懈怠散懒思想状态,全身心投入乡村振兴伟大战役当中;教育干部群众明确乡村治理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站位,健全和创新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要凸显乡村自治、德治和法治的有机结合,民主党派发挥党派和社会组织作用,深度参与其中,发挥新乡贤和致富带头人的作用;要凸显基层党组织、民主党派与社会组织、村民自治机构的有机结合,民主党派嵌入到乡村环境,与基层党组织、社会团体、村民自治机构良性互动,齐抓共管,从而推动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高效的目标。

当下,我国发展面临着国内外的一些挑战。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对台海、新疆、西藏、人权等问题无中生有,指手画脚,对我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进行打压;国内新冠疫情反复发作,导致经济下行,乡村振兴面临一定的压力。值此关键时期,我们更要振奋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主党派更要发挥自己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民主监督的优势,发挥自己依托政协、统战部门开展工作的便利条件,发挥自己和高校、工商联、新阶层人士联系紧密的优势,发挥自身智力密集、英才荟萃的优势,加强和妇联、科协、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的联络,以高质量发展为统领,突出帮扶的智力性、技术性、引领性,示范性,为乡村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培育出乡村振兴需要的知识性、技能型、创新型、文明型人才,推进农业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推动乡村振兴事业阔步向前,形成乡村振兴有力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格局、新气象、新风景。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四新三好【EB/OL】.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6%96%B0%E4%B8%89%E5%A5%BD/22913721>.
- [2]陈晓红、邓清.民主党派助力乡村振兴的优势及路径研究【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01):48.
- [3]乡村振兴人才是首位,要掀起新时代“上山下乡”新热潮【EB/OL】.中国网[2018-02-05]http://www.farmer.com.cn/zt2018/1hao/qwsy/201802/20180205_1355219.html.
- [4]王克俭、杨静伟.拜泉县“人才+科技”赋能乡村产业振兴【EB/OL】.腾讯网[2022.08.30]<https://new.qq.com/rain/a/20220830A01SW800.html>.
- [5]习近平.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4)—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EB/OL】.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7-11-03]<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7/1103/c385474-29626301-4.html>.
- [6]《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 2021》发布【EB/OL】.新浪财经[2022-05-09].<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2-05-09/doc-imcwipii8908107.shtml?cref=cj>.
- [7]周怡然.乡村CEO如何为人口流失的乡村赋能【J】.财经,2022(15):23.
- [8]绵阳游仙区发挥民主党派优势,助力乡村振兴战略【EB/OL】.同心四川[2022-04-07]<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9446325150133162&wfr=spider&for=pc>.
- [9]袁红英.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五个关键【EB/OL】.人民论坛[2021-06-25]<http://www.rmlt.com.cn/2021/0625/617251.shtml>.
- [10]吕欣.我市各民主党派发挥优势积极助力乡村振兴【EB/OL】.遵义市人民政府网[2021-09-15]https://www.zunyi.gov.cn/xwdt/zyyw/202109/20210915_70427917.html.
- [11]浙江省首个三级共建“九三学社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基地”在杭州揭牌【EB/OL】.杭州统一战线[2022-08-2]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9570415.
- [12]孔祥智等.乡村振兴的九个维度【M】.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70.
- [13]邓华宁、石永红.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可获量每年达73亿吨标准煤【EB/OL】.新浪财经[2006-11-16]<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061116/15581045586.shtml>.

责任编辑:常海哲

对新时代我国统一战线工作 新特点的分析与思考

刘翠英

【摘要】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具有理论创新、使命创新和路径方法创新。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工作理念、政治基础、“重要法宝”内涵、战略地位都得到了创新提升。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主权安全的政治联盟、服务于“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因此,要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集中领导,坚定统一战线重要法宝自信,创新统战工作思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关键词】新时代 统一战线 新特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对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汇聚起共襄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写入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思想,开创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赋予了新时代我国统一战线工作的新特点。

一、理论创新: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基石

1.创新了统一战线工作理念。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统一战线形成的根本原因,即“命运共同体”意识,提出要培育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并在此指导下,对统一战线工作提出新要求,做出新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统一战线“新型五大关系”论断,即以协商合作为核心特征的新型政党关系、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内容的新型民族关系、以宗教中国化为核心导向的新型宗教关系、以责任担当为核心价值的新型阶层关系、

以亲清为核心规定的新型政商关系、以民族复兴为核心追求的新型海内外同胞关系,实现了新时代统战工作的理念创新。最大公约数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理念。统一战线要以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构建中国特色的同心圆式的团结奋进共同体。在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中要坚持底线思维。新时代统战工作要注意分类施策,正确区分问题的性质。

2.拓展了统一战线工作政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强大的动力支持。《条例》将统一战线性质完善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拓展了统一战线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进一步明确了共同的奋斗目标,指出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

3.丰富了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法宝”内涵。《条

作者简介:刘翠英,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督导室主任、妇联主席(兼),教授,民盟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部主委。

例》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工作“三个重要法宝”的新论断,赋予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法宝地位以新内涵,对统一战线地位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统一战线法宝理论的重大发展。

4.统一战线工作的战略地位得到创新提升。把统一战线放到全党工作的全局和战略问题上进行研究谋划和部署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显著特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我国发展的时代背景,也是统一战线工作的时代背景。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统一战线工作的战略地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的问题,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这不仅回答了为什么我们党在强大了、执政后仍然需要统一战线的问题,而且讲清了统一战线与新时代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内在关系,确立了统一战线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

二、使命创新: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新责任与新担当

从“爱国统一战线”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显著标志,决定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要体现新责任与新担当。

1.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条例》将同心圆的最外层从原来的“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扩大为“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更高程度、更广范围的大团结大联合。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由服务“站起来”、“富起来”转向服务“强起来”,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作最重要最根本的中心任务。

2. 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二十大将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提出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条例》明确将服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要健全统一战线工作制度机制,完善参与国家治理的互动机制,在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大有可为、积极作为。要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准确领悟新时代对统一战线赋予的新使命,树立共治理念,创新工作方法,发挥法宝作用。

3.形成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主权安全的政治联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统一战线主要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组成的阶级联盟。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由阶级联盟转变为政治联盟,随着时代发展,这一联盟的构成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完善。《条例》将统一战线确立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政治联盟的确立,标志着对新时代统一战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主权安全发展方面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和任务。

4.服务于“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条例》提出统一战线要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服务”。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要把争取人心、凝聚共识,最广泛地团结港澳台海外同胞,作为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增强港澳台海外同胞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增强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知;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筑牢坚持“一

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的人心基础。

三、路径创新: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新途径与新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原则和方法,为广大统战干部在工作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指明了方向,有利于把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集中领导,推动统战事业健康发展。要坚持党对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党委主体责任,提高新型政党制度效能,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努力营造有利于统一战线工作的良好环境,确保统战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推动统战事业健康发展,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障。

2.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坚定统一战线重要法宝自信。在政党关系方面,要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与支持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关系;在民族关系方面,要处理好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尊重各民族差异的关系;在宗教关系方面,要处理好政治上团结合作与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关系;在阶层关系方面,要处理好实现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兼顾不同阶层具体利益的关系;在海内外同胞关系方面,要处理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和包容思想观念多样的关系;要着力增进一致性,不断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要尊重包容多样性,不断扩大团结和联合的范围;要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利益,搞好与党外人士的联谊交友,把各阶层各方面的智慧力量凝聚起来,调动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3.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发挥独特优势,做好政治统战,强化政治引领,凝聚发展合力,在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上彰显新作为;要推动经济统战,以解决民营企业发展难题为突破口,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落实政企沟通机制,推动惠企政策落地,在强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中彰显统战新作

为;要抓好社会统战,引导和组织统战成员履行社会责任,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在促进宗教事业健康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要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引导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回国投资兴业。

4.创新统战工作思路,开展网络统战工作实践。要认真总结、系统梳理统一战线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好做法好经验,并结合新时代特点加以继承发扬。要适应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在深化传统统战工作的同时,深入研究和探索开展网络统战工作,既善于“面对面”,也善于“键对键”,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通过线下线上的交流相融。形成良性互动,促进人心凝聚,提升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握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书写新时代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崭新篇章。

参考文献

- [1]蒋连华.全面理解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J].群言,2022(9):32-33.
- [2]刘小莉,樊笃涛.新时代统一战线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研究[J].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4):18-22.
- [3]杨松禄.试论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变与不变[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1):33-38.
- [4]林华山.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4):5-17.
- [5]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262.
- [6]杨卫敏.习近平总书记统一战线重要思想论纲[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5):5.
- [7]张裔炯.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J].党建研究,2017(9):3-6.
- [8]赵岐山.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发展[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4):32-35.

责任编辑:邹平惠

建立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 商会组织沟通协商制度问题研究

【摘要】建立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商会组织沟通协商制度现实意义明显,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从全国层面来看,各地方近年来在积极推动和开展党委政府与商会组织民营企业沟通协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和积极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建立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商会组织沟通协商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坚持基本原则、明确沟通协商制度的主要内容、健全沟通协商制度。

【关键词】民营企业 商会组织 沟通 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立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商会组织开展沟通协商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求,也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重要渠道。在把握利益趋同重要原则下,推动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商会组织沟通协商制度化发展,有利于加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优化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

一、新时代建立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商会组织沟通协商制度重要意义

建立党委政府与商会组织、民营企业沟通协商制度具有多重意义,既能反映非公经济人士的利益诉求、调动广大从业人员积极性、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也能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既能发展和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也能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

(一)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需要

党的二十大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载入党章总纲部分,并和党的目标实现紧密联系。“中国

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落脚点在全,既包括党对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领导,也包括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民营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荣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通过建立健全沟通协商制度,能够使党委和政府及时掌握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了解非公有制企业家的思想状况,进一步提高经济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从而进一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二)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超过1.57亿,其中私营企业4740.8万户、个体工商户1.1亿户。”加强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商会组织的沟通联系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一方面能够让民营企业和商会组织及时了解熟悉党和国家的政策,把握好市场导向,推动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网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建设研究(21CDJ014)

作者简介:梁晓宇,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四川省党的建设研究智库研究员,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

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能够促进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商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推动良性互动的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从而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供制度保障。

(三)是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

在2022年7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全面系统总结了建党以来统战工作的历史性贡献和新时代统战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再一次明确了统一战线的法宝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系统梳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十个方面的经验(简称“十个”坚持)，“十个”坚持贯通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凝聚着百年奋斗的智慧心血,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党的二十大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统一战线作为党重要的执政经验之一载入总纲部分。2021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了统一战线十二个方面的工作范围,其中就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由此可见,引导广大民营企业企业家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是做好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需要

党的二十大党章在总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部分,增写了“民主协商”内容,即“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和程序”,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需要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内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而商会组织是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沟通的桥梁,是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可或缺的力量。建立健全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商会组织沟通协商制度,有利于推动协商民主多层次、制度化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热情、畅通其参与渠道。

二、近年来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商会组织沟通协商探索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单位部门把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围绕建立沟通协商制度机制,明确协商主体权责,拓展协商形式内容,加强沟通协商组织领导等方面作了大量探索。

(一)推动建立沟通协商的制度机制

围绕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从中央到地方结合实际需要建立了丰富的沟通协商制度机制。如,中央统战部建立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专题座谈会制度,各省市地区建立的促进非公经济发展机制、非公经济联席会议制度、重大政策制定征求行业协会(商会)工作制度、党政领导对口联系民营企业制度、政府部门对接行业协会(商会)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双向评价制度等。此外,个别省市地区还因地制宜开展了创新探索,山西省制订领导干部联系民营企业“两个回头看”工作机制;广西省南宁市建立的“两会一队三平台”(非公经济人和商会建设座谈会,企业服务队,“企业服务中心”“中小企业服务工作站”非公经济服务APP)沟通机制;重庆市涪陵区建立区党政领导、区级部门领导、区级科室负责人联系民营企业(商会)制度、解决民营企业问题“直通车”制度等。

(二)逐步明确政商沟通协商的主体权责

在各省市推进的政商沟通协商中,逐步开展了政商双方主体权责分工的探索实践。各地党委、政府承担主导思想引领、组织实现协商活动、召集政商沟通协商等职责;商会行业协会组织承担政商沟通桥梁纽带职责,发起并组织开展行业协商、代表特定领域参与党委政府组织的协商活动;民营企业履行调查研究、建言献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协商参与者职责。如,重庆市制定“党委出题、商会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工作机制,邀请商会、行业协会开展深度调研,行业协商;甘肃省成立非公经济发展协调推进领导小组邀请商会组织、民营企业参加非公经济组织政银企联席会议,推动政商沟通协商;重庆市涪陵区邀请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专项协商,民营企业以“万企帮万村”活动为平台积极助力精准扶贫工作等等。

(三)积极拓展政商沟通协商的形式内容

各省市地区遵循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制度要求,在工作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政商沟通形式和内容。沟通协商形式以会议、走访调研等形式为主,运用网络问政、企业家沙龙、创新创业论坛等主题活动为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的沟通协商。协商内容主要涵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支持、土地供给、

交通通讯和电气等要素保障、人力资源供给、企业员工权益保障、商会组织建设以及政务服务改善等涉及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題。同时,各地也将事关经济社会发展改革中心工作和民生重点工程等纳入政商沟通协商内容,邀请民营企业和商会组织参与调研协商。如,连云港市政府出台《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暂行办法》,将企业员工劳动报酬保障纳入政商沟通协商内容,推动建立民营企业员工的工资共决、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深圳市出台保障驾驶员权益若干措施,推动政府与出租车行业协会开展协商,促进出租车“份子钱”转向市场调节。陕西省西安市定期召开圆桌会、企业沙龙,邀请民营企业为党政干部授课,消除政商交往隔膜。

(四)不断加强政商沟通协商的组织领导

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商会组织沟通协商中,各级党委、政府积极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政商协商工作的组织领导。党组织和政府负责同志主动参加沟通协商活动,出台推进沟通协商的规范性文件,开展分级牵头、分领域组织的政商沟通协商。如,国家领导人出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专题座谈会,中央统战部会同全国工商联开展调研协商;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的意见》,推动商会建设;湖北省出台《关于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建立政企沟通常态机制。在此同时,各地大力加强以“两新”组织建设为重点的非公党建工作,强化对政商沟通协商的组织保障。如,湖南省长沙市成立非公企业纪检组织,参与完善企业重大决策的决议。苏州市吴江区出台《非公党建组织力标准体系》,明确工作制度、工作程序、工作方法、考核机制标准。四川省开展新时代民营企业工作示范行动,从组织体系、组织能力、政治功能等6方面开展重点建设。海南省委统战部为青年民营企业家就海南游轮建设建议开通“直通车”,向省委、省政府领导发专报。

三、当前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商会组织沟通协商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各省市在推动政商沟通协商工作中有探索有创新,但从实际工作推进情况来看,由于沟通协商工作还缺乏由上到下系统性、规范性的指导,政商沟通协商还存在协商机制不统一、主体范围不明确、形

式内容不规范、落实反馈不到位、运行保障不充分等问题,制约了政商沟通协商的良性发展。

(一)协商机制不统一,规范性不足

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制度保障不到位,全国各省市地区在开展政商沟通协商工作中存在程序性、规范性不足的问题,部分地区的沟通协商较为随意和分散,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协商机制。调查显示,部分企业认为,政商沟通协商缺乏全局性的规划指导,各地的沟通协商方式和内容“百花齐放”各不相同,但在程序上却不能做到规范有度。有的同志认为,部分地方党委、政府追求“广泛”协商,使协商内容过于繁杂,民营企业和商会组织参与协商时研究不深不透、重点不突出,协商效果不佳,参与体验好感度也不高。

(二)协商主体范围不明确,代表性不强

当前的探索实践还未形成政商自由平等的双主体格局,党委、政府、民营企业、商会组织作为沟通协商主体的关系还未完全厘清。各级的政商沟通协商中,沟通协商主体不明确,对因事制宜协商的把握度还不足。如,在涉及民营经济领域的各类协商中,行业话语权足、经营发展好的大型民营企业参与协商的代表性“过强”,而受决策影响大的中小民营企业弱势群体参与协商对话机会太少。在实施工业领域专项协商过程中,确立协商主体时易将民营企业与商会组织、行业协会易“混为一谈”。工商联(总商会)作为政企衔接纽带作用发挥还不够,对行业商会的指导作用待加强。调研发现,有的同志认为工商联的职责只是衔接和反映工作,其代表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协商不够资格,代表企业与党委政府协商也与职责不符。也有的同志认为,开展行业协商邀请大型民营企业代表参加即可,小微企业代表性不强,无法在行业这个层面与党委政府协商。此外,民营企业、商会组织作为协商主体的意识不强、积极性不够、协商能力不足,有效收集分析提炼行业发展问题的能力不够,在沟通协商中总是处于被动地位。据调查,70%以上的民营企业和商会组织认为沟通协商是地方党委、政府主导,自己是被动参与,难以与党委政府站在同一平台协商。

(三)协商形式内容不规范,操作性不强

各地政商沟通协商的形式和内容千差万别、各有不同,多由党委、政府一方自行决定,民营企业、商

会组织参与制定沟通协商形式内容的自主权和话语权还不够;因事制宜确定协商形式的把握度不够好,致使沟通协商的操作性不强。调查中,有的企业表示,政府组织沟通协商内容虽多,但与各领域各行业企业发展的契合度不高;未根据协商事项确定最合适的协商形式,未因事制宜地根据协商内容确立相应协商形式,影响实际效果。同时,受协商主体个人水平和专业性局限,协商建议采纳率不高,挫伤民营企业参与协商的积极性。有的同志反映,目前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协商形式丰富,早已不存在沟通壁垒问题,在协商形式的选择上,党委政府倚重会议协商,民营企业 and 商会组织青睐调研协商。由于没有相关制度来明确什么问题应以什么形式来协商,致使双方在协商形式选择方面难以达成共识。

(四)协商落实反馈不到位,积极性不高

政企沟通协商的目的是为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而各级政商沟通协商过程中,党委政府重视、基层联系服务紧密,权力部门的办理落实也很积极,而协商成果落实反馈制度程序设计的缺失,使信息反馈不到位,企业、商会在沟通协商中的“获得感”不强,挫伤沟通协商积极性。调研发现,有的企业认为,政府组织的协商会议有声音、有结果,但权力部门落实协商结果时耗时太长,办理的过程无从知晓,办理的结果通常也不会及时反馈给企业和商会,让人有“不了了之”的感觉。有的同志反映,部门在承办协商意见建议时,由于没有落实反馈的制度性要求,部门无法对有关事项进行逐一回复,协商成果通常会直接作用工作中。还有的部门同志认为,政商沟通成果办理过程是内部管理的事项,不必也不益过多的透露给民营企业和商会组织知道。

(五)运行保障不完备,实效性不好

各地探索建立的政企沟通协商制度,由于制度的运行保障不完备,呈现出实效性不好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组织保障不足。各级政商沟通协商还缺乏统筹全局的组织领导机构,沟通协商缺乏统筹规划和组织协调;各地民营经济缺乏牵头主管部门,难以有效地集中推进协商工作;同时,非公党组织建设力度还有差距,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领导带头作用发挥仍需加强。二是监督机制不完

善。政商沟通协商尚无硬性的监督保障机制,也未缺乏科学的评价监督体系,对协商主体双方履职情况、协商成果运用等方面难以开展客观评判。三是能力保障不足。政府在提升民营企业协商能力方面的教育引导力度还不够,部分民营企业在参与沟通协商时议事议不到点子上,只求混个脸熟,或以此为平台加大与官员的交往途径。一些商会组织把握市场发展规律、寻找矛盾共性规律的能力不足,难以代表行业正确发声。还有部分商会组织负责人参与沟通协商时,以自己企业的问题代表行业矛盾,利己思想严重。四是外部环境保障不足。部分地区对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推动政商协商工作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干部群众对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和促进政商协商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经济意义、社会意义认识还不到位,共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氛围还未完全构建成功。

四、建立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商会组织沟通协商制度的思考

建立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商会组织沟通协商制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深入广泛协商的有机统一,按照协商在前、协商于商的要求,以建立健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商协商机制为目标,以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明确协商程序、内容、形式,切实推进民营企业和商会组织享有更多的民主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促进民营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可持续发展。

(一)沟通协商制度的指导原则

民无商不富,国无商不兴。政商关系集中反映的是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建立政商沟通协商制度,“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科学稳妥处理公权与私权关系等问题的重要手段,应当以坚持党的领导、平等协商、‘亲’‘清’政商标准、因事制宜为原则开展沟通协商”。

1.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营企业、商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前提。“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和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包括民营企业和商会组织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才得以蓬勃发展。构建政商沟通协商制度必须在坚持党的

领导下推进,要发挥好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发挥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优势,推动民营企业 and 商会组织更加广泛深入有序地参与协商。

2.坚持平等协商。平等是开展对话和协商的重要基础,也是构建政商沟通协商制度的重要原则。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认识到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性,主动倾听民营企业和商会组织的困难和心声,与民营企业和商会组织在开展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推进沟通协商。

3.坚持“亲”“清”标准。为切实破解发展难题,党中央强调从政策制定和实施上解决制约和阻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努力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发展环境。坚持“亲”和“清”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关键点,党员干部要真诚、坦诚与民营企业企业家交往,切实帮助、关心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努力同民营企业企业家形成清白的交往关系,不以权谋私,不搞权钱交易,理清政商交往界限,自觉接受监督。对于民营企业企业家而言,要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4.坚持因事制宜。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各地的探索步伐不一致。有的侧重于顶层设计方面的探索,如广东省在2003年就出台了《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尊重和听取民营企业的意见;有的侧重于常态化的制度探索,如广西建立了党外人士交友制度,“自治区和各市都建立了省、市级领导联系重点项目制度。每年组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开展政党协商调研”。

(二)沟通协商制度的主要内容

政商沟通协商制度涉及的领域和内容广博,可从协商主体、形式、程序、运行保障等方面理清思路,开展制度设计。

1.明确沟通协商主体。各级党委、政府及派出机构,党委部门纪委、组织部、统战部、政法委,政府部门发展改革委、经济信息委、城乡建委、交委、农委、商务局、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人力社保局、国土资源局、环保局、规划局、水务局、安监局、工商局,工商联,大、中、小、微民营企业,各级商会组织、行业协会,基层村(社区)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非公党

组织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均可作为协商主体。涉及非公经济领域发展的公共事务、中长期规划和重大政策制定,应由各级党委、政府牵头组织开展协商。涉及行业领域重点问题、民营企业职工权益保障等问题解决,由党委、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牵头,组织利益相关方开展协商。涉及区域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由区域所在党组织、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基层村(社区)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牵头组织开展协商。涉及商会、行业协会领域问题,由统战部指导、工商联牵头组织开展协商。协商中涉及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事项,可邀请相关专家者、专业技术人员、第三方机构等参与评估。

2.明确沟通协商形式。坚持非公经济联席会议和民主协商制度,规范沟通协商流程。立足区域、行业领域特点,围绕民营企业、商会组织反映强烈的矛盾和问题以及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应当与民营企业、商会组织沟通协商的事项,可采取会议、约谈、调研、书面、网络及其他等形式开展沟通协商。

(1)会议协商。可由党委、政府或党委部委、政府部门牵头组织召开,民营企业、商会组织参加协商会议,双方就涉及民营经济发展领域的问题进行沟通协商。如联席会议、协商座谈、意见征求会等。

(2)约谈协商。协商主体双方均可主动发出邀请,在约定的时间地点就约定事项开展沟通协商。约谈形式既可单独约谈,也可集体约谈,还可依托电话、网络等实施约谈。

(3)调研协商。由党委、政府或党委部委、政府部门牵头开展,以问题为导向实施现场调研走访,并针对性的解决涉及民营经济发展的某方面问题。如,现场办公会、学习交流调研、现场协调会等。

(4)书面协商。协商主体一方就需要沟通协商的具体事项以书面形式向另一方发出询问并征求意见,并由收文方在规定时限内向发文方作出回复。如党委、政府或党委部委、政府部门就民营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法规法规等事项征求民营企业和商会组织意见建议。民营企业、商会组织就企业发展问题、行业发展风险预判等情况向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及时反映情况。

(5)网络协商。在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协商主体双方运用互联网工具进行沟通协商的形式。如,网

络问政、网站宣传、微信和APP自媒体及时沟通等。

(6)其它形式。主要指一些游离在以上主流形式之外的新型沟通协商形式,如:以各级联络员、网格员协助沟通协商,网络意见代表人士协助沟通等。

3.明确沟通协商程序。协商程序应视协商事项重要程度来分别确定,一般协商程序为:各级党委、政府、党委部门、政府部门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研究提出协商议题,拟定沟通协商计划,确定参与协商的各类主体;通过多渠道信息传导,将协商内容和相关信息及时通报给各协商主体;组织开展沟通协商,确保各类协商主体充分发表意见建议,形成协商意见;组织实施协商成果,向协商主体、利益相关方反馈落实情况。特别重大事大和涉及面广和关注度高的事项,应增设调研议事、专题议事、听证等程序。

4.明确沟通协商保障。从组织、监督、能力、外部环境等方面思考政商沟通协商制度的保障措施。强化组织保障,成立各级政商沟通协商工作领导组织机构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主管机构;加强非公党组织建设。强化监督保障,加强绩效考核,推动纪委、监察委监督执纪;开展民营企业、商会组织参与沟通协商履职评估和非公经济人士综合评价。强化能力保障,建立多元化培养机制,提升各类协商主体的沟通协商能力。强化外部环境保障,拓展宣传形式,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建立健全沟通协商制度

推动建立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商会组织沟通协商制度应注重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必须把政企沟通协商制度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积极推进。

1.加强顶层设计。中央层面尽快制定促进政商沟通协商的规范性文件,出台《关于加强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商会组织沟通协商的意见》,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需求的沟通协商制度,全面规范各级政商沟通协商活动。

2.加快推进出台《行业协会法》。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通过立法推动商会、行业协商拓展服务职

能范围,加强分类管理和灵活指导,促进行业协会的规范发展,推动在资产、人事、市场运作等方面享有更多自主权,推动商会组织在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3.发挥商会组织作用。进一步推动党组织向商会组织全覆盖,加强党对商会行业协商的领导,指导商会组织在分担政府职能、加强行业管理和自律等方面发挥作用,在商会组织中开展履职诚信综合评价等活动,推动综合评价成果的广泛运用;“逐步将能够由商会组织承担的有关行业管理职能、服务职能以及社会管理中的技术性、事务性、辅助性的职能,通过授权、委托及其他方式依法转移给有相应资质的商会组织承担”。

4.积极推动信息化沟通。搭建服务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工作的数字化、网格化、动态化服务模式,畅通民营经济人士利益表达网络渠道,在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协同高效上下功夫见实效。

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8.
- [2]庄聪生.深刻把握党的二十大关于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论述【N】.人民政协报,2022-10-21(06).
- [3]中国共产党章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3.
- [4]张李娟.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沟通协商制度研究【J】.重庆行政,2019(1):55.
- [5]本书编委会编: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2:58.
- [6]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课题组.建立党委政府与商会组织民营企业沟通协商制度的实践与思考【J】.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1):46.
- [7]赤峰市委统战部.关于建立党委政府与商会组织、民营企业沟通协商制度的调研报告【J】.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19(1):13.

责任编辑:闫丽红

治理重心下移与村干部角色重塑

——基于西部地区Y村的经验研究

王兆花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基础的变迁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社会治理任务更为繁重。创新乡村治理,村干部无疑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文章沿着互动论视角的逻辑,关注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张力与平衡中的村干部,探讨项目进村过程中,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内源性力量对村干部角色及行为的影响和形塑。研究开展中,通过对西部地区Y村的个案分析,考察治理重心下移过程中村干部的角色重塑。

【关键词】西部地区 乡村治理 村干部角色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以及统筹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届四中全会绘制具体的推进图谱,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事实上,乡村治理有效既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能动性主体之一,成为理解“国家—农民”关系的重要切入点。新时代背景下,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巨变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任务更为艰巨,这其中,村干部无疑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2021年5月底,笔者前往西部地区Y村调研,发现在日常工作中,村干部对自身角色定位以及自身工作价值产生了质疑,Y村主任告诉笔者“形式主义的工作”和“纸片片”工作大概占据了他所有工作的80%,他讲道:“我认为我的作用,或者说村干部的作用就是服务村民,给他们办事,然而现实中的许

多工作,特别是‘纸片片’工作,耽误了我干主要工作的时间,有时候难免对自身价值产生质疑。”“还有,许多村干部的辞职,主要原因是工作繁重,不着家。”同时他强调,“绝大多数村书记其实都是想当好这个村书记的,每个干部都想带领村民发展。”然而现实状况是,一方面村民对村干部的认可度低;另一方面,一些杂务挤兑村里日常事务的情况比较普遍。基于上述分析,村干部似乎成为乡村矛盾的中心点,成为事实上的一个“双向压力阀”。

这一现象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事实上,村干部不全是“守夜人”和“撞钟者”,随着基层组织建设的深入推进,部分村干部被吸纳进体制内,因此他们并非完全的“双重边缘人”;由于村民的不信任,也做不了“村庄的当家人”,那他们仅仅只是“国家的代理人”吗?他们是如何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体现自己的能动性的?文章带着以上问题,基于对Y村的实地调研,旨在讨论在国家治理重心下沉的过程中,村干部的角色呈现出怎样的情形?

二、文献综述

(一)结构性视角

结构性视角的出发点是将村干部视为国家与社

基金项目:本文为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甘肃中华文化学院)2022年专项课题“甘肃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GSSYZB2022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兆花,女,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会二元框架以及各项制度要求下的结构性产物。^[2]杜赞奇提出了“经纪模型”，“经纪人”是指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民众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者，乡村社会的经纪人分为两类，分别为“保护型经纪”和“营利型经纪”。前者代表社区/乡村的利益，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后者则将乡民视为压榨利润的对象。^[3]杜氏用“经纪模型”理论探析了中国农村社会中居于乡村与地方政府间的“经纪人”的双重性。费孝通针对我国传统社会治理结构提出了“双轨政治”的经典概念，他认为，在帝制中国，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密码在于双轨政治结构，一轨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制机器，一轨是以士绅为中心的村社自治，士绅作为上下之间的转换器维系着国家规模之累和治理绩效有效性之间的均衡。^[4]无论是杜赞奇提出的“经纪模式”还是费孝通提出的“双轨政治”，“经纪人”和士绅均是作为国家和乡村直接沟通的“中介人”。

徐勇在“双轨政治”和“乡政村治”的启发下，提出将村民自治施行以来的村干部定义为“国家代理人”和“村庄当家人”的双重角色理论。^[5]然而现实中，村干部并非规则化、制度化的接受行政与自治的驱使，在一些几乎没有集体经济的“空壳村”中，吴毅用“守夜人”和“撞钟者”来形容村干部消极怠政的行为特征。之后，吴毅又发现村干部在国家与农民关系中，既无法被行政体制所吸纳，又难以彻底融入农民群体，反复游弋于代理人角色与当家人角色之间。基于此，吴毅提出村干部“双重边缘人”的概念，形象生动地描绘出税费时期村干部的两难处境。^[2]

邢成举基于对杨村村级服务大厅的考察与分析，认为村干部协助政府办公，村级服务大厅的创建使村干部只能进一步明确，角色更加偏向“政府代理人”。^[6]孙秀林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村庄民主的实行可以促使村干部在日常治理过程中减少对于国家任务的关注，增加对于社会事务的关注，从而使其角色定位更加倾向于社区利益代言人。^[7]

(二)能动性视角

能动性视角强调村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凸显村干部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及制度框架下的自主选择与回应。^[2]李志军通过对西北退耕还林(还草)案例的分析提出“谋利型代理人”的概念，他发现实践中的村干部不仅是国家和村民的代理人，而且也是特殊

关系网络的代言人，在具体实践中他们更多的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扮演代理人的角色，行为呈现谋利化趋向。^[8]龚春明提出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表述村干部角色更为客观、具体，认为村干部善于在政府和农民面前不断变换脸谱，善于利于职务之便和体制漏洞实现自身利益，在实际工作中存在“有利就为，无利不为”的现象，未能周全考虑整个村庄的利益，而是倾向于通过村干部这一身份获利。^[9]任轶认为村干部作为一个理性的行为主体，最终目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里的个人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10]陈峰认为“双重代理”的结构定位给村干部预设了应然身份，但在各项制度的实际运转中势必给其留出了自主空间，作为行动者的村干部也在寻找自主行动的可能，在制度允许范围内发展出不同的身份。^[11]在项目下乡过程中，“经营性经纪”的概念被提出，认为经营性经纪作为项目制背景下村干部新的角色性质，一方面以贯彻行政意志为导向，协助乡镇实现项目绩效最大化；另一方面，以谋取个人私利为导向，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事实上，这一实践在稳固村庄权力结构的同时，也消解着村级自治能力。^[2]

(三)互动论视角

互动论视角关注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内部力量对村干部角色的双重塑造。黄宗智在讨论中国的国家与村社关系时指出，中国的基层治理没有设想国家和村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一直把国家和人民(村社)视作一个二元合一体。^[12]另外，在项目进村背景下，国家与农村社会已经从汲取与被汲取的关系转变为扶持与被扶持的关系，而并非对立关系。乡镇的“悬浮”、对村庄政治控制力的降低以及对村干部争取项目的策略性利用，都为村庄社会基于自身项目诉求选择村治主体提供了条件，致使“新代理人”的出现，“新代理人”的治理实践表现出一种利益治理的逻辑，“新代理人”与传统代理人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逻辑、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13]还有，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

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12]

通过上述学理分析,以往研究大致在国家—社会关系的框架中进行讨论,结构论视角从宏观层面上展开,更加偏向于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行动者视角关注到了结构论视角忽视了的行动者的能动性,通过微观层面上的研究,将村干部作为行动者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呈现出来;互动论视角则关注的是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内部力量的双重交互影响。事实上,新时期的项目进村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治理逻辑,项目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取决于内外两种力量之间的匹配和契合。^[12]本文主要沿着第三种视角,即互动论视角的逻辑,强调国家和乡村力量之间的张力与平衡,探讨在项目进村过程中,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内源性的力量对村干部角色及行为的影响和形塑,通过对西部地区Y村的案例分析,考察村干部角色及行为背后的逻辑。

三、村庄内部差异与项目资源分配

Y村位于甘肃省天祝县西南部,距县城34公里,距Z镇政府1.5公里。地处Q河河谷及其支流的狭长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平均海拔高度2860米,属半农半牧业村,以种植高原夏菜和养殖牛羊马为主,其中养羊户72户、养牛户35户、养马户13户。全村辖3个村民小组,共有330户1130人。全村居住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共4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全村人口的40%。全村耕地面积5956.9亩,草原面积39515亩。村专职化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年龄36岁,本科学历;村党支部副书记年龄47岁,大专学历,工资均由县财政支出。Y村民委员会共有7人,其中女性3人,中专以上学历4人,40岁以上2人。村民监督委员会共有3人,其中中专以上学历1人,40岁以上1人。2020年换届选举后,村两委班子成员整体年龄下降、学历上升,各成员分工明确。

A组处于Q河下游,沿岸可灌溉耕地面积增多,平均海拔2400米左右,年均气温2℃,较B组高3℃-5℃,范围内大部分为河岸阶梯地和浅山地,生态环境更接近黄土高原,牧业特征淡化,农业特征显著。在包产到户前后,村内种植作物有青稞、油菜籽、燕麦、大麦,此外还有小麦、蚕豆等生长季较长的作物。2000年开始,村民尝试经济作物,开始大面积种植蔬菜,农业产业转型也由此开始,目前大部分村民

以农业种植为主要收入来源。B组坐落于乌鞘岭隧道入口处,地处山谷中,为三个自然村中项目资金投入最少的村庄,主要以养殖业为主,农业种植,特别是经济作物种植为辅。2019年,向邻镇及A组学习并尝试种植高原夏菜等经济作物,由于耕地所处半山腰,温度比其他两个组低3℃-5℃,导致大面积经济作物受到冻害影响,产量和品质严重下降,进而导致价格下跌,受益极小,部分农户甚至亏损。牛羊养殖在院子里或者院子外面,亦未实现“人畜分离”。C组的农牧民在2000年以前大致沿Q河分散居住,2010年左右由于高速公路横穿C组,部分农牧民宅基地和耕地被征用,被占用宅基地的农户重新申请宅基地建房子,使得原先分散居住的布局更加分散。2018年,县政府开始对Y村C组进行集中收缩、改造提升,规划了Y村藏民俗新农村建设项目。共统筹整合资金2167万元,其中天津市投入精准扶贫对口支援资金1052万元,修建了52套藏式风格二层框架结构房屋,36套大户型,每套面积109平方米,16套小户型,每套面积98平方米,配套建设了小广场、围墙、大门和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实施了巷道硬化、绿化和亮化工程;按照人畜分离的原则,在村庄外集中修建了48座养殖暖棚,供群众发展牛羊舍饲养。

Y村三个组不同的自然环境与地质条件导致了其居住空间布局和生计方式的差异,后又因入村项目的分配使得村庄面貌呈现不同的形态。C组在2018年由县政府规划了藏民俗新农村建设项目,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牧民的居住条件,将原来分散居住的群众集中安置到一起,统一规划建设水、电、路、污水管网等基础设施。通过住房建设,配套公共设施,推行人畜分离,整体推进了生态文明村建设,是Y村中唯一一个实现“人畜分离”的村民小组。A组作为离村委会最近的自然村,地处Q河下游,地势平坦,有一定的地理优势,项目资源与村庄本身的地理条件相契合,因此很部分项目试点选择均在A组,比如集中型养殖区的建设、节能管道试点等,但于2020年颁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相关政策要求在河道附近的养殖小区必须在2021年7月之前进行搬迁并拆除,新的养殖棚还未建立,并未实现“人畜分离”,整体村庄建设情况和面貌较A组次之。B

组作为项目资金投入最少的自然村,是三个组中基础设施建设最差的自然村,房屋和牛羊棚圈连在一起,未实现“人畜分离”,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稍差导致群众生产条件相对受限。

作为分税制之后最重要地治理机制之一,项目制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都发挥着重要地作用。^[4]从征收税费到资源下乡,国家对农村的政策总体取向从“汲取”转向“输入”,大量的政策资源以各种形式流入农村,农村不再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阶段性)的手段,而是发展目标本身,项目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发展进程、方式及规划,同时,资源的内部分配问题也使得村民对基层政府及村干部产生不同的态度。由于国家资源包揽了村庄建设的方方面面,村民在这种情形下认为村庄建设理所当然应该由国家给资源、由村干部去争取资源,如果村干部没有为村庄争取到项目,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B组村民L谈到“之前的社长没有能力,光知道给自己争取个人利益,没有给村(自然村,即B组)带来任何好处。”此外,村民还认为,项目资源的分配与村干部的社会资本有关。“现在的社会,干啥都靠关系,村书记在县上或乡上有关系,就能拉来项目,没有关系的就拉不来,往下一级也一样,社长有关系,就能给自己村(自然村/村民小组)上拉来项目资源。”最后,村民认为项目资源的分配与资源的积累和村干部的政绩有关。“项目都进了基础好的地方了,因为能出成果,上级领导检查都带去C组,像我们组本来条件就差,项目投进来看不见,人领导看不见效果,所以没人管,越没人管越差,越差越没人管。”

四、互动中的村干部及其行为逻辑

(一)作为“平衡点”的村干部

Y村所在的Z镇,辖区草原一直延伸到远处的祁连山脉,临近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了维护生态环境,保护水源不被污染,政府提出了“河流一公里以内不能见牛羊”的治理要求。但是,由于草场区域划分,牧民在放牧过程中,避免不了要让牛羊接近河流附近,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村干部的工作造成了困扰。“人家的草场就在那一片,你不让人家接近河边,怎么可能?但是发了文了,提了要求了,我们就必须执行。”“我们也不能让牧民不放牧,那牛跟羊

吃啥?给牧民做工作也没法做,草场远一些的还好,但是草场在河边的不能避免。所以我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啥时候来检查,我们就提前漫山遍野的跑去跟牧民做工作,让他们先赶回家应付一下检查。但牧民经常抱怨,‘我这好好放着牧呢,为啥要赶回去,要赶你赶,反正我是不赶。’没办法,每次有检查的时候我们就满山跑着给牧民们赶牛羊,检查结束,还要赶回去。”“经常来来回回干这种事,正经事其实没干多少,每天都陷在这种来来回回跑路、‘纸片片’工作中,不知道干这个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是个啥?感觉还不如我之前当老师的时候充实。”

该村地处Q河河谷及其支流的狭长地带,又临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虽然当地为半农半牧区,同时也发展旅游业,但畜牧业仍是当地的主要收入来源。当国家视角下的生态政策在乡村社会层面执行时,面对的是牧民消极观望的态度,即表现为既不主动配合又不冲突抵抗。村民的这种消极态度也给村干部推行工作产生了很大的行动空间,故而也为村干部增加了工作量和 work 强度,“除了执行上级布置的行政工作,还有村庄的日常事务,再就是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这(赶牛羊等工作)上面”。在以上案例中,村干部在执行国家意志时,需要在国家政策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中谋求平衡,这种工作方式一方面表现出一种“粘合剂”的作用,即又完成了上级的规定和要求,应付了检查,同时,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村民的利益、和村民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避免了矛盾的产生;另一方面,大量类似的工作使得村干部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

(二)作为“矛盾点”的村干部

Y村养殖小区是在2015-2016年国家精准扶贫相关政策下建成的项目,当时养殖棚的建设也经历了多次动员。由于Y村临近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了维护生态环境,保护水源,根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相关政策,要求当地必须将在河道附近的养殖小区于2021年6月底进行搬迁并拆除,搬迁主要涉及到的是Y村A组。离此次拆迁不到五年时间,动员拆迁使得涉及的农牧民抱怨颇多,但真正有挑战的莫过于镇政府重新选的地址恰好与当地农牧民家的祖坟重合,该坟地有10个坟头,涉及6户人家。经过村干部初步沟通,农牧民同意迁坟,但是前提条

件是需要补贴2000块钱。二次推进时,农牧民又不同意,原因为2000元补贴不够,“按照市场价挖一个坟是1200元,请一个风水先生是600元,再管些烟酒茶水啥的,2000元根本不够”。村干部将情况进行汇总向镇政府反映,上级同意将补贴最高提至3000元。

然而,再次推进迁坟事宜时,部分农牧民仍不同意,个别农牧民言辞激烈的拒绝迁坟。Y村书记在多次碰壁后谈到“这个项目一开始我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毕竟挖人家祖坟的事,听起来就有点不道德,但下任务了也得硬着头皮去干,村民多次反悔我也能理解。”基于这种情况,迁坟事宜作罢,原定项目做调整,调整后的项目将新的养殖小区地址定在了村舍后面的草场,但由于新的养殖小区选址不符合人畜分离的政策要求,也不能长期固定。村书记解释道:“但是这也不长远,因为国家文件明文规定村跟人畜之间必须达到500米的距离,这个不行,可能50米都达不到,但再没有其他地方修建了,直接没有地方了”,“河道边上那些养殖小区,要求是六月底要全部拆除,镇上领导的意思我也明白,就是先在后面修些棚,把养殖小区搬掉,至于人畜分离的话,后期再另作打算。”养殖小区的工作动员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村民的不满,基于村庄内部本身的资源不均衡与外来项目资源分配的倾向性,各组之间资源呈现较为明显的差异。Y村文书告诉笔者,“B组的人畜分离也是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做的最好的就是C组,因为C组整体来说农牧民都比较贫困,之前精准扶贫的时候重新盖了新的楼房和养殖小区,一次性搞得比较彻底”。这种村庄内部的差异也影响着村民对村庄事务的参与与对村干部工作的配合。在村中偶遇的村民告诉笔者,“我们也想配合村上工作,但是也要我们能生活下去吧?要不给我们准备一个放(置)牛的地方,要不就多拉点项目,争取全部做成跟B组一样的房屋,一次性啥都解决了。”

同年10月2日,笔者再次到Y村,从村头小卖铺老板娘那里得知,新选地址重建的“临时”养殖棚,7月动工,在耗资百万建至一半时又被叫停,原因为“严格执行中央生态环保相关的政策,要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到实处,不能破坏草地”。故补贴5万元给涉及养殖棚拆迁的农户,暂时自行解决牛羊安置问题,养殖棚的重建需等后续项目的衔接。

在这次养殖小区搬迁事件中,由于涉及农牧民家族祖坟,所以第一次搬迁以失败告终。关于国家项目、社会工程是如何失败的已有研究从不同层面解释过这类问题,斯科特强调国家项目的失败在于对地方性实践知识的忽视以及项目的实施遭遇到了实施对象的抵抗。项目涉及的农牧民中虽然大多数为少数民族,但是由于该村所在的天祝县为西北民族走廊的重要通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有着充分的文化互融和民族交往,祖先崇拜文化在当地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看坟”“上坟”“烧纸”等祭祀活动的目的是祈求祖先荫庇,祭祀仪式及其过程也为村落文化融合和村庄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文化基础。此次养殖小区迁址项目的失败是由于项目本身与当地祖先崇拜文化冲突而导致的农牧民的不配合与抵制。基层政府作为落实公共政策的具体执行主体,在政策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基层政府在执行上级政府或部门下达的政策时,存在着明显的选择性执行倾向,这种倾向不仅表现在对不同政策的选择上,也表现在对具体政策执行方案的选择上。在国家生态保护、人居环境的要求与紧张的土地资源的矛盾中,基层政府选择先完成“最急”的指示,在这个决策过程中,长久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完成度。而村干部作为沟通政府利益与村庄利益之间的中间力量,不仅要传达政府的意志、执行政府的行政任务,还需要与农牧民对接并传达农牧民的意愿,同时还要意会上级领导不便于言传的意图。

在政府—村干部—乡村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村干部成为了三者之间的“平衡点”和“矛盾点”,在以上两个案例中,“资源”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贯穿始终。在案例一中,“草场”和“水”这一资源成为村干部行为困境的重要因素;而在案例二中,A组、C组面临的“人畜分离”的困境,与B组相比,除了村庄内部的土地资源外,还涉及来自村庄外部的国家项目资源。这些“资源”差异以及由其引发的政府行政意志与村民利益是成为村干部“矛盾点”的关键原因。村干部作为联系基层政府和村庄共同体之间的桥梁,在政府行政意志与村民利益发生冲突或是与村民需求不相匹配时,村干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行动,或是梳理村民意见并上报基层政府,争取在政策

执行中对政策进行修正,或是竭尽全力做村民工作,让村民接受。“但更多情况是做村民的工作,汇总村民意见上报一般起不了啥作用,除非继续进行导致村民极力反对才会调整方案。”

五、治理重心下移和村干部角色重构

纵观既有研究,大国治理中基层组织形态及其干部角色存在一条完整的历史脉络:传统郡县治国时期,“经纪人”和士绅均是作为国家和乡村直接沟通的“中介人”,清代时期,处于官方政府机构县衙门和民间社会调节机制之间的乡保作为治理中的“第三领域”^[15],呈现出了集权的简约治理的特征。晚清民初时期,在国家汲取目标导向下,保护型经纪被赢利型经纪所替代。新中国成立不久,以生产队为治理单元的国家治理实现了基层社会再造。改革开放之后,在村民自治框架下,村干部兼具“当家人”和“代理人”的双重角色。^[16]从征收税费到资源下乡,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取向从“汲取”转向“输入”,大量的政策资源以各种形式流入农村,农村不再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阶段性)手段,而是发展目标本身,项目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基层组织运行的逻辑,村干部作为农村治理的一个特定群体,日益成为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下渗的主要抓手。^[17]

(一)工资的报酬来源和管理

A组老人Z谈到,“人民公社的时候,我当生产大队大队书记一年工资好像是800斤粮食,要自己一户一户登门去收,收粮很困难,因为大家都困难,大多时候是收不齐的。”C组老人C谈到,“人民公社时期,我当生产队队长,平时争工分,一年额外有180斤的粮食当工资。”人民公社时期大队(村)干部报酬来自村级提留的管理费项目,以误工补贴的方式支付。实行村民自治后,村干部报酬的来源和方式开始多样化,且成为干群关系紧张的一个来源,但基本格局都没有变化。税费改革以后,村干部的报酬开始被纳入了财政支出的范围。Y村的村干部的薪酬变化大致经历了以上几个阶段,目前,村干部薪酬均由县财政支出。

村委会作为农村社会最基层的组织,多、繁、杂是其工作事务的主要特点,在我国现有的行政体制中,各项工作任务“最后一公里”全部集中在基层,压力大、责任重、事务多。随着村干部的报酬被纳入财

政体系,其管理方式也与乡镇干部的管理模式相似,日常工作也在地方性工作的基础上增加了行政性的工作。Y村的村干部中,村专职化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为正式编制,村党支部副书记等其他村干部均为兼职干部,但工资均由县财政支出,村委会的墙上贴着月值班表,所有村干部轮流值班。多重治理任务的叠加、项目密集下乡等充足的工作内容促使了村级组织的正规化和村干部的职业化,同时,坐班制和考核制成为组织内的产物,进一步强化了村干部的行政角色。

(二)村干部的权力网络与角色的重构

2013年以后,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展开,为了应对上级精细化考核要求,基层干部付出了远远超过职业化所需的时间和精力,这种自上而下的治理任务成为村干部角色建构的重要变量。对于西部地区来说,村庄治理事务行政导向明显,治理资源高度依赖地方政府和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与村庄内生需求本身关联不大,这种情况下村干部的职业化和行政化,被学者称之为是“外生性行政建构性正式化”。农村成为发展目标本身,大量的政策资源以各种形式流入农村,村干部日益成为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下渗的主要抓手,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时代的国家“代理人”。国家资源对乡村的输入极大的增强了县、乡镇对村庄干部的控制和支配能力,同时也赋予村干部一定的行政权力。此外,Y村专职村干部的要求为40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跟以往的“老干部”相比,这部分年轻的干部一定程度上在村庄话语权较弱,因此在村庄层面的文化权力较弱。

由于村庄建设和村庄发展等主要依赖于国家资源,伴随着密集的项目资源下乡产生的村干部的“外生行政化”已经深入到改变了村干部自我认同的程度了,而且他们自己非常明确的意识到这种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当初所谓的“代理人”与“当家人”的双重角色的冲突基本上不复存在,村干部的角色认同已经制度性的偏向于新时代的国家“代理人”。

六、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学界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村干部角色进行了深入探讨,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基于对西部地区Y村的实地调查,呈现了村干部在“国家—社会”互动中的具体行为,同时探讨了资源

下乡、治理重心下沉过程中村干部对自我角色的认同及角色的重塑。

事实上,农业税的取消及城乡关系的调整对乡村治理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当然,资源汲取、资源输入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渗透乡村社会方式的转变,随着资源下沉到乡村社会,村干部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特定群体,逐渐成为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下渗的主要抓手。研究发现,村干部既是当地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平衡点”,又是在当地政府与乡村社会互动过程中的“矛盾集合点”,也是自己作为“当地人”与村干部双重角色的“冲突点”。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国家资源的大量投入及对村干部的职业化和行政化,在治理实践中,村干部更倾向于作为国家的“代理人”而存在。在西部地区,特别是村庄内部资源缺乏的偏远乡村,村干部行政化的过程难以通过内部需求而完成,因此需要依靠国家项目下乡推动,倾向于“外生行政化”,这也成为村干部自身角色冲突的主要因素。总而言之,当前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产生了纠偏和规制效应,^[17]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进而为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奠定了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 [1]徐世栋.传承与创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机制优化研究——以青海省六个民族自治州为例[J].青海民族研究,2021(03):123-129.
- [2]彭晓旭.经营型经纪:项目下乡与村干部角色再造——以浙江D村为例[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1(03):67-75.
- [3][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
- [4]王向阳.新双轨治理:中国乡村治理的旧制度与新常态——基于四地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02):67-79.

- [5]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J].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04):151-158.
- [6]王向阳,杨莹,莫先翠.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村干部角色研究综述[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23):233-236.
- [7]孙秀林.村庄民主、村干部角色及其行为模式[J].社会,2009(01):66-88.
- [8]李志军.村干部“谋利型代理人”角色及其行为逻辑——以西北龙村退耕还林(还草)事件为例[J].古今农业,2011(03):27-36.
- [9]龚春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村干部角色及“无为之治”——以赣东D镇乡村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3):27-33.
- [10]任轶.政治精英在村庄治理中的角色:一种比较发展的视角[J].南京社会科学,2013(09):83-89.
- [11]陈锋,孙锦帆.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1):21-31.
- [12]肖龙.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1):71-80.
- [13]李祖佩.“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J].社会,2016(03):167-191.
- [14]任弢.从环境整治到乡村振兴:美丽乡村项目中的目标置换如何发生?——以浙江安吉为例[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5):15-26.
- [15]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J].开放时代,2008(02):10-29.
- [16]王向阳.改革开放后村干部职业化和行政化之路——基于我国东中西部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6):26-33.
- [17]景跃进.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再思考[J].治理研究,2018(01):48-57.

责任编辑:马霞

F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乡规民约建设研究

李迎利

【摘要】乡规民约属于中华文明进程中出现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村民自治的重要体现。早在西周时期《周礼》中则提到乡里敬老、睦邻的约定性习俗。可见,从古迄今,乡规民约都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极大影响力。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美丽乡村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推进背景下,为乡村民约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还需充分进行价值挖掘,确保乡规民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依法治国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而本文则以F市为例,对该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乡规民约建设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几点应对解决之策。

【关键词】F市 基层社会治理 乡规民约 建设

乡规民约是落实村民自治、对乡村治理工作进行创新的基本载体。在广大乡村地区的一些乡规民约,主要是当地民众根据地方习俗而自主制定的,注重礼法,崇尚诚信善良,以规范的形式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保障基层社会秩序井然有序^①。而所形成与制定的乡规民约属于乡民们在世世代代的历史变迁中得出的总结,和村民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联,并且是受到村民认可的制度。依照乡村社会的具体情况,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以及现代化法治理念,把地方性法规和乡规民约进行整合,鼓励村民共同商讨交流,对乡规民约中的陋习进行修改,使乡规民约展现出价值与活力,还可使国家各项法规制度更易得到群众的认同以及支持。通过乡规民约的制定,能杜绝大操大办的乡村风气,改善村里邻里关系,保障村庄内部和谐稳定,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果,故而致力于这方面展开探索很有必要。

一、乡规民约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必要性

在现代法制化国家建设道路上开展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加强乡规民约建设存在一定的现实意义。基层治理法制化虽要求根据法律来对基层事务进行管理,将基层文化、政治、经济等相关活动实施依法管理,使公民的每一项行为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

展,将基层的能够通过法律给予调整的行为一并纳入法律化轨道,然而法治建设同样需为乡规民约建设腾出一定的发展空间。因为和国家法规政策比起来,乡规民约更接地气容易被接受,同时是在漫长文化以及历史中形成的,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是生活争端问题解决的基本依据。故而,基层治理法治化并非通过将法律送下乡来使乡规民约被废止,反而是为了让乡规民约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使乡村民约展现出自身价值,起到补充国家法规的作用^②。故而基层社会治理中需把法治宣传和乡规民约建设充分结合,在为村民进行法律知识推广普及之际,还应做到依法完善乡规民约,促其在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维护,农民行为的监督约束、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经济协调发展、文化知识学习、道德法律遵循中发挥引导教化作用,确保文明村建设目标得以实现。典型的即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县,将古寨作依托,被称作“川南民风民俗的活化石”的“鬼市”,在历史变迁中制定了充满地方特色的“夜半相聚、鸡鸣则散”的半夜市场规矩,并且这一规矩延续至今,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关注,很多人也趁着旅游间隙到此地观看与购物。并且,乡规民约对民族事物处理也有利,内江市辖区内的威远县内有黎族、拉祜族、水族、景颇族、

作者简介:李迎利,女,中共临泉县委党校高级讲师,硕士研究生。

哈尼族等在内的23个民族集聚,经乡规民约让伦理习俗、生产生活、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事项得到明确,获得当地老百姓认同,使乡土社会秩序更加规范。

二、F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乡规民约建设情况

(一)F市基本情况

F市位于A省西北部,总人口900万人,面积9775平方公里,耕地58.5万公顷,辖3个市辖区:颍州区、颍东区、颍泉区;四个县:太和县、临泉县、颍上县、阜南县;1个县级市:界首市;其中颍上县辖21个镇、9个乡(其中1个民族乡);阜南县辖20个镇、9个乡;太和县辖24个镇、7个乡;临泉县辖21个镇、10个乡、1个工业园区。F市为A省人口最多的城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达200多万人,为全国重要劳务输出基地。

(二)F市乡规民约建设情况

F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始终坚持“基层矛盾基层办、上访也需依法办”的理念,大量乡镇均制定了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文明乡村建设的实践中发挥了正向引导作用。典型的即:(1)颍东区枣庄镇。F市颍东区枣庄镇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力度,进行乡规民约设立,致力于乡规民约宣讲,使农村陈规陋习被破除,使乡风民风逐渐好起来,人居环境美起来、文化生活富起来,群众幸福感以及获得感增强,自觉当好新风正气的倡导者、传播者以及实践者,使更多人变成乡风文明、移风易俗的受益者。同时,该镇在尊重群众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全镇9个村,通过广泛调研,充分掌握民情,深入了解民意的基础上,组织召开村民大会集体商议、酝酿、通过符合本地实际的《乡规民约》,集中规范村级社会治安、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和资源保护、婚姻家庭和村风民俗,重点整治农村滥办酒席、天价彩礼现象,着力破除陈规陋习、倡树文明新风,取得了群众满意、社会公认、促进和谐的良好效果。如今,走进枣庄镇9个村、居,随处可见这样的乡规民约,有的写在文化墙上,有的挂在宣传栏上。在乡规民约的约束下,全乡的村容村貌有了很大的改善,文明和谐观念深入人心;(2)太和县东城村。F市太和县东城村在2007年由齐老营村、双路村、陈寨村合并而来,全村5861人。在创卫、创文工作中,乡规民约有力地推进了村

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村规民约涵盖了村风民俗、户籍管理、社会治安、环境治理、婚姻家庭等,如今已成为全体村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2020年6月,东城村的乡规民约正式出台,村里安排专业保洁人员对村庄进行定期保洁,且实行动态管理,一发现污渍及时清洗,一发现有人乱丢垃圾就马上提醒。全村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挨家挨户上门宣传,在村里掀起了人人讲卫生、个个爱清洁的热潮。如今,全村广场绿草如茵、环境优美,房前屋后种花植树,路面干净整洁,十字路口秩序井然。(3)临泉县东马寨村。东马寨村多次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推进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风”宣讲会,村干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群众日常生活,逐条讲解村规民约,让村民知晓、理解其内涵与重要性。东马寨村成立了由村干部、老党员、群众代表组成的道德评议会,宣传村规民约,定期开展环境卫生评选活动。房间收拾整齐、院内干净整洁、门前无乱堆乱放被评为“清洁文明户”,发放宣传牌和奖品以资鼓励;对于环境较差的认定为“不清洁文明户”,组织他们到“清洁文明户”家中参观学习,争做文明人、争当文明户。东马寨村积极开展“五看五评”“好媳妇”“好婆婆”等评选活动。通过村规民约解决邻里矛盾,宣传移风易俗,也带动群众积极参与到基层治理,如今东马寨村的乡风文明实现了“质”的提升,全村洋溢着文明和谐的气息。

当前乡规民约在F市已深入人心,基本上各小网格墙上均刷写了乡规民约,从乡规民约在F市形成与实施以来,大家心里都有了一把标尺,每个人的行为均用这把“尺子”一量就知道,在大家的共同监督下,矛盾纠纷发生得少了,赌博的也没有了,村民随手丢垃圾的习惯也彻底改变了,大家都会自觉将垃圾收集起来扔到垃圾桶里,环境干净了,空气清新了,就连爱讲家长里短的人也不见了。

三、F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乡规民约建设所存问题

(一)部分乡规民约内容和法律法规有冲突

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应避免乡规民约和法律法规相悖,不可对村民权利造成侵犯。不过在现实生活中,部分乡规民约所发挥的规范功能、教

化作用呈现出衰退形势,并且和法规政策内容有矛盾之处。具体表现:第一、一些乡规民约可能会对村民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在F市部分乡镇地区现有的乡规民约里提到:农村新添加的人口如果是男孩,那么当年则能够享有相关福利;如果为女孩,那么第二年方可享有相关福利,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不相符,是以往农村人存在的重男轻女表现,对女性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第二、部分地区的乡规民约存在着一定的重罚轻教偏向^③。如部分地区的乡规民约里提到:若砍伐一颗树木则需罚款20元;砍伐超过5棵的加重惩处。这一规定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树林,维护生态环境,可以说本身是不存在错误的,然而却只注重罚,而不注重教,没有从源头上着手让村民的思想得到转变,故而要使村民养成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行为有一定的难度,反而让村民的权益遭受侵害,与我国法律法规内容不相符。

(二)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使乡规民约建设难度提高

在新农村建设步伐持续加快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下,F市农村地区整体面貌得到了明显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也与以往出现了极大差异。第一、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变少。很多青壮年劳动力都不愿意在农村地区生活,而是到城市里工作,以往的很多土地要么交由他人进行耕种,要么就荒废没人耕种,部分农民有着工人以及农民的双重身份,农忙时则回乡务农,而农忙时节过后则到城市务工^④;第二、农民身份发生了改变。在城镇化建设背景下,位于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土地得到开发,或随着工厂的建设,这些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土地被征用,农民也搬进了拆迁楼,农村土地得到开发使得全新产业基地形成,使附近农民与外来农民也相继进入该地务工,而该现象下,农村乡土结构以及熟人结构得到转变,村民本来的传统生活风俗以及文化习俗氛围彻底被打破,村民在全新生活环境中丧失归属感,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让,让原本受到公众认可的传统风俗习惯丧失,乡规民约也在这一形势下丧失作用,建设难度逐渐增加。

(三)实施效力低下让乡规民约建设受阻

F市不少地区乡规民约实施效力低下,乡规民约的制定在没有落实到位的情况下,也成为了一种

形式。第一、村干部属于乡规民约的执行主体,然而很多乡村地区的村干部综合素质偏低,本身威望不够,无法发挥带头作用,严重降低乡规民约执行效力;同时一些村干部对村民未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导致乡规民约仅对普通村民进行约束,对一些有钱有势的村民或能力较强的村民并未发挥应有的约束作用,诸多问题均让乡规民约的权威性受到影响,不能得到所有村民的信服^⑤;第二、在乡规民约和民众利益存在矛盾时,约束力不足的情况较突出。典型的即乡规民约在民众房屋乱搭乱建、村民圈地占地、道路不畅与乱堆杂物问题等行为的约束功能相对薄弱,开展效力不强。

四、F市基层社会治理中推进乡规民约建设的举措

(一)进一步规范乡规民约建设内容

首先,乡规民约的制定需做到充分填补法律法规制度存在的空白之处,从而能够在环境治理工作开展、邻里纠纷解决、乡村市场规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部分法规范围内未包含的领域均需要由乡规民约中的一系列规范条例来给予调解,使民众可做到自我行为约束,开展自我管理;其次,以传统文化为主的乡规民约需拥有社会治理作用。我国是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各族人民在漫长历史岁月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有好的内容也有坏的内容,而乡规民约制定时需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受到一些会侵害民众权益的老封建思想影响,要做到与时代发展步伐相契合,促其变成国家法治建设的“得力助手”^⑥;如针对村中已进行了产业基地创建的区域,乡规民约中需制定对应的规范经营条款,严禁出现制假贩假行为;而普通乡村地区则应进行尊老爱幼、保护环境、爱护自然等充满正向引导作用的规范制定;如F市巩堰村以往群众素质低下、村里垃圾遍地、环境脏乱差,而乡规民约制定后,村委会通过召开村民大会、村民小组会、党员大会、党小组会及发放宣传单、张贴宣传海报等多种形式,积极宣传文明创建的重要性。如今,最让村民热衷的是每个月的星级文明户评选。村委会根据每家每户的环境卫生情况,分别授予二星至五星的荣誉称号,并给予20至50元的

奖励。钱虽然不多,却有效调动了村民们的积极性,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东城村进行了“功德榜”“成才榜”“好人榜”“能人榜”创建,其中“功德榜”主要是对懂得感恩、一心向善的人进行记载;“成才榜”主要是对热爱知识、推崇教育的人进行记载;“能人榜”主要是对养殖能人、种植能人、发家致富带头人进行记载,起到榜样与激励作用;而“好人榜”则对有着感人事迹行为的人员进行记载,包括好婆婆、好媳妇、好村民、好党员、好老师等,使乡规民约内容更加规范,并成为人们心中的“标尺”。

(二)进一步加强乡规民约建设力度

首先,对乡规民约建设程序给予规范。风气淳朴且和谐安宁的农村为保证乡规民约进行价值发挥的前提。乡规民约要展现出自身价值,还应有一套由村民共同制定的能够发挥规范以及监督功能的民主程序。第一,需为农民提供相应的权力,使农民能够自主参与到乡规民约的建设中,发挥群策群力的效果,使农民遵守乡规民约的主动性被激发。第二,鼓励村民积极主动的参与监督,确保乡规民约的开展更加公平公正。其次,加强乡规民约的宣传普及力度。乡规民约内容制定后,应通过书面方式来为每家每户进行传达,或通过口头方式为公众进行内容讲解,确保不识字的村民也可充分掌握乡规民约的内容。同时,在和村民开展交流沟通时,应做好普及教育,使村民充分了解乡规民约遵守的意义,让乡规民约的效力提高,执行力度增强。此外,还可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落实充分结合,在人员相对集中的乡村舞台、村社广告、文化墙、集市以及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等地区做到乡规民约上墙,不放过一个宣传窗口。最后可将村村响、互联网等现代化传播工具利用起来,通过微信、电话、电视等方式为村民进行乡规民约内容讲解,扩大宣传推广覆盖面。

(三)进一步完善乡规民约开展保障机制

乡规民约约束力以及开展效力情况直接关系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村干部作为乡规民约的主要执行主体,若不能公平公正的执行,则会让乡规民约的开展与制定初衷相背离,故而应进行对应的保

障机制制定,包括奖惩机制、监督机制等,由村领导、农民群众、党员代表、乡贤等相关人员共同组建监督小组,对乡规民约的执行过程开展监督,达到环环有约束、层层有监督的作用,确保在乡规民约的执行过程中,能够做到奖惩结合作抓手,使乡规民约无人监管以及无效监管等问题得到解决。并且可进行黑红榜以及道德积分奖励制度制定,对主动倡导并践行移风易俗的村民刊登到“功德榜”“红榜”等行列中,可根据积分进行实物兑换,而有违乡规民约的村民则被刊登到黑榜,对其进行引导教育,并给予相应的惩处,达到警示和震慑作用。

乡规民约属于村民开展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教育的基本行为规范,可让村民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使村民自治实践得到深化,促法治、自治、德治三治充分结合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得以形成,使乡规民约深入人心,变成乡村发展、乡风文明、乡村振兴实现的助推力。针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乡规民约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肯定的,而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仍有待考量,相信通过改进与完善,必然能让乡规民约在和谐乡村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 [1]张建军.儋州市乡规民约研究[D].海南大学,2021.
- [2]张敏妮,苏红新,张百顺.乡规民约在民族地区农村道德建设中的积极作用[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85-89.
- [3]张为山.乡规民约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J].青年与社会,2018(30):257-258.
- [4]南杰·隆英强.基层社会治理与乡村法治建设的理性思考[J].民间法,2018(01):104-118.
- [5]柯凯铎,杨军.乡规民约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以福建仙游县家训族规为例[J].学术论坛,2018(02):132-138.
- [6]李青青.中国传统乡规民约的社会治理研究[D].湘潭大学,2018.

责任编辑:王昊

来稿格式规范

我院竭诚欢迎广大读者来稿。为使来稿得到迅速与妥善的处理,敬请作者注意如下要求。

一、来稿应依次包括:主题、作者简介、单位、邮编、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如是基金项目,请注明项目编号。

二、作者简介包括:姓名、性别、职称、职务、单位全称、通讯地址、邮编、电话。

三、参考文献统一格式

1、期刊类:[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例如:[1]王海粟.浅议会计信息披露模式[J].财政研究,2004,21(1):56-58.

2、专著类:[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例如:[2]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42.

3、报纸类:[序号]作者.篇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例如:[6]李大伦.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N].光明日报,1998-12-27(3).

4、论文集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可选)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例如:[7]钟文发.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A].赵炜.运筹学的理论与应用——中国运筹学会第五届大会论文集[C].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468.

5、学位论文:[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保存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例如:[11]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1983:1-7.

6、研究报告:[序号]作者.篇名[R].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例如:[12]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1997:9-10.

7、条例:[格式][序号]颁布单位.条例名称.发布日期。

例如:[13]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Z].1991-06-05.

8、译著:[序号]原著作者.书名[M].译者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例如:[14][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0.

9、电子文献:[序号]电子文献作者.篇名【文献类型/载体类型标识】.文献出处.日期。其中,【文献类型/载体类型标识】为:【J/OL】网上期刊、【EB/OL】网上电子公告、【M/CD】光盘图书、【DB/OL】网上数据库、【DB/MT】磁带数据库。

例如:[15]学术堂.论文参考文献标准格式要求【EB/OL】.

<http://www.lunwenstudy.com/cankaowenxian/130239.html>.2018-03-14.

四、注释

注释是对论文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前面用圈码①、②、③等标识,放在加注处右上角。

《甘肃统战理论研究》编辑部

